

莽

MANG MANG

Vol.
2

一个新的「我们」
女权主义者群谈
华语社运圈的米兔
写在台湾大选之后

浪浪后的
进与退

二零二四年二月 第二期



高墙内外， 野蛮生长

浪潮后的
造母者



找到我们

书店 · 文章 · 社媒



通缉名单

崩坏の炼金术士 / 川

无信仰の法师 / 亚兹勒

赏金猎人 / 草莓兔霸天MKII

巴啦啦老魔仙 / 本仙

怪谈小子

超高校級の哈澤爾·阿布噶多



封面故事

插画 / 小蜜蜂懵懵

一年多前，一张张白纸积聚成参天大树。运动退潮后，惟剩一片荒芜沙漠，留下来的人在它的阴翳里栽种着渺小的芽儿。离散的人们在沙漠中遥望，寻找彼此，互予支持，期待沙漠终有一日会变成菏泽乃至大海。为将来造一叶舟，渡向自由的海。

目录



4 编辑手记

6 新年献词

专题：浪潮后的造舟者

8 闪回 FlashBack

10 记忆拼图

13 周日，晴——一份来自中国的白纸手记

22 星芽：浪潮之后，行动社群如何持续介入社会？

40 人们 Nomads

42 白纸之后，伦敦社群实践的三种可能性

50 专访黄台仰：最重要乃维持身份认同

66 在离散时代，一个新的“我们”

74 莽莽 × VOCN：五问五答

80 性与别 Gender

82 女权主义者群谈：社运中的性与性别

90 在台湾街头，一场由八位大学生主办的 MeToo 游行

100 记录、治愈与反抗：诞于东京的华语 MeToo 艺术展

108 破坏“大局”，撬动冰山：华语社运圈的反性骚扰控诉、抗争和团结

120 特别面孔 Profile

一个延长的709：“律师的律师”
李昱函的执着与不屈

134 在场 Insight

写在台湾大选之后：not my president, but my duty

143 莽原热风 Zephyr

高悬穹苍的那颗星

160 独立稿件

161 日记 | 我们在墙的这头

167 诗歌 | 乡愁

168 组诗 | 世界我该如何触碰你

171 散文 | 最佳损友

174 小说 | 大地上的胜利日

编辑手记

文/莽莽编辑部

各位读者朋友，久等了。距你上次拿到这本刊物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间，《莽莽》与许多新生的行动者组织一样：在浪潮中凝聚起来，而在退潮后，许多困惑与难题就此暴露在日光之下，如同坚硬难挡的礁石或悬而未决的珍宝。我们以理想之尺反复衡量行动目标，努力联络更多的行动者个体和组织，学着如何与跨国而来的极权之手所制造的恐惧共处。更重要的是，在浮浮沉沉的失望和希望之间，还能继续行动已是幸事。

在第二期组稿的过程中，主题“浪潮后的造舟者”逐渐浮现了出来。浪潮会冲散人们或打消一时的热情，但总有人愿意留下来锻造一叶小舟，载着自己与伙伴在茫茫大海上继续探寻。身下的这一叶舟，不仅是为自己建设的“社团”，也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立场、关注的议题。我们主动将视线投向了那些反叛的、居于边缘的、拷问“主流规范”的事物。

我们关注新生的社群建设，在伦敦的三个新兴社群展现了各异的实践和思考，例如反思运动中的权力关系，基于感情和共鸣进行连结而达到“去中心化”；审视运动中的厌女行为，尝试建立和维护全女环境；抑或作为中国行动者去探索和参与在地的劳工议题运动等等。在“星芽”图集里，我们记录和整理了个人和社群富有创意的介入社会的方式，这一栏目也将持续发问和解惑，期待能够与行动者共同成长。

在讨论集体参与之外，我们也回问个人的身份认同，试图回应“我是谁”。通过对流亡香港活动家黄台仰的采访，我们看见港人在社运中的样态：处于离散状态，但顽强维持着身份认同和自主性；也讨论了在海外施加影响的具体策略。通过一位读者的独立来稿，我们梳理了“中国人”在异国他乡被“他者化”的感受，作者在海外的白纸运动到来时，方才感到了抗争行动身份的主体性，可以选择“成为中国人”。

今期我们亦用较大的篇幅去探讨了性别与社会运动。白纸运动的确是一个具有重量的事件，但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有关注不同议题、处于不同领域的社会力量在活跃着。当女权主义思潮及实践遇上白纸，前者如一束强力的探照灯，让后者中的性别不公正暴露无遗；前者积累已久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方式，亦对社会运动强调团结大多数而可能忽视个体差异的这一特点，提出了深刻反思和借鉴。“MeToo（我也是）”作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通过揭露一起起性暴力事件，不仅为个体伸张正义，也将性、性别、权力关系的错综关系曝光在人们眼前。

2024年初，一起民运人士性骚扰年轻女性行动者的事件，引发了反对华文圈性骚扰、督促行动组织建立反性骚扰规范的行动，我们通过对这件事的记录来呈现社运中“MeToo”的困境和潜

力。此外，我们也发掘了两份珍贵的实践样本，分别是发生在台湾的MeToo游行和东京的华语MeToo展览，二者均受到台湾于2023年夏MeToo浪潮的影响。前者试图向公众呈现性暴力的伤害性和救助支持的可能性，后者则通过梳理编辑了中国MeToo大事记、疗愈工作坊、叩问制度之黑暗的行为艺术等行动，来促进公众对性骚扰和MeToo运动的了解共鸣。以及，更加广泛存在于行动社群里的性骚扰行为该怎么办？女权主义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女权主义者和行动者的身份之间是否存在张力？这些问题也许能够在我们与三位女性行动者的对谈中得到解答。

在探索新议题的同时，我们也留存历史，附录了部分白纸记忆。一份来自中国某城的白纸运动见证，变成了一则身临其境的漫画：在那个夜晚，有人在场、有人行动，有人倾听大家讲述的故事，有人为了不遗忘痛苦和愤怒而反复言说；而现在，我们也将它们都收录下来。

专题之外，更多特色专栏在本期正式启动。例如“特别面孔”专栏，在《一个延长的709：“律师的律师”李昱函的执着与不屈》一文中，我们试图还原李昱函律师的生命故事，看见她在过去多年是如何默默坚持信念。随后发布的编辑手记里，莽莽亦提出愿景，希望不同世代、不同议题下的抗争者之间能有更多对话，彼此关注对方的议题。

“在场”专栏则以深入事件为目标，邀请人们张开感官，书写记录转瞬即逝的重要时刻。本期“在场”呈现了一位作者在2024年初的台湾大选现场，近距离观察民主实践的记录，以一个中国行动者和观察者的视角，回顾了在大选现场的对话、困惑和反思。

在与“热风Zephyr Society”合作的“莽原热风”专栏里，你可以读到纪念高耀洁医生沙龙活动的记录；将这发生在纽约一隅的对话留存下来，也是我们将社群活动的成果在媒体上进行呈现的一步尝试。在另一个特别策划中，我们也与文宣中国VOCN平台（又名公民日报Citizen Daily CN）进行了联动，给彼此提出五个问题，进行了颇具趣味的快问快答。

我们仍收录来自读者的独立投稿，作为个人的自由书写，它们或以散文的方式，记录自己与友人因观点分歧而失散的故事，或或以诗歌表达世界持续割裂之中的迷茫和叹息。在最后，我们也附上了团队在遭遇政治压力时共写的日记，将我们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置于虚构的情境中，换一种口吻来面对内心、坚持记录。

春日已近，莽原复苏。我们深知海内外行动的不易，以真心关怀社会已是难得。但愿这本刊物能予你一二分勇气，看见华语行动者的困惑与解困之道。我们都不能断定未来的气候怎样，是否还有下一次浪潮席卷你我；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要做怎样的事，要走上怎样的路，与同伴一起，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也照顾好自己。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它也正是一种抵抗。在高声呐喊之后，我们留下来建设生活，不再轻易相信他人的思想和指导，不再自我欺瞒和转移视线，我们明白：真诚才是最大本领。■

2024新年献词

——在黑暗中行走，也在雾中行走

今年，随着疫情防控的放开、二十大后更加看不到政改的可能、国内经济也同样面临严峻形势等等，社会陷入新的困局——处于某种不知所措、看不到前路和希望的“迷雾”中。

2023年是什么样的一年？

《莽莽》在去年新年献词中写道：2022年是“抗争元年”。而2023年是否延续了这一历史进程？

我们看到自解封后，去年人们的那阵愤怒渐渐消退，尝试改变封控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呼声再次降到最低点，仿佛一夜之间，当初的愤怒随着健康码、核酸亭一道消失与拆解了。官方应势抹去了三年苛政人祸之公共记忆，人们很快拥抱了解封后重获“自由”的生活，宛若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梦魇则变成生活里的一道影子，挥之不去。

转向海外，今年以来线下集会抗议式微，公共场域的线下抗争行动与去年相较急剧萎缩。去年站出来的人，仍然继续愿意投身于行动者有几何？

当今运动浪潮退却，留下来的人们自建组

织，希冀能够抵御这股政治行动的“冷却潮”。

去年我们在新年献词里提出来这样的愿景：“带着这份(对明天的)想象，我们可以时刻意识到，这些我们在乎的价值理念，在今后的抗争里会被不断反思与实践，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团体里，我们将一道保存与守护这些珍贵的火种。”

在今年我们看到“民主讨论决策”、“包容异见”、“去中心化”等等的价值和理念在海外新生代的社群与组织中不断被尝试和实践，在当下中国政治环境中被压制与稀缺的公民社会、自治组织的雏形渐渐萌芽与生长。

“民主自由的价值”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和空虚的幻想，亦不会自动降临在一个民族和国家，唯有在细微的个人、组织中通过具体的实践和不断的训练才能被真正理解。

2023年接续了2022年的运动星火，怒火与街头抗争逐渐向日常式的连结、反思和新的公共生活过渡。

过去从未有过“民主训练”的普通素人在

这一年间学习这些经验，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不少组织在这一年中面临着发展、转型的困惑，身处其中的人开始发问：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

这些问题背后的考虑因素多为如何定位组织（一群人）想要做的事情，实现的目标和价值；在此基础上如何来寻找人脉和资源；如何分配资源等等。

除此之外，根据媒体报道，有的组织面临着本地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有的组织则尝试通过办影展或沙龙等方式希望“将运动浪潮转换为更常态化的抗争”以及尝试与跨国组织建立连结与合作；也有在浪潮中面临解体和失败的组织成员坦诚转型中面临的规则制度的重要性等等。

《莽莽》也正如此。这一年中，团队对以上这些议题也有过不断地讨论，咨询意见，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感到十分困惑和有压力。

“迷雾”笼罩，不知前路。这是我们这一年来的困惑，或许也是许多同路人的困惑。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莽莽》已经属于民间力量中的一员。而认清这一点，会给我们的未来指出方向。一个正常的社会之舆论肌理中，应当既有专业媒体又有民间团体力量的声音，两者相互扣环，共同构成我们生活的“公共性”。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壮大这股民间的自治、发声以及行动力量，它是更大的公民社会的底色，也是我

们的希望之所在。

2023年也让我们对于“抗争”本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讨论：到底何为“抗争”？除去上街抗议、建立社群组织外，更细微的抗争亦发生在个人在这其中发生的思想观念之变。

人们在日常的连结中开始打破原子化的状态，学会如何关爱身边的其他伙伴；面对异议，开始学着如何倾听与包容，非暴力地沟通，求同存异；亦开始反思自己的语言，试着净化有歧视性的、厌女和爹味之语；开启对话，对于其他族群、不同世代抗争者的苦难不再觉得遥不可及，“我们都在看着”……

过去三年中，我们被不断灌输：我们的生活是“非必要”的——我们必须过一种“非必要的生活”，比如“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曾经“必要的”封控被终止，无疑让我们在今年开始重思一种“必要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再更进一步，“必要的公共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此我们现在暂时没有一个共识的答案，但或许一步步的探索会悄然在“迷雾”中点亮前路、启发我们。

各位同行者，各位读者朋友们，在这一年的工作和努力后，我们带着困惑与迷茫以及带来转变的希望即将迎接2024新年。在辞旧迎新之际，莽莽衷心地祝愿各位新年快乐，平安顺遂，充满信心。■

閃回

FLASH



A dark background filled with out-of-focus light circles (bokeh) in various colors including orange, yellow, blue, and red. Several of these circles have a cratered texture, resembling planets or moons. The word "BACK" is written in a white, hand-drawn, brush-stroke style font,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mage.

BACK



亢奋狂肝，或者躺成死鱼”

去年的那个冬天，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回憶是我家的天花板。我只有兩個狀態：亢奮狂肝各種工作，和死魚一樣躺在床上，一邊follow

國內的新聞一邊焦慮和自責。狂肝各種工作的時候我經常會抬頭望天思考，所以我會看我家的天花板。

躺在床上的時候我也會向上看著出神，也會看我家的天花板。所以，不管我處於哪種狀態，我家天花板都會經常停留在我的視網膜

上。那是一個白色的，微微泛黃的平面，一個大大的“白紙”，一片無聲的靜默。

人自危。人們開始減少出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稀薄。作為留學生，孤獨感更甚，彷彿一顆連根拔起的植物被用一到的光

禿禿的水泥地上。同時還在記掛著國內的狀況，我在疫情期間炸了好幾個微博帳號，都是轉發各種求

即炸，不安、悲傷、憤怒、無力、愧疚，膨脹起來把整個房間都填滿。■

助信息轉到炸為止，再轉生，繼續轉發，又炸；又轉生……我身體裡脹滿了感情，像沈甸甸的水球，一戳

要發生了！”真的時很興奮的给我的partner分享，但是隨

之而來的是深深的恐懼，我不知道我該不該去參加，沒人告訴我我應該做什麼樣的準備如果出了事我的家人怎麼辦等

等。在糾結的時候，橋下路過的人流會鳴笛以示鼓勵，當時心裡知道這樣一場小小的抗議可能激不起什麼浪花，但

活動是當天晚上9點左右進行的，左翼組織的同學們幫忙畫好了橫幅，準備到學校附近的橋上去掛，橋的下面是學校旁邊的一條主

了幾個小時後，我穿上了一身從來不會穿的裝扮，戴着帽子、口罩，走出了家門。在現場見到居然有這麼多人來參加，是還是很開心自己也有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事後在橋上和大家隨意聊天時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日本雖然沒有封控，沒有動盪清寧，但也有疫情。日本的疫情只在數字上表現得氣勢洶洶，但整個社會上還是充滿了緊張的氣氛，人車流來來往往。參加活動的大多數是本校留學生，大部分是全副武裝來參加的。在得到活動通知的時候，我感

加的時候，感覺特別振奮人心。左翼組織的同學們十分注重保護大家隱私，在拍照時主動站到中國同學面前來擋住大家。我們站在橋上喊出口號的

我们拒绝

我至今依然会记得，一年前的那个中午，我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了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给我发的

消息：你看到了吗，上海、北京？我当时本还在迷迷糊糊的，看到这条消息后，我立

刻清醒了过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坐直，打开了推特。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还在梦中？耳畔传来的声音以及视频中的背景

地点让我短时间内陷入了彻彻底底的茫然与短路，我甚至以为我们听了，我不敢相信这些居然发生了，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些口

当时那一刻，就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多少次只取酒后，借着酒劲以不大不小的声音喊几句的口号，终

些能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出现，是过去三十年来人们都难以想象的，是我们从未想过能再次出现的。我记得

某些“人”说：不！我们拒绝！

号，那些行动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我想大家应该都能清楚，上一次类似的已经是在数十年前了，这

音。那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啊，监控密布、戒备森严，但他们却能鼓足勇气站了出来，勇敢的对

于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响彻，再一次被人们喊了出来！他们站在墙内，四周岗哨林立，但他们却喊出了时代的最强

海报。后来她找到我给我说，她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会无条件的保护我，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她

会努力的替我发声，说她希望我能安安全全的。她当时问了我一句：“你还回中

是幸运的，我能站出来发声、我有支持我和关心我的人、我有自己的chosen family。想引用莽莽网站上

的那句话：在离散中自由，在离散中边缘，在离散中寻找家园。也是白纸运动后我决定去读博，当时跟导师陶瓷

的时候直接说了我要写白纸运动，这个过程也让我对这一社会运动又了很多新的认识。

我所住的区域在白纸运动中非常活跃，我的partner的妈妈在附近的一个大型办公区上班，她在自己的办公场所也看到了白纸的

国吗？”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突然就哭了，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回不去了，那个地方已经不是我的家了；但我想我又

“你还回中国吗？”

的音樂會。
我需要先解釋一下這
個遊戲是什麼，意味
著什麼。這個遊戲在
最後的真結局之前，主

角一行都死掉了，但一
直是配角的兩個小助
手輔助機突然意識覺
醒，站出來說覺得不
能接受這樣的結局，

它們決定反抗“製造出
這個悲劇故事的人”，
便會進入一個特別關
卡，是以彈幕遊
戲的方式

白紙運動於11月26日爆
發。25日晚，我看到在
封城期間仍然自發上
街“散步”的烏魯木齊
人。26日白天，我正好去
參加“尼爾 機械紀元”

將每次遊戲結局時都
會有的製作組致謝名
單打爛。這個關卡特
別、特別難，幾乎打
不過去，自己發出的子
彈好少，在Boss面

接受之後便會復活，並
且身邊會多一大群僚
機環繞，一起
發動攻擊。而
且，當被子彈擊

中，便會是

個過程的背景音樂是一
首歌：the weight of
the world。

我當時是哭著打完這
個真結局的。
參加音樂會的時候

失蹤，有人被殺。第一個
人肯定非常不容易，
但第一個人的存檔肯
定會變成其他人的僚
機，然後消失。我想起好

多事，我想到好多好多
人，我想到8964，也想
到學運，想到彭載舟，
更想到前一晚“散
步”的烏魯木齊人。這
樣的事正在我的面前發

生，他們得到的支援卻
不夠。我不想說很多大
話和漂亮話，我心裡只
有深深的敬佩，無力和
難過。但其他在場
的日本人恐怕不會懂得
我在哭什麼。我

又感到深深的孤獨。
但聽完音樂會後，我
馬上看到了南傳的照片。
緊接著，整個晚上，
鋪天蓋地的都是
各種信息，各種照片。

我在那
個晚上又哭
了。我甚至不知道
我為什麼而哭。我是因為
終於看到一線希望而哭，
還是因為知道這線希

望很快就會被摧毀而哭，
又或者是為了自己的安
全、便利、自由的位置
而羞愧難當？

前根本不夠看，給的
命也根本不夠用。
但，所有生命都消耗
光之後，會再次問你：
要在這裡放棄嗎？背
景上會浮現其他

“要在这里放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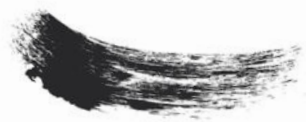


无障碍阅读原文

周日，晴

一份来自中国的白纸手记

素材 / Organe
脚本及漫画 / 喜欢蝴蝶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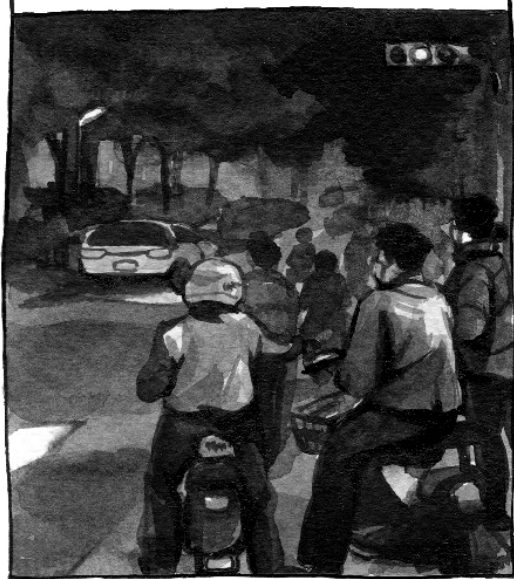
2022年11月27日，周日，
晴。快要7点半，我们也
快要到望平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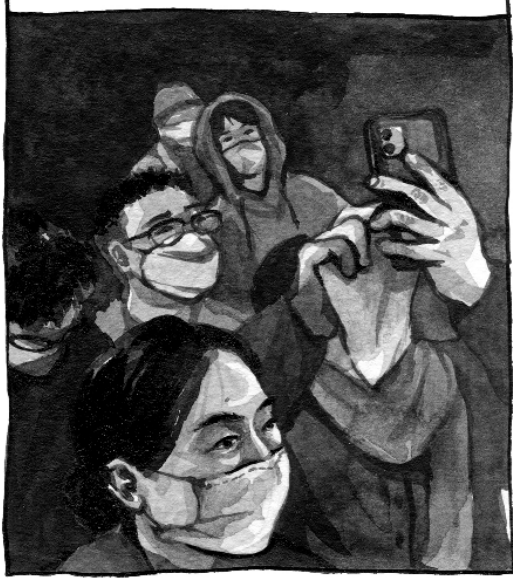
一路上我都在观察那些跟我们
同方向的路人，



透过TJ们背包的厚度，



猜想TJ们是否也带着白纸
和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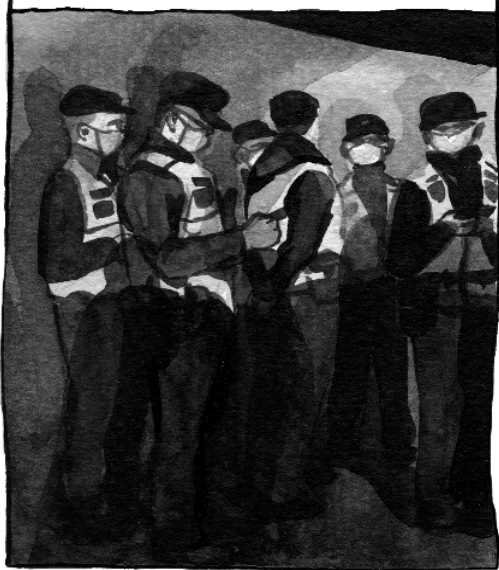
起初现场的氛围很平静，
我躁动一路的心逐渐和缓。



维吾尔族人将蜡烛点起时，
警察骚动起来，说怕有火灾
不让点明火。



“有乌鲁木齐的火大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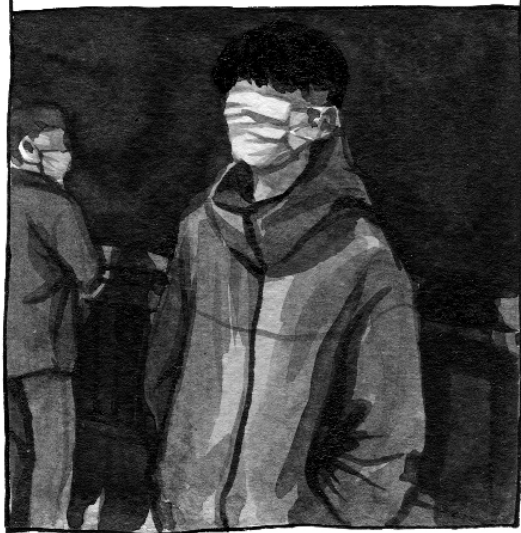
人群中传来让警察哑口无言
的质问，听得我眼眶发热。



他说9月封控时，只有官方站点的人能接到单，他们哥几个实在没活干时，都想过借网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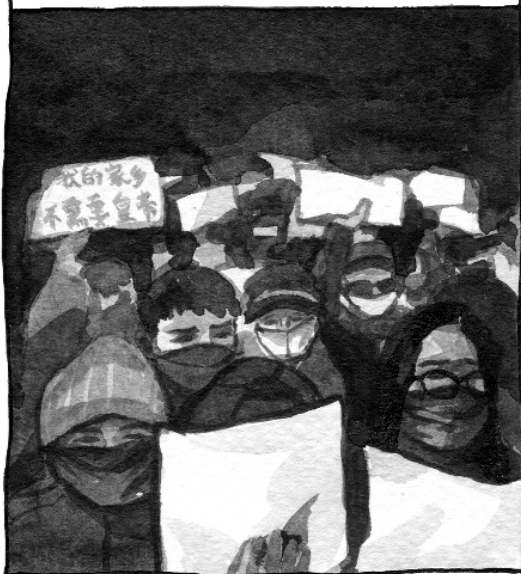
桥对面的口号声越来越响，我身后的男人沉默地把口罩带在眼上。



她是凉山人，毕业来成都一年，算下来只上了四个月班。封控时常趴在窗沿死盯着小区紧关的铁门，不敢点开房东催缴房租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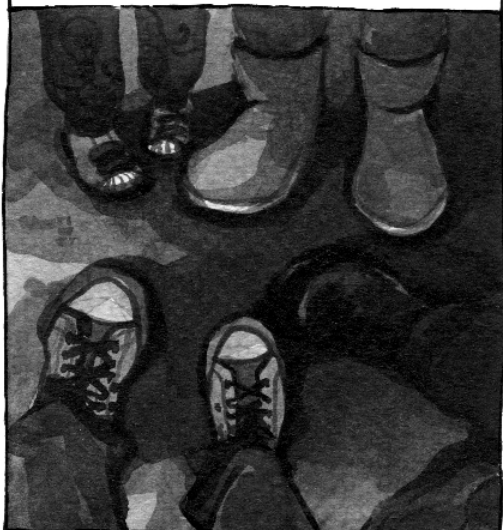
桥这边也响起齐整的喊声：“人民要吃饭！”我不忍心将呼声定义为理想呐喊的口号，我们喊的只是生活，是人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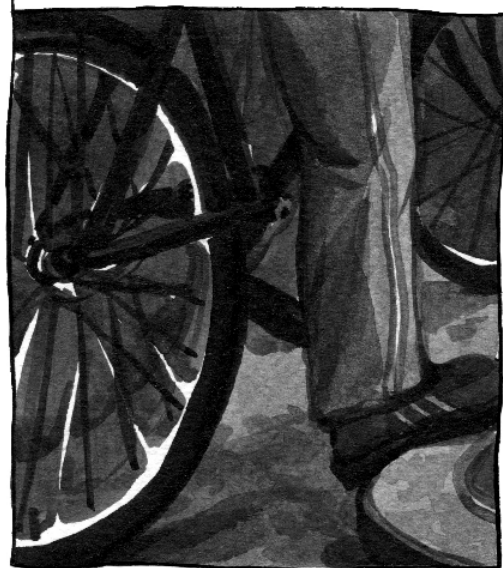
这位四川姐姐带着孩子来，说40年间见过听过感受过人生，但孩子自有记忆来每天都在无休止地做核酸，一晃已经五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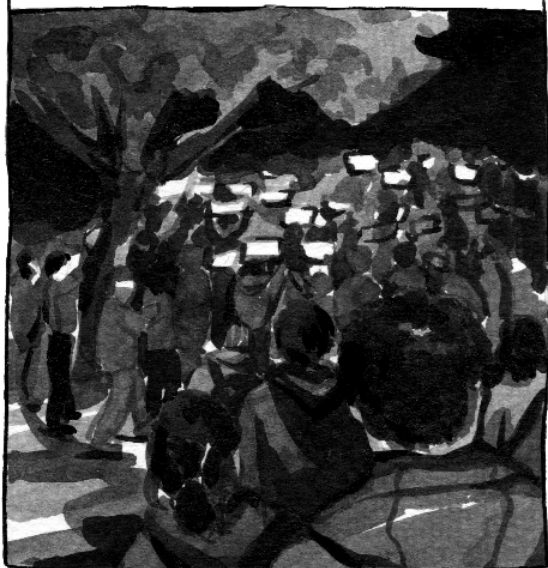
该如何才能真的看得开呢？为孩子、为自己、为那些不知晓姓名的人，为无法重来的时光。委屈，只有委屈。



这个大哥问队伍要走去哪，
“可能去天府广场。”
“我还以为要去天安门呢。”
“保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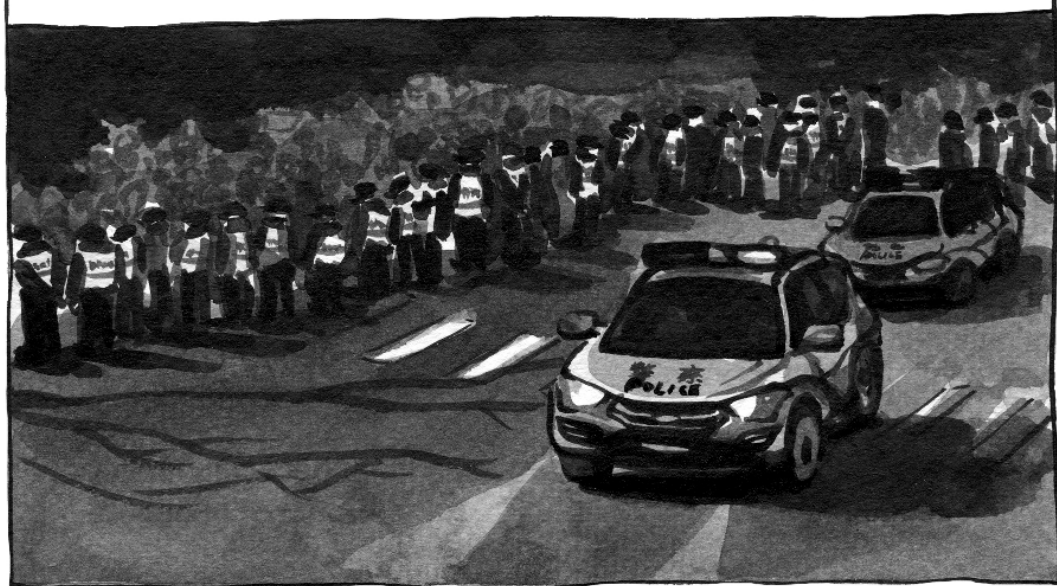
89年的初夏到22年的深秋，
我们仍在为同样的事呐喊，
It's my du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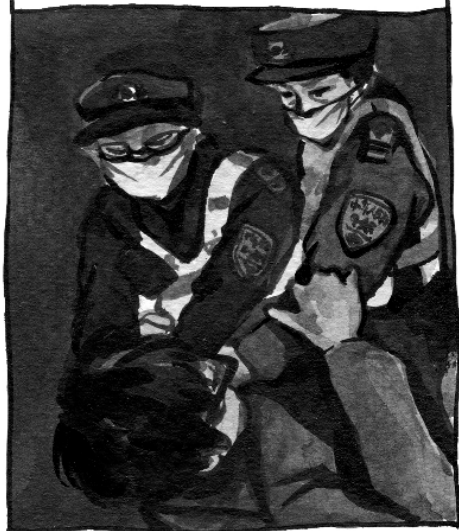
“不要核酸！不要封控！不要皇帝！”



“要民主！要吃饭！要生活！”



队伍被打乱了。尖叫、辱骂，
身边人以及我自己因紧张而
加重的呼气声胡乱一通地闯
入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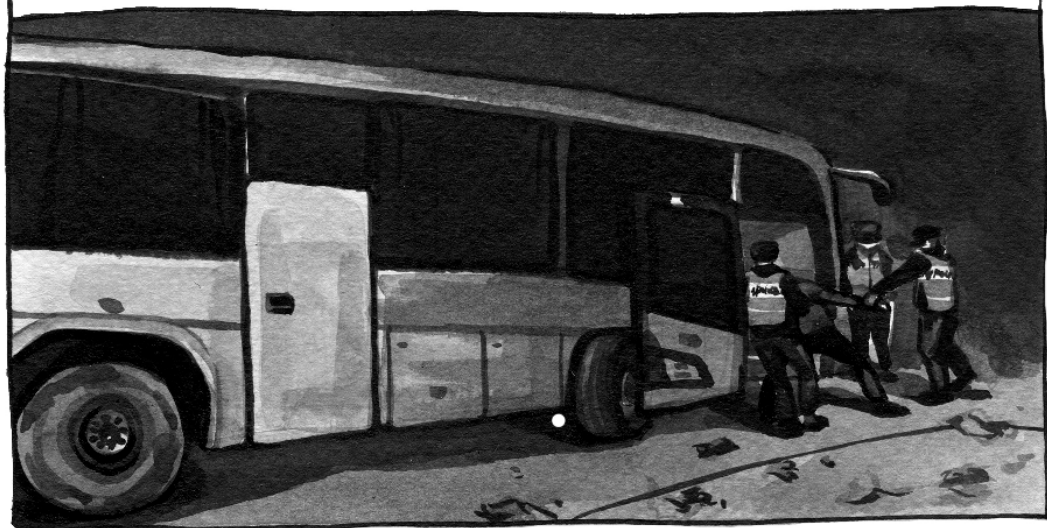
我听见：
“快跑！”“警察镇压了！”
“人民警察打人民！”



在这些恐惧和悲愤的呐喊中，
我祈祷不会听到孩子的哭声。



“人民警察”抓了多少人民呢？
这些人民将会被怎么样呢？



我不敢想，只有像个怂包一样地跑。
可是该跑的、该恐惧的明明另有其人。



历史和月亮会记住今晚的一切。随便哪个宗教的神都好，请保佑这些无辜和勇敢的人，人民只是想要回尊严和生命。



还有个请求，保佑孩子只记得勇敢的人们，不理解恐惧的滋味。借此弥补伤痛的这三年，总不能说我们贪心吧。



星芽

栏目前言

“天崩地裂，星落成芽”——这是编者在观察海外青年社群时的灵光一现。一呼万应的抗争大浪终究会退潮，但是在黑夜中闪烁过的点点繁星却落向地面，在中国以外的土壤上顽强生长。流散而非流亡，这些新兴的社群既关注着故土发生的点滴，反思着筑构自身的文化细胞，但也并未放弃“附近”，而是带着异质性与在地融合。这一过程并不轻松，许多问题涌现出来，却鲜少得到答案。本次的新栏目“星芽”便是一个针对青年离散社群的解惑栏目，《莽莽》会收集海外华人青年社群建设和成长中的种种困惑，并提供一个探索解决方案的交流平台，让不同团体，乃至不同族群的经验可以彼此映照。我们由衷希望，这个栏目可以成为一片沃土，让想象力摆脱干涸，生根发芽。

浪潮之后，行动社群如何持续介入社会

本期诠释

以反对动态清零政策为主轴的“白纸运动”在封控解除后声势渐消，但却在海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海外华人社群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发芽、成长，似乎已经死去的公民社会理想又再一次焕发出了生机，即便远离故土，即便坎坷多舛。在刹那的激情澎湃之后，海外流散社群如何保持细水长流的社会参与？为此，《莽莽》决定辟出这方空间，记录下华人流散社群富有创意的行动实践。

一、在我们的纪念日子里



2023年2月5日，德国柏林，中国行动者在勃兰登堡门前举行集会，纪念李文亮医生逝世三周年
图源：IG@Mydutyinde



2023年2月5日，英国伦敦，李文亮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上的留言墙
图源：IG@han_zifei



2023年2月5日，英国伦敦，一名参与者在China Deviants举办的李文亮纪念活动
图源：IG @han_zifei



2024年2月6日，美国纽约，悼念者在李文亮
纪念长椅上留下花束
图源：IG @gnydemocracywall



2023年4月29日，英国伦敦，中国行动者组织China Deviants举行林昭纪念活动，参与者手写下林昭狱中给母亲的信
图源：IG @han_zifei





2023年5月29日，法国巴黎，中国行动者组织“自由广场”展示“国殇之柱”
图源：蒋不



2023年6月4日，英国伦敦，中国示威者在特拉法加广场前举起北岛的诗句，复刻“六四”时天安门的一幕
图源：IG @han_zifei

2023年6月4日·德国柏林·勃
兰登堡门前的六四纪念活动
图源:IG @mydutyinde



2023年6月4日·法国巴黎·中国行动
者组织“自由广场”组织六四34周年
纪念活动
图源:蒋不

2023年6月4日·英国伦敦·
特拉法加广场前的示威者
图源:IG @han_zifei





2023年6月4日，英国伦敦，中国女权主义者在英国大使馆门前参加集会 图源:IG @han_zifei



2023年10月15日，德国柏林，中国行动者纪念四通桥抗议一周年 图源:IG @mydutyi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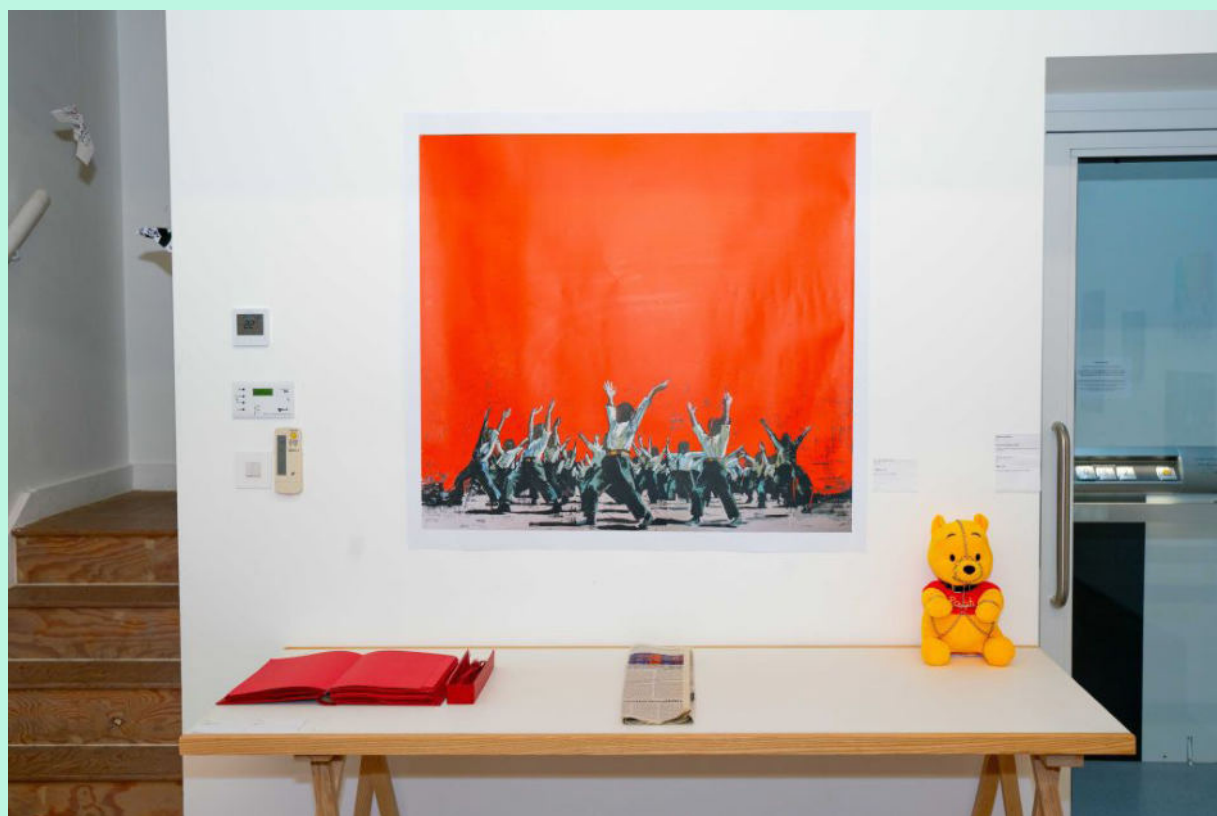
2023年12月5日，法国巴黎，观众在参观“白纸续写”欧洲巡展的室内展品 图源：蒋不



2023年12月5日，法国巴黎，“白纸续写”欧洲巡展现场，近处悬挂的是九色鹿的《谣言日记》 图源：蒋不



2023年11月25日·英国伦敦·白纸运动一周年室内艺术展上的展品相册 图源:IG @han_zif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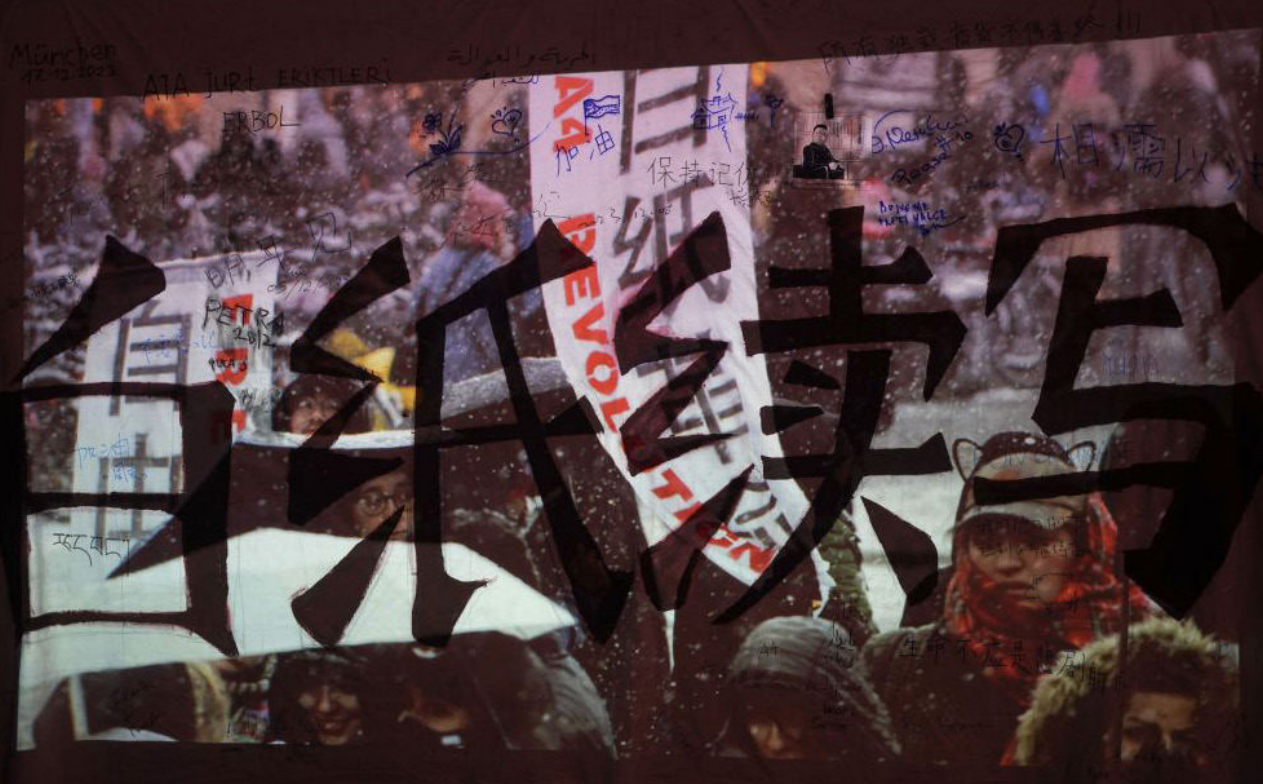
2023年11月25日·英国伦敦·白纸运动一周年室内艺术展上的展品 图源:IG @han_zifei



2023年11月25日，美国纽约，“纽约民主墙”举行白纸运动一周年集会 图源:IG @gnydemocracywall



2023年12月8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白纸续写-人权车旅在欧洲”艺术巡展 图源:蒋不



2023年12月8日·德国慕尼黑，“白纸续写-人权车旅在欧洲”艺术巡展现场的投影
图源:蒋不

二、汇入国际的声音



2023年3月8日，意大利女权罢工游行，现场的中文标语 图源:兔傲天



2022年12月，柏林“我们的自画像”艺术快闪，参与者撕开胸前的五星红旗，露出隐藏的彩虹标志
图源：杜塞小短裙



2023年3月8日，德国柏林，中国女权主义者参加国际妇女节游行 图源：IG @mydutyinde



2023年3月8日，德国柏林，中国女权主义者参加国际妇女节游行 图源:IG @mydutyinde



2023年3月8日，日本东京，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在国际妇女节游行中声援白纸运动被捕者 图源:IG @feministchina_jp



2023年4月23日，日本东京，中国酷儿和女权主义者参加东京彩虹游行
图源：IG @feministchina_jp



2023年10月，英国伦敦Brick Lane(红砖巷)，由英国本地涂鸦艺术家创作的涂鸦作品，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社运元素
图源：IG @han_zifei

2023年12月10日，德国柏林，中国示威者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与香港、西藏、维吾尔示威者一同参与世界人权日集会
图源：IG@mydutyinde



三、从街头走回家之后



2022年12月4日，美国纽约，泛女权社群平台“女子主意”举行主题为“家，什么是家”的开放麦，图为现场装饰
图源：Yunchi

2023年2月7日，美国纽约，行动者们共同给白纸运动被捕者写明信片
图源：IG @white_paper_society





2023年10月22日，美国纽约，“热风 Zephyr Sociey”邀请劳工行动者左望举行关于黄雪琴、王建兵的分享会，图为现场布置
图源:IG @zephyrsocietynyc



2023年11月，“女子主意”开放麦，演员们表演《细思极恐-關於孔夫子和馬克思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图源:陈平

2023年11月19日，美国纽约，社运沙龙“Zephyr Society 热风”组织了“被审查的记忆-手工书(zine)工作坊”，图为工作坊产出的手工书
图源:IG @zephyrsocietyny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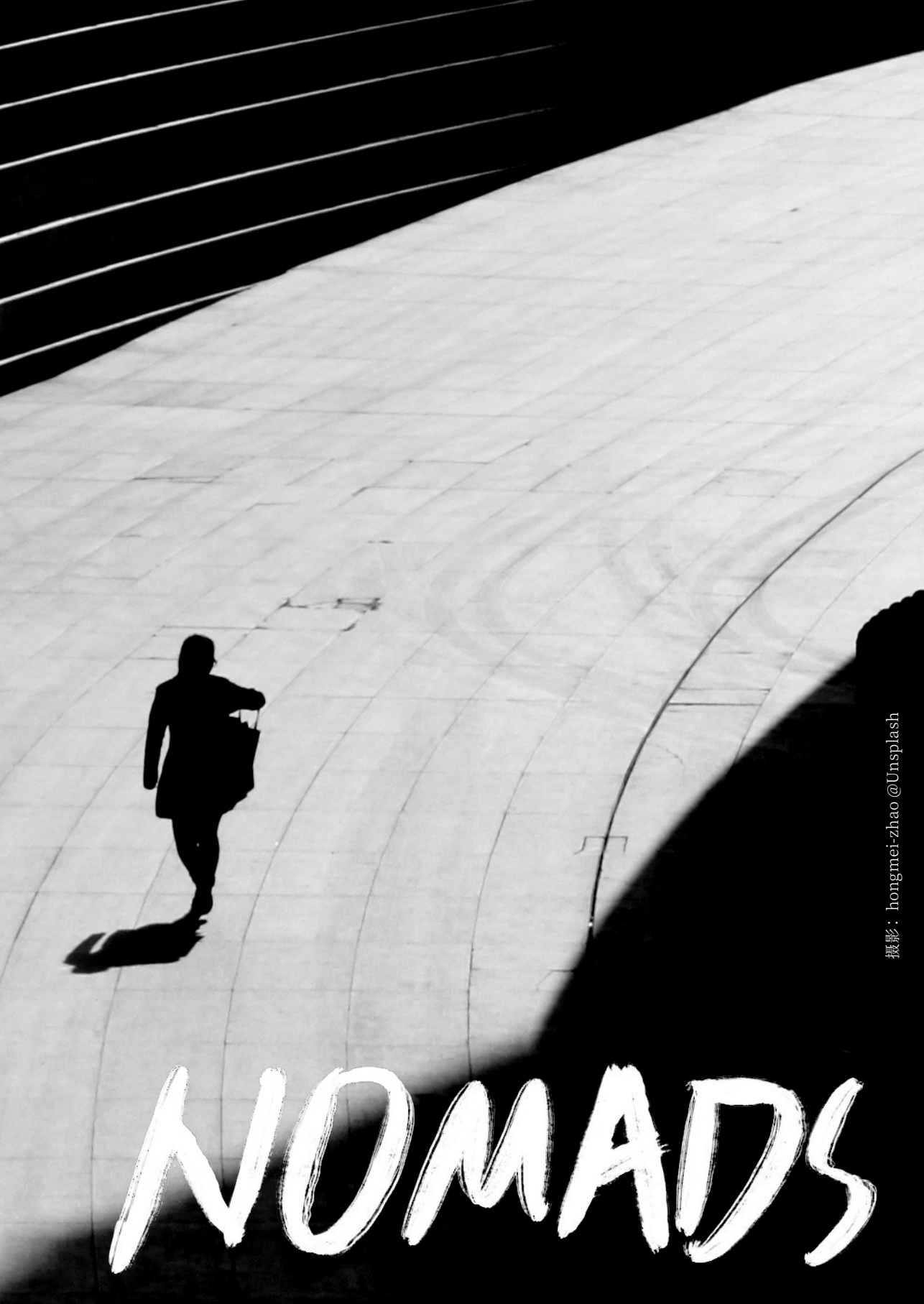
2023年11月26日，美国南加州，离散社群“同议”举行“白纸一周/感恩节午餐会”，并共同创作抗议面具和横幅
图源:IG @tongyitogether



2024年1月12日，美国旧金山，中国离散行动社团“擦星星事务所”在台湾大选期间举行“台湾大选模拟投票”活动，“选举”结果柯文哲担任总统，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赢得立法院多数党
图源:IG @star_shiner2023



人們



摄影：hongmei-zhao @Unsplash

NOMADS

白纸之后， 伦敦社群实践的 三种可能性



China Deviants 的成员悼念林昭逝世55周年 (图源: IG@han_zifei)

文 / 随便

六月四日的伦敦天气燥热。因为是星期日，集会的人群在中午便占满了特拉法加广场。围在喷泉周围的是前来悼念39年前金庙屠杀的锡克人¹，而他们的后方是一群伊朗抗争者。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游客穿梭在其中，广场上十分热闹。

下午四点半的时候，身着白裙的“民主女神”匆匆来到了靠近美术馆的广场北侧。随之而行的还有穿防护服的“大白”和戴头巾的“知识分子”。Ta们将九米长的“国殇之柱”海报铺在地面上，并在后墙挂起了一幅巨大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横幅。一架装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的坦克驶进了广场，停在了国殇之柱的一侧——这是六四34周年纪念日，也是首次由内地年轻人

在伦敦发起的六四集会。

从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今天，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除了解封外，国内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普通人的经济压力还在，文字狱的言论审查也变本加厉。“温水煮青蛙”的状况仍在继续，而零星迸发的异见则被迅速地消失在沼泽中。

¹1984年6月5日，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下令军队攻进哈尔曼迪尔·萨希卜圣庙（俗称金庙），造成锡克教徒伤亡惨重。同年10月31日英迪拉总理被刺杀，而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但在中国留学生超17万的英国，细小的“不明白”的声音却没有被吹散，并逐渐凝聚起来。在结社自由的环境中，通过各种线下活动，原子化的个体慢慢寻找到了彼此。虽然未来怎样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大家原本无处发泄的情绪终于有了出口，对明天也敢多做些幻想。《莽莽》找到了三位伦敦社群的参与者，和ta们聊了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经历与感受。

当我们产生感情和共鸣，不再以政府程序化的模式去工作时，就成为了 deviants

程序限制，获得自我意识后的仿生人为了抗争人类的奴役，结成联盟为自由而战。ta们因此也变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眼中钉，被蔑称为“deviants”，在警察的追杀围剿中四处躲藏。

对于蓝莓来说，不愿沦为国家机器齿轮的自己和朋友们与游戏中的“deviants”处境相似：“我们这些觉醒的人就像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仿生人。当我们产生感情和共鸣，不再以政府程序化的模式去工作时，就成为了 deviants。”

四通桥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伦敦念书的她参与了由公民日报发起的海报运动，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Ta们自行发起了China Deviants（“中国反贼”）——一个由在英内地留学生为主体的抗争社群。和八九学运时不同，China Deviants 和很多其它的年轻组织都是去中心化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固定的分工。参与者志愿承担任务，来去自由。不过，蓝莓也强调去中心化并不代表组织里没有行动的中心：“当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之后，就会往中心的方向靠近，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不能让权力出现在中心圈层。所以如果要以权力来定义中心化，我们就不是个中心化的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从上

至下的等级制。”

李文亮医生纪念会，性别问题与民主运动讨论会，防狼暴太极拳训练，六四物料工作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China Deviants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线下活动，频率每月两次左右。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蓝莓和伙伴们会在活动前发布参与者的申请表，尽量筛选可疑人员。而在李文亮医生纪念会和六四现场，Ta们也请来了安保人员，以应对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一切安全措施都做好，但是并不能百分之百消除安全隐患，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谈起活动的筹划，蓝莓说很多时候主题都与认识的嘉宾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有关，有时也会在特定的时间点举行活动。比如在四月底，蓝莓和伙伴们邀请到了学运前辈邵江先生，做了一次探讨民刊在民运中集结反抗作用的讲座。因为当天也是林昭的忌日，大家还一起用红笔抄写了她当年在狱中所作的血书，在草地上点燃蜡烛进行悼念。

回顾以往在伦敦以港人为主



China Deviants 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的六四舞台剧
(图源:IG@han_zifei)

体的六四纪念会，蓝莓坦言“春节联欢晚会似的流程”让她感觉有些枯燥：“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每年都要办六四，也办了很多年了，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让人敬佩。”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参与，China Deviants今年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六四活动采用了“更加生动”的戏仿形式。演员们朗诵了白纸运动时的诗歌，大白则化身解放军士兵，抬着坦克向民主女神进攻。如此融合主题，蓝莓希望能够“强调六四不只是历史，而是政治现状。当年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在年轻的白纸一代中，女性参与者绝不占少数。但在线下活动时，针对女性的暴力仍屡见不鲜。“比如在白纸运动中，就有人喊‘操你妈’。海报运动的时候还有人把习近平的头和一个裸着的女性身体拼在一起。”在六四游行到大使馆后，曾发表厌女作品的诗人胡东屡次骚扰女权社群的抗议活动²，要求对方摘下口罩。这些现象都让蓝莓感到难过又无奈。

而在七月份由China Deviants组织的一次小型活动中，成员

们也发生

了言语上的冲突。作为回应，蓝莓和伙伴们在几天后开了一次讨论会，初步拟定了社群公约的草案，并且明确了主办方在现场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作用。

“虽然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群中目前发生几率较小，但是也不能就让它们这么过去了，”她说，“因为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

就蓝莓个人而言，尽管以往的

²六四当晚，We are all chained women 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进行抗议活动。据参与者所述，胡东几次三番近距离拍照挑逗，并指责她们不够勇敢，应该摘下口罩。随后他试图图随，但被警察拦住。

活动并不都很顺利，她还是很开心能在 China Deviants中找到“真正的家”的感觉：“我是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家的人，没有一个能让我感到归属感的地方。家不一定要有母亲、父亲这样的存在，但一定要让我觉得安全和开心。”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争吵。爸爸妈妈也会吵架，不行的话就离婚——这不就是社群的解体吗？但我会尽力不让他解体的。我认为社群解体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去改进发生过的错误。但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地回应每一次的冲突、在经验中成长的话，它就不会解体。”

父权制让外向人变得内向，全女环境让内向的人变得外向

与笔者在咖啡馆见面的两天前，暖建国就把自己的化名想好了。平时的她经常会收听《海马星球》一类的女性主义播客，而《随机波动》的冷建国是她很喜欢的一位主播。因为冷暖相对，她便把名字定为了暖建国。

从上大学到工作，暖建国已经来到英国九年了。谈到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过程，她说自己是渗透式地慢慢了解女权的，而绝不是一蹴而就：“找工作时的碰壁，以及工作以后接触到的性骚扰，会让自己积攒一些怒气。但直到最近半年读了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我才更系统性地了解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在海外，华语脱口秀演出并不少见。而在伦敦，也能找到一些中文的喜剧社团。暖建国曾经去过线下的中文脱口秀，但是她觉得活动的氛围很厌女。有的男演员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好久没有做爱了”，让她很不舒服。

去年五月，“女子主意”开办了在纽约的第一个中文女权开放麦。暖建国听说后和朋友们商议，也想在伦敦组织类似的活动：“我们要为女性营造一个空间，因为华人女性的发声空间很小，在全世界都很小，国内更小。而且我们的母语中文已经变成

都是缩写和符号了，所以更应该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声地表达出来。选择讲段子的形式我也觉得会更生动些，毕竟没有人喜欢说教。”

开放麦的英文名字是暖建国的朋友想的，叫做 50 shades of feminism。至于命名的原因，她解释说：“每个人的女权主义都不一样，大家有时甚至会吵起来。但是我们都是女权者，只是在不同的光谱上，所以是 50 shades。”尽管形容自己的立场更偏向于激女，通过开放麦，她希望能提供一个包容的环境，团结各方面的女权主义者。

而另一方面，暖建国也觉得她曾去过的抗议活动现场普遍不接地气：“比如他们喊的像是‘天灭中共’或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一类的口号，我认为很空洞。而且不管是哪个政党在执政，只要还是父权制，那就是有问题。”对比起来，她更希望的是将同温层里的大家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群：“我们不要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我们要爱具体的人，要以追求个人的尊严与自由为主。”

刚开始筹划开放麦的时候，因为了解到“女子主意”的观众也有顺性别男性，暖建国本来没有去限定参与者的性别。但是在胡东骚扰女权组织事件发生之后，出于安全考虑，她还是和朋友们将活动改为女权酷儿开放麦，仅限女性及性别少数群体参加。

“总是有女孩子被骚扰的新闻被爆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更多。虽然不是所有顺性别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所有女生都被性骚扰过。所以我要以女性为主体。”她解释说。

“而且没有顺性别男性的地方，女孩子也更愿意去讲话。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要温温柔柔的，被当作欲望的客体抚养长大。如果一个屋子里没有欲望的主体，我们便更容易从客体转成主体，更容易讲话。所以脱口秀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第一期开放麦的主题是身份认同。从将设计好的海报发布在网

上，到正式演出，中间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暖建国自言感到十分忐忑，会时不时地刷报名表单，看有没有演员报名。但事实证明她是多虑了——在活动当天，小小的教室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提前报名的演员有七位，随后也有即兴发挥的观众。脱口秀的内容大多是个人叙事，比如作为女同或者被误认为是女同的经历，以及对女性不能参政的讽刺。

谈起首场的感受，暖建国感到很受鼓舞：“我们没有想到自

观众在第二期开放麦为演员画的速写（图源：伦敦女权开放麦）



己写的段子会有人笑。观众真的很捧场，大家的素质也都很高。”

“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一群社恐上台讲话，然后还讲了很多。所以说父权制让外向的人变得内向，全女环境让内向的人变得外向。”

截至采访时，暖建国和朋友们已办完第二期的开放麦。她们专门找了插画师定制海报，并在活动的前一周为演员们安排了线上工作坊，以便交流意见。在开放麦的结尾，她也鼓励台下的朋友为各自的社群打广告：“我希望大家以后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的网络。有了开放麦这样的一个girls help girls(女性互助)的空间后，自我赋权会更容易些，之后也有做更多事情的可能。”

“其实我的想法还有很多，比如办一些大家分享找工作经历的工作坊，还有女性自我防御课程之类的”，她补充道，“不过还是以脱口秀为主，其它的穿插着慢慢来吧。”

关注劳工问题、女权问题、英国本地的移民问题，以及参与当地的左翼活动

和蓝莓一样，德曼的政治化起点也始于去年的四通桥事件。在海报运动期间，他加入了一些讨论时事的电报群。因为大家的立场各不相同，群里很快就出现了分歧，而观点偏左翼的朋友们则又建了个群——德曼便是其中的一员。白纸运动之后，为了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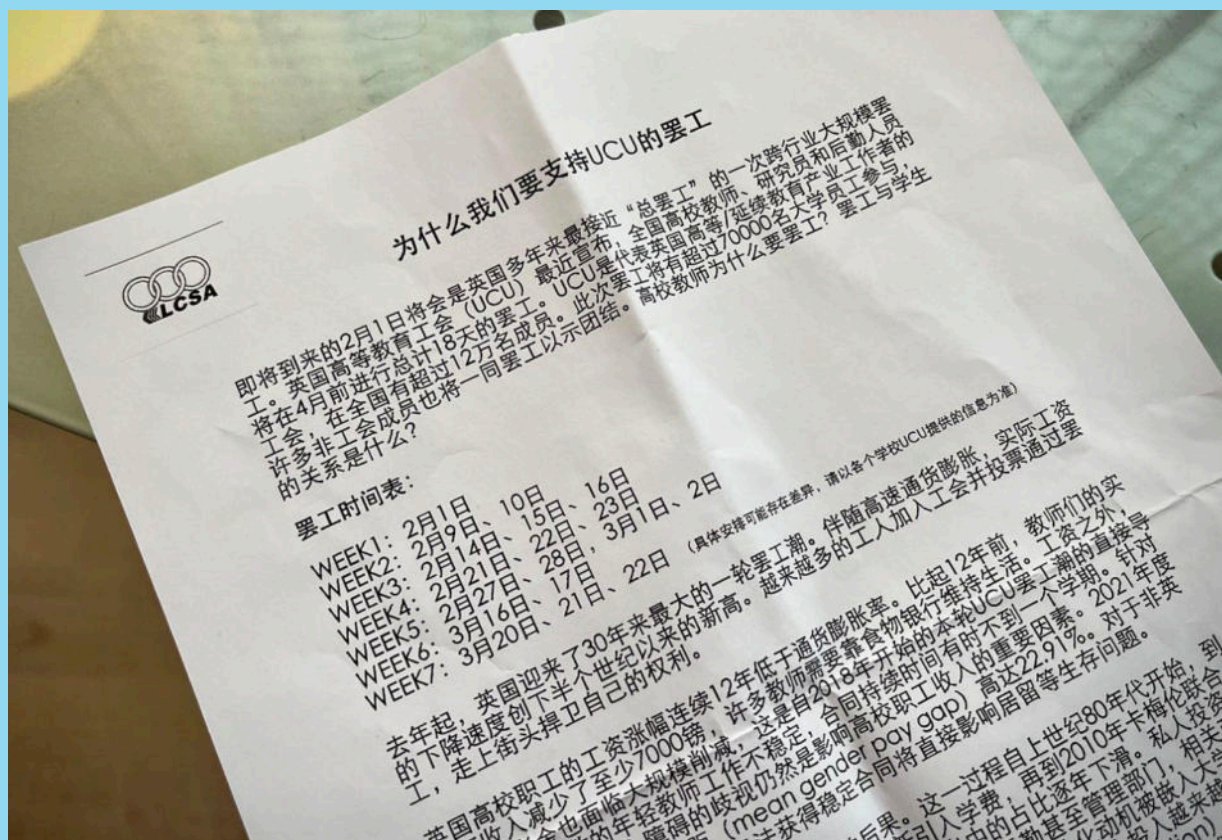
保持联系，德曼和朋友们在线下见了面，并撰写宣言，成立了左翼中国学生联盟 (Left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我们身处海外，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发声；我们希望联络留学生、行动者和组织者，参与和支持中英两国的工人运动，在全球反抗国家暴力、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之间建立联

系”——这是联盟成立宣言的节选。其实对于“左翼中国学生”，因为成员的想法各有不同，德曼也不能给出明确的定义。不过他总结说“大家的共同点是会关注劳工问题，女权问题，英国本地的移民问题，以及参与当地的左翼活动”。

在伦敦，罢工是件很寻常的事。特别是从去年起，因为急速通货膨胀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英国爆发了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潮，每隔几周都会有护士，教师，或者是铁道工人走上街头罢工。为了抗议大学教员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高等教育工会(UCU)在今年三月至四月宣布了总计18天的罢工。在这期间，中国左翼学生联盟的成员经常参加学校门口由教职员工设立的纠察线(picket line)³和大规模的游行。在罢工者人数较少时，成员们也会和老师交流，进而了解到ta们“不断降低的收入，不合理的师生配比，超额的工作时间，以及不能做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等状况。

³ "Picket line" 是指在抗议活动中的一种行动形式，通常是一群抗议者站在工作场所入口或周围，持有标语、横幅和标牌，以表达他们的抗议和诉求。这种形式的抗议通常用于工人罢工、劳资纠纷以及其他社会抗议活动。在工人罢工的情况下，工人可能会在工作场所的入口设立 picket line，以阻止其他人进入工作场所，特别是替工、临时工或公司高层。这是一种向雇主施压的方式，通过削弱工作场所的正常运营，迫使雇主采取行动来满足工人的诉求。



中国左翼学生联盟为支持UCU罢工制作的传单 (图源：作者)

对于德曼来说，参与罢工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和像是China Deviants 组织的抗议不同，这些活动有着更明确的目标和更明确的时间线——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内罢工，让老师们获得支持，才可以和政府谈判。所以这也是一种参与公民教育，或者说是积累一些政治经验的渠道吧。”

“而且我觉得不同国家的罢工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英国和德国政府对工会的打压就有类似的手段，所以不同的工会也会交流经验。很多学到的技能也是通用的，比如怎么演讲、怎么参与讨论、怎么分析工人情况之类的。”

此外，德曼也认为罢工活动和华人移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英国的大学的学生很国际化，老师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有移民背景的，甚至是中国人。而在UCU的结构里，移民老师的声音往往得

不到很好的表达。”

但另一方面，德曼也观察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对老师们的工资情况，就业情况，以及他们没有长期合同的现象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对罢工有一定反感。大家的学费又交得那么贵，他们就会觉得不应该罢工。”为了给同学们普及UCU罢工的背景，德曼和朋友们专门制作了中文的传单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将打印版在学校附近发放了近两百份。在由

China Deviants组织的李文亮医生纪念会上,笔者也收到了来自联盟成员的一份传单。虽然接传单在英国并不是件稀罕的事,但是头一次见到简体中文的纸质罢工倡议,还是让笔者感到陌生又亲切。

“我一方面想参与中国的运动,而另一方面无法忽略当地的政治,也想尝试与其它移民组织建立联系,捍卫移民在英国的权利”——在行动的过程中,德曼逐渐明确了自己作为“diaspora activist”(海外离散活动者)的身份。和华人朋友建立联系,一起做中国相关议题,让他感觉“比参加其它活动多了很多热情”;与本地社群相连接,则增加了他“对当地社会的参与感”。据德曼说,在罢工现场,经常有老师们对来自中国学生的声援感到惊讶。而他和朋友们也会将“中国的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障,罢工权利被从宪法中删除的现实”告诉对方。在之后的一次抵制反跨性别组织的活动⁴中,联盟成员还向来自本地的示威者们发放了英文传单,介绍中国跨性别群体所处的困境。

的社会主义,会去参加工会活动;而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在媒体层面发声。这就导致不是很容易找到大家都认可的方式,一起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现在的状况是大家共享一个交流平台,但更多的还是以个体的身份参与地方组织。”

“在英国本地我参加的组织里,因为大家的想法都太一样,会让我感到很奇怪。所以想法各异也是个优点。但我还是希望联盟里的大家能有一定程度的讨论,找到一个共同行动的方向,要不然这个社群也很难长期存在。” ■

图源:IG@han_zifei

不过,德曼也表示他对联盟未来发展的方向不是很确定。因为近期大家比较忙,也有一定时间没有新的活动了。成员们虽然在议题上的看法差别不大,但是行动方式还是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偏传统



⁴今年二月四日,Women's Place UK (WPUK)等反跨组织在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院召开了“妇女解放会议”(“Women's Liberation Conference”),引来酷儿群体的不满。

专访黄台仰： 最重要乃维持身 份认同



图源：徐青柠

《莽莽》团队早前前往德国哥廷根，专访香港行动家黄台仰。黄穿着衬衫，梳着背头，带领我们游览了小城城区和公园。我们辗转坐进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进行访谈，访谈途中黄的伴侣为我们送来几本由海外离散港人创办的独立杂志《如水》，黄本人也是《如水》的编委。

以下为访谈全文。M=莽莽，H=黄台仰

香港人身份认同与建立离散港人社群

M：来德国已经多年，你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

H：我目前还在念政治学和哲学，同时也在做不同的政治活动，比如（运作）Freiheit für Hongkong（自由香港协会）¹，或是去不同国家游说等等。现在的生活已经趋于稳定，尽管一开始有很多不确定性。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我的情绪便一直很低落，一直到最近一年，才重新开始找回生活的节奏。

M: 你会觉得德国是第二个家吗, 对这边会有归属感吗?

H: 我已经可以说德语, 了解这边的政治文化, 但我的身份认同还是香港人。我可以理性上理解德国的一切, 但是情感上比较难建立这个联系。所以我不会说德国是我的家, 它只是我的第二个base (居住地)。我在这学德语, 了解德国的文化历史, 我会取得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 但这个角度和香港的角度会有冲突。要我选我会更想选香港的角度, 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融入德国社会; 我学习了他们看待社会的方式, 但不代表我认同, 并把它作为我的选择。

M: 在外多年, 无法继续在香港参与在地的抗争、事务与连结, 你现在的身份认同与在香港时的身份认同会有何区别?

H: 我离开香港后, 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 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 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抽离的角度来看香港发生的事情。这种抽离感, 其实也有好处。我可以把其他角度的事情说给香港人知道。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这个角度也是这场运动需要的。这场运动一方面需要在地的人去感受, 去process (处理), 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人在外地去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就可以让整个运动有更多不同的面向。

一句话来说, 我还是一个香港人, 只是一个住在德国、了解德国和欧洲的香港人, 但是after all (毕竟), 我还是香港人。身份认同不是因为你在哪里住了多久, 或是因为你的某种行为就可以改变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很intuitive (凭直觉感知的), 很直观的东西。当香港人尝试和中国人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真的很不同, 这种不同会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在这边我可以和德国人聊天, 我也知道我们的foundation (基础) 是不同的。二三十年后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会超过在香港的时间, 但我还是会觉得我是一个香港人。

¹Freiheit für Hongkong e.V. 是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非营利性协会。该协会成立于 2022 年, 由来自德国和香港的活动家组成, 以应对香港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

与香港的连结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与取代的

M: 这样的身份认同有哪些基点呢, 是在什么样的基点之上构建起来的?

H: 这个基点就是我过去在香港的时间, 还有我与香港的人、历史、文化所建立的情感的连结。这个连结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与取代的。我现在在和德国建立一些新的联系, 但与香港的连结还是无法被抹掉。

我还是跟香港的事情、香港的人、香港的文化有很多连结; 我还听香港的歌; 我还在每一天看香港的新闻, 比我看德国的新闻更多。这些种种都可以构成我在这边继续去发展或是保存我的身份认同的因素。

M: 你觉得德国会是你一个长期生活的一个地头吗?

H: 我觉得会的, 这其实很实用主义。因为我已经在这边建立了一个新的support network (支持性网络), 还有我学了语言, 了解了这边的政治制度等等。比起我去其他国家, 我可以在德国为香港的运动做更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也会留在德国继续做跟香港有关的工作。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怎样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维持下去

M: 你曾说: “如何团结海外的香港人对香港人的海外社群发展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建立海外联系将是香港长期生存的生命线之一。” 在你看来为什么建立这样的香港人的海外社群对海外的香港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H: 因为我们跟共产党的斗争不会只有一代。我们可以看其他类似的民族, 比如说吐蕃人、维吾尔人、犹太人, 他们的斗争都是很多代的。而我们是第一代走出来建立香港人流散运动的, 我们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 就是要怎样去建立一个运动, 是可以sustainable (可持续的), 可以超越

代际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长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怎样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维持下去。

身份认同对我来说其实是整个跟共产党的斗争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个体性，没有自己民族的个体性的话，我们全部人都成为“中国人”，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去奋斗、争取那个目标的斗志。我们可以看得到犹太人，他们就算隔了那么多年，因为有一个关于家园的神话，他们每一代都会把回去以色列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我们香港人在外面也必须要把“争取回去香港，在香港当家作主”的目标保存下来，传到我们第二代第三代……最重要就是把香港人的流散族群可以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可以在外面把这个身份认同、把这个运动继续下去。如果第二代都已经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话，他们就自然不会觉得需要为香港去奋斗，那我们这个运动慢慢就会逝去，所以这会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议题。特别是对比其他民族譬如说吐蕃跟维吾尔，他们本身已经有很强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语言、历史等等。

但是香港人没有，香港人本来就是移民的城市，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从中国移民到香港。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很短。所以怎样去把我们的身份认同保存，现在大部分的香港组织都在问这个问题。

要把不同地方的族群连起来，组一个组织，有一个mechanism去讨论

M：要团结海外的离散港人，具体来说如何实现这一点？

H：我觉得组织化会是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他Diaspora Community（离散社群）的经验去看到，如果没有组织的话，那族群个体或是群体之间就会很容易有不同的矛盾，或是大家没有沟通就会有misunderstanding（误解），然后就不团结。我相信在中国的民运内部其实也有很多这类的事情：没有一个平台给大家去沟通，去把事情弄清楚。所以要去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给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联络沟通。我觉得就需要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去执行，所以组织化会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工作。

其实很多香港人的组织都了解到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组织。我们也知道需要一些比较松散的平台去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可以讨论不同的议题。但如果没有组织的话，在德国的团体有我们自己的要求诉求，在美国的团体有自己的诉求，我们之间没有互相沟通，那就会彼此认为其他地区组织的诉求不代表我们，我们的诉求也不代表他们，然后就会有矛盾、吵架、内斗、分裂，组织可能就没了。这是我们从其他地方的运动，比如在中国，可以看得到的例子。

我们从维吾尔人的例子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很多国家有很小的组织，但是他们会聚起来，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世维会”）。“世维会”就可以选他们的代表出来，然后这个代表就有代表性和合法性，去跟不同国家的政府聊维吾尔的事情，那就会把整个维吾尔的议题有一个统一的整合。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的平台的话，每一个地方他们有自己的诉求，那对于德国总理，有五个中国人（组织）的代表跟他说不同的事情，他应该听哪一个？过去在香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政治论坛、公民社会的活动，去讨论不同的议题，但是离开了香港之后其实就很难。所以要把不同地方的族群连起来，组一个组织，有一个mechanism（机制）去讨论，我觉得这在未来很重要。世维会的模式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世维会的总部在慕尼黑，他们每三年就会开一次大会，就是把各地组织的代表聚起来，然后去选他们组织的代表。他们因为有legitimacy（合法性），有从不同组织中获得的mandate（授权），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的代表性。中国民运现在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他们过去三十多年没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组织，让它可以继续跟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或是关注不同议题的中国人去聊，拿他们的mandate。

那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好像老一辈跟年轻一辈有很大的割裂。年轻人就会觉得他代表不了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系统和组织。

对于“世维会”，不是他们有了一个最高的代表就表示下面的组织没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或是自己的立场，有可能他们还是会有冲突，但是最起码他们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和组织，在此下面也可以有不同的议题。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从下而上的大台

M: 19年的时候香港人提出来想让运动“去中心化”，好像大家就不需要有那么中心化的“大台”。但是“世维会”好像还是一个大台，你对此怎么看？

H: 其实“反大台”是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开始，我那个时候是反大台其中一个很活跃分子。之后我们搞自己的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我们也主张去中心化，但是到了现在这个context（语境），我觉得是不同的。第一、需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反大台，反对的是一个“从上而下的的大台”，在2014年的时候，雨伞革命那个时候的大台²，他们管很多，如果你想让别人做什么，你必须先和大台说，大台觉得应该这么做，大家才会做。但是在占领运动头几天，其实没有大台，每一个个体都很有目标去做事，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运动很有机，可以比较efficient（有效率）地发展。当有一个大台之后，很多东西都变得很慢或是很僵化，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反对这一种从上而下的的大台。

到2019年，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大台去叫人做什么，每一个个体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很有机。所以整个2019年的运动就很有创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样、不同的活动。但是到了外面（国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从下而上的大台，是一个bottom-up的大台。那个大台不是要去管其他组织在做什么，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的工作，反而我们是把所有的组织组起来，全世界不同的组织组起来，然后有一个“品牌”，让大家去讨论，去把我们不同的想法尽量磨合，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会有共识，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为什么不同组织会有不同的工作，会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吧。

我们可以慢慢发展到一个更成熟的系统，一个更成熟的模式，比如选一些代表出来，不过我觉得现在还很早。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组织连起来，然后慢慢看有没有办法越来越“中心”，越来越组织化。在外面我们的距离太远了，没有一个international umbrella organization（“国际伞型组织”）³，或是一个international（国际性）的net-

²据BBC的报道称，“占中三子”和学运领袖被视为“雨伞运动”中的最主要的“大台”。

³这里的“umbrella”指的是象征性的伞，意味着该组织是一个覆盖和涵盖多个相关组织或机构的整体，它可以为各个成员提供庇护和支持。其可以理解为一个跨国的、整合多个相关组织的机构，为其成员提供合作和资源支持的组织。

work (网络) 的话,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 (的组织) 就会很容易慢慢分开, 我们原本的力量已经不大了, 越分越小的话, 我们的力量会更小。

M: 在德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 对于团结不同地区的港人你觉得有哪些困难?

H: 第一, 我觉得因为香港从来没有真正的民主。而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其实有一些条件, 我们必须要先学会, 譬如说我们要尊重怎样跟人对话, 因为在民主国家, 你一定会碰到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问题就是你怎样去处理这一个问题, 面对异议你的态度是怎样。在中国, 与共产党的主旋律不同的人他们就把他踢走, 关进去, 但是在民主国家, 譬如说在德国他们有AFD (德国极右翼政党, “另类选择党”), 德国人也觉得他们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不会把他们关进去, 也是需要学习怎样跟自己反对的人共处。

我觉得香港人, 已经比起中国比较成熟去接受、去对待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 但是还有很大的距离去学习。所以,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社群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很容易就会有冲突。这些冲突怎样去mediate (调解), 对我来说、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学会怎样跟我们不认同的人合作, 避免内斗。

只有打破大一统的框架, 我们才有空间去思考怎样去拥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

M: 在此想问一下“港独”的议题, “香港独立”这样一个看似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为什么香港人会提出这样一个政治诉求?

H: “香港独立”不单只是我们政治的一个最终目标,其实也是我们对于香港、对于整个中国理想的想像。香港没有可能独立,因为当广东、新疆以及中国其他的省不独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独立。

首先要定义什么是独立,有政治的独立,也有理想的独立,就是我们可以当家做主,我们不受其他外在力量去支配我们,这个是比较抽象的一个定义。香港独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我们可以跟其他中国独立的省——或独立的国家组成像欧盟一样的政体。香港是政治意义上独立,但是我们跟其他中国的省有一个对等的关系,不同的省、不同的人民都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这个地方的未来,我们这个群体的未来是怎样的。所以如果我们香港人不追求香港独立或是我们不敢去想香港独立,那我们就永远会困在大一统的框架底下,在大一统的框架底下有很多事情,比如共产党现在在做的事情就变得合理化了——因为我们中国必须要大一统,所以如果有一些人,譬如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让他们有不同的想法,而不同的想法造成冲突,造成这一个一统的国家“不和谐”,不和谐的话我们就需要“和谐”他们,所以就会有压迫的政策了。所以在大一统的框架底下压迫是必然的。

我们如果要让在中国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真正有他们的自主性的话,只有打破大一统的框架,我们才有空间去思考怎样去拥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这样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和谐,也就是民族共荣。

Identity

黄背后是哥廷根
阿尔巴尼广场纪
念碑上来自德国
诗人Heinrich
Heine的话:
“焚书者,终焚人”



在德国游说

M: Freiheit für Hongkong 有一个项目是“China Wahl Check”⁴。在过去参与游说德国政府的过程中，目前德国的联合政府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如何的，跟之前比起来，比如说默克尔执政的那个时代有哪些的转变呢？

H: 2019年香港的示威跟2020年全球的pandemic (大流行疫情) 其实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个turning point (转折点)，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转变。2019年香港的示威让大部分欧洲人包括德国人都知道过去他们想象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是不同的。因为过去他们想象只要通过贸易，当中国富起来之后，就会有一大批中产要求民主，然后社会就会慢慢开放。

在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时期是有一部分、某一个程度上的开放。但是从习近平开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慢慢地越来越威权，越来越封闭。2019年香港的示威，中共怎样去处理香港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因为香港有机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稳定，他们便会将过去许下的（一国两制）承诺摧毁。西方开始意识到在中共管治底下，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是很低的。

2020年的pandemic让他们了解到，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他们对于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强到一个点就是在pandemic爆发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是买不到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个人防护装备”) 的，比如口罩、防护服等。他们就意识到supply chain (供应链) 已经变得很依赖中国。经历2019年、2020年之后，他们知道过去对华政策是走不通的。德国在2021年举行联邦选举，我们搞这个项目就是想要让中国议题在选举当中有更多的讨论，因为过去在德国的选举中中国议题其实不是一个话题，大部分选民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其实都不会去

⁴China Wahl Check是Freiheit für Hongkong e.V.结合 2021 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发起的一项政治咨询项目，它与其他组织一起，询问联邦议院的所有政党打算如何应对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

考虑某个政党的对华政策是怎么样。我们希望让选民在投票的时候,知道某个政党的对华政策是怎么样的。

现在德国的联合政府(由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组建)在他们的政府合约当中其实都提到很多关于中国的威胁等等。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对华政策,存在一些复杂性和变化。SPD(德国社民党)比较左,更多关注劳工福利和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在考虑对华政策的时候会从德国内部的福利或者经济的角度去看,他们对华态度就会比较软。如果他们批评太多中国,不让德国的公司继续在中国运营的话,那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已成为中国的附庸国。

绿党和自民党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绿党)曾说过俄罗斯对于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中国在未来会是最大的威胁。德国政界其实已经意识到他们现在必须得改变对华政策。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过去20年建立下来的依赖没有办法很快地改变,所以他们就只能一步步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然后在未来才有空间去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但是我认为,大方向其实是已经在改变,在向着一个positive(积极)的方向改变⁵。2022年的俄乌战争开始其实对于德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因为过去他们也是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然后当开战之后就发现要制裁或是必须要马上找其他的天然气进口是很困难的。他们现在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中国真的打台湾,他们必须要制裁,那对他们自己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M: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你谈到说“德国的思维在整个欧洲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哪些地方让你会觉得不一样?

H: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德国跟集权国家的合作和态度:西德在冷战时期一开始是听从美国的态度,就是完全跟苏联国家或是东欧国家没有任何的往来,之后换成了SPD的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执政,其推行了Ostpolitik(东方政策)⁶。他觉得要通过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多的往来,来为他们带来改变。

⁵编者按:2023年7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首个对华战略,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希望在未来避免对中国的严重依赖。纽约时报中文网评价该战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对华立场,与之相比,前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曾将中国视为德国商品的巨大市场。

他那个时候的口号是“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编者译，“通过接触，实现变革”）。从他们自己的历史来看，他们认为这一套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开始跟铁幕国家内部的公民团体和他们的政府多了联系之后，慢慢改变了他们，然后才推动柏林墙的倒下或是苏联的倒台。所以他们已经有了这一个历史，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可以copy and paste（复制）这一个策略去看他们跟集权国家的关系。

所以德国在那么多欧洲国家中跟俄罗斯关系过去是最好，跟中国其实也是最好。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这一个历史的脉络的话，有可能就会很简单去generalize（笼统概括）为：因为德国人他们要人民币，人民币很香啊。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的方式而justify（合理化）他们这样做，也就是跟集权国家建立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他们看待战争，看待跟其他国家冲突的可能性。德国过去在讨论要不要给乌克兰发送武器的时候，其实在那么多欧洲国家或是西方自由国家当中他们是最不支持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送了5000个头盔，这就让德国成为了笑话，其实也是跟他们的历史脉络很有关系。不是因为他们亲俄所以就不送，而是因为过了冷战之后，他们对于战争，第一他们是非常的pacify，反战，觉得未来应该不会有战争，即使有战争也不会跟德国有关。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国防、自己的军队是没有太大的重视；他们也认为，如果他们送乌克兰武器的话，他们就会成为其中一个参战方，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mediate（调停）这个战争了。

美国很明显就是想要把不同的国家拉进去他的阵营，一起去压制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但是德国或是整个欧洲，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不应该take side（选边站），如果take side的话，只会把整个情况恶化，他们不想要再次进入一个难以摆脱的局面。

他们看现在中美的大国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会被他们过去冷战的历史经验影响到。过去的历史就是当所有国家都take side，然后两边就会冲突，就很容易发生战争。当Ostpolitik（东方政策）开始成为一个桥梁之后，那

⁶编者按：在勃兰特总理的领导下，德国推行了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称为“东方政策”（Ostpolitik），其主要目标是改善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德国的Ostpolitik旨在解决二战后的时期所带来的矛盾和分歧。在此之前，冷战局势严重影响着东西德之间的交往，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勃兰特认为通过对话和妥协，可以实现东西德之间的和解，从而减少紧张局势，促进欧洲的稳定和和平。

个冲突就慢慢降低,最后就让苏联倒台。所以他们就认为欧洲现在要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避免让这个冲突恶化。

他们还是相信跟极权国家、跟中国有联系好过没有联系,因为没有联系的话,中国就更大可能去做它想要做的事情;有联系则还是有可能有一个渠道去跟它沟通,让它不要做它想要做的事情,譬如说攻打台湾。他们还是会有一个leverage(影响力)跟中国谈判。

M:这样的政策有点像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跟极权国家谈判,保持联系,但另一方面你依赖它了,然后你的话语权就会降低。

H:所以他们现在的第一步就是要降低他们的依赖,同时也不要站在美国那一方去对抗中国。

当他们可以变得更独立的时候,以及当美中关系真的恶化,他们就可以成为中间人去避免战争,或是避免更大的冲突。当然,这是很美好很理想的一个想法。我自己认为,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不是因为很简单的地缘政治或是怎样,而更多是因为意识形态。

当西方国家跟极权国家两方的力量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这个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觉得这是时间的问题,德国跟欧洲需要选边站,最后还是要选边站。

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那个时候法国跟德国就尝试成为调解人,但是不成功,他们就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俄罗斯保持联系,就可以避免战争,可以谈判,然后有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但是对于极权国家来说,他们的理性跟自由国家的理性是不同的,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去维持他们的国家稳定或是他个人的支持度,比如普京。习近平也是,他有可能就是因为内部的问题而把问题转移去外部。我觉得这是国际政治结构的问题,这个结构的问题不是有了欧洲,有了德国成为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就可以改变它的影响。

M:你为什么会选择把德国作为游说的对象?

H:德国是欧盟其中一个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改变欧盟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必须要改变德国跟法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对华政策。我们是需要更多人在欧洲去工作,把他们的政策去推得更加对中国人有利。

美国因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就一定会对抗共产党,背后有很多原因,我们现在不说了。美国不太需要我们去推什么。但欧洲是一个关键的key player (关键角色)。如果欧洲不跟美国站在一起,美国是没有办法单独去对抗中国,因为欧洲就会成为中国的后门。所以其实欧洲才是未来共产党会不会倒台的一个关键。我觉得我需要留在欧洲,留在德国去做。

M:像你刚刚提到说,希望在欧洲,推动德国政府或者整个欧盟对华政策的改变。可不可以具体说从什么改变到什么的目标呢?

其实这取决于他们内部的讨论或者他们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因为我们想尝试去改变他们的对华政策的时候,还是有很多limit (限制) 的。比如说经济的limit,如果他们现在跟中国脱钩的话,他们的经济就会崩溃,这是一些我们很难去打破的一些限制。但是在这些限制里面,我们还是有空间,可以让他们变得强硬一点。比如说,在人权问题上,他们是需要也有道德的义务去更强硬支持在中国内部的示威者、在香港的公民社会。

还有就是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的问题也对他们来说是国家利益所在。如果中国打台湾,全球的晶片的供应都会打断,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关注的。他们可能想要维持现状,就是台湾不要独立或是怎样,那对他们来说就好,但是我们会提供另外一个我们香港人的看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维持现状,那我们就必须要支持台湾,因为共产党只有在知道没有可能“拿到”台湾的情况下才不会打台湾。如果它觉得其他国家不会真的支持台湾,不会制裁他们,不会对他们强硬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可以跟俄罗斯一样。现在我们可以推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们必须要跟台湾

建立更多的关系，必须要支持台湾，必须要准备，如果共产党真的打台湾的时候，你们已经有能力去制裁中国，那当中国看到他们是认真的，如果我真的打台湾，真的会有这些后果的话，他们就会三思。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有很多政治学者认为普京有一个miscalculation（错误的判断），就是他认为欧洲会分裂，欧洲不会真的太强硬。因为北溪二号才刚建立，他认为欧洲还是会软化，然后就重新跟俄罗斯做生意，或是好像2014年的时候叫停乌克兰，然后就让俄罗斯赢或是让他取得一些东西，这是他的miscalculation。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避免共产党打台湾，就是现在要把事情搞清楚，这不是现在德国政府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服他们要改变。还有就是在香港、中国内部的问题，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可以做。比如说对于香港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一些支持，他们过去对香港支持很多，但是对中国其实没有真的太多。如果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只有经济的话，那还是不够的。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让每一个国家跟中国有关系，通过一点一点的压力去推动一些改变。■



在离散时代，

(一)

我叫秦晓洁¹。从我到德国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正确地读出我的名字，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无论是我的姓里面的“q”，还是名里面的“x”或者“j”，德国人都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发音。从我上语言班开始，老师努力却又别扭地叫我的名字，就是一件令我们双方都觉得颇为尴尬的事情。

我曾尝试给自己起一个德语名字，比如叫Katharina。其实Katharina与我的中文名挺搭配的。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洁净”，或者“去除污秽”。毕竟我们女孩子，就是要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贞洁，而我的父母给了我“晓洁”这个中文名，也就是希望我能一直懂得爱护自己的贞洁。所以你看，无论中外，对女生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语言班开始到大学，我遇到的老师或教授们，都不愿意以Katharina的名字称呼我。首先当然是因为在大学当中，我们

都是使用“您”(Sie)这个尊称；而且由于基本的办公要求，我上课、考试都只能使用“Qin, Xiaojie”这个护照上的拼音文字。叫我Katharina，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额外的、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个名字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

而我的大学同学们，ta们都非常关心和爱护我，因此也强烈建议我不要改变我的名字。每一次我尝试跟ta们解释：我觉得发xiaojie的音对你们太难了，我就叫一个欧洲化的名字，这样子你们也简单一点，不好吗？ta们就会非常温柔地看着我，说：不，xiaojie，这就是你的名字。你完全不需要因为我们发不出这个音节就来将就我们。或者ta们会说：xiaojie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啊——尽管ta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这个名字的中文含义一无所知。

是的，我亲爱的德国同学不仅对我中文名的含义一无所知，对于我为什么想要改名的决定也一无所知。在ta们的认知中，一

¹这个名字并非我的真名，但故事是真实的。并且我相信，每一个名字中包含有j/q/x这三个声母的华裔侨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个新的“我们”

个来自经历过被殖民的国家的女生想要将自己的亚洲名字改成一个欧洲名字，绝对是出于长期殖民压迫后对于自己本身文化无意识的否认和贬低，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亚非拉前殖民国家文化压迫的典型例子。

出于对殖民主义做深刻反思的正义需求，我的同学们认为，阻止我改名是ta们的道德义务，否则，ta们就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殖民者没有两样。而ta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是具有深刻批判精神的世界公民，坚持每个出身于不同文化族群的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出身的文化背景生活，而无需按照欧洲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那一刻，我相信，我的同学们确信自己在做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正如ta们会告诉我们的黑人同学，你那天然的卷发非常美丽，你不需要像我们欧洲人一样把你的头发拉直。

我大学的同学这些想法，我是到了近一年来才真正懂得。当时的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ta们会如此坚持——无论对ta们还

是对我，发xiaojie这几个音节都是一如既往的尴尬。ta们不明白，或许也不愿去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并不会把改名这件事情看得无比重要。ta们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还有名和字的区别，名是父母给的，字

是自己取的；而且在古代，直呼其名，反而是一件极不尊重的事情。如果孔老夫子的同窗都一直称呼他为仲尼，李白的同事都

一直称呼他为太白，那么，我的德国同学同事，为什么就不能称呼我作Katharina呢？我想被叫做Katharina，难道不仅不是对我出身的文化的否定和压抑，反而是一种将自己的原生文化在欧洲的语境中发扬光大的有趣尝试吗？

（二）

很遗憾，当年的我没有这样的认知，以至于无法说服我的同学接受我改名的决定。在

经过几次无果的努力后，我放弃了尝试，尴尬地接受着我的同学们温柔但别扭地叫我

xiaojie，直到大学毕业。随着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我渐渐发现，我到底叫xiaojie还是叫Katharina只是“身份”这一巨大困扰的一部分而已。而冰山之下的那一部分，叫做：你是中国人。问题是，我不想被当作中国人。

从上学开始，我就意识到，学校的教科书中，尤其是语文、历史和政治课，充斥着精心编织的谎言，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又称韭菜）。离开这个由谎言构成的国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以为，只要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我就可以告别我中国人的身份。

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自从我来到德国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力突飞猛进，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在中共宣传机器的叙述中，中国在政治经济影响力上的不断提升将带给侨居国外的华裔更多权益——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宣传（Propaganda）。但是，确实确实，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侨民的“中国身份”被更深刻和牢固地确定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关中国的话题在同事的闲聊中经常出现，尽管我所在的机构并不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我的同事们有时会提起，ta们曾读过某些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也不时告诉我，ta们是如何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历史与伟大成就。当然，ta们也会经常提及，ta们又阅读了哪方面有关中国的报道，比如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以及

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迫害。在这些闲谈中，我负责扮演一个“中国专家”的角色，对ta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做出一个能令ta们觉得真切的（authentic）回应。

然而我并不愿意做出这种回应。一方面，我离开中国已经多年，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已经日渐模糊。

鉴于中国日渐恶化的新闻自由程度，无论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侨民还是专职记者，都很难获得关于中国的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我对中国的了解，并不见得比我的同事们多多少，也不会更“确信”——因此我其实无法扮演一个“中国专家”的角色。另一方面，这种被他人直接指定的身份也让我们不适：为什么我必须要扮演这种角色呢？这种不适使我开始进入一个固定模式：每当我的同事赞美中国的经济成就时，我会主动告诉ta们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城乡间的巨大差异，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衡以及种种结构性、制度性的歧视与剥削；当同事们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会“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尊卑长幼秩序的强调，及其背后厌女和排外的色彩；而当我的同事们提及中国的负面报道时，我则以“（被ta们指定的）中国专家”的身份告诉ta们，其实现实可能比报道中提及的更加恶劣。我以为，通过批判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文化，我能够切割自己的“中国身份”，能够让我的同事明白，我不想被当作中国人。然而我很沮丧地发现，这种努力多少有些徒劳，我的同事们并不能理解我的愿望。

直到近一年来，我才开始懂得，无论是我大学同学，还是我的同事，都在一个由种族主义固化了的社会体系中成长，ta们的言行也在不自觉地重复这种固化。简单地说：我，一个有着典型亚裔特征的人，只能扮演一个亚裔的角色，我是德国这个社会的“他者”。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融入”这个社会，甚至无论我是否努力，我的角色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但如此，我还发现，我越是努力去批判中国的传统和现状，就越是加强了 my 白人同事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通过我对中国的——在ta们看来更加真切的——批判，ta们可以获得某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非出于对专制统治发自内心的拒斥，反而是一种高人一等的立场：看，你一个外国人，一个“他者”，能够在德国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生活，难道不应该感恩戴德吗？

我不想再“融入”了，因为我不想要再当一个“他者”了。

转变的契机始于中国各地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封控之后所爆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白纸革命”。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对我意味着什么。出于一直以来对于专制威权统治的厌恶，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第一次抗议集会，但那一次集会的时候，白纸革命还没有爆发，参加集会的人更多是用自己的行动声援四通桥勇士以及反对中共的集权统治。但其实，除了带着多少有点恐惧的心情参加了一次集会，喊了几句平时不敢在公开场合喊出来的口号之外，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我依旧厌恶中国，也厌恶我的中国身份。并且，由于集会的参加者都用口罩墨镜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就使得“人”这个身份非常模糊，所以那一次的集会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

但我没有想到，海外多地爆发抗议集会的信息能够相对顺畅地传回中国各大高校和城市，加上长期的严格防疫封控措施已经让人忍耐到了极限，到11月底，白纸革命爆发了。和国内白纸运动参与者类

似，11月26号晚上，我们在勃兰登堡门前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集会基本上

是自发的，也没有人想要特意喊出抗议性质的政治口号，所以很多参与者都没有像

(三)

我现在知道，这种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边缘化、甚至污名化

那些与之不一致的文化习俗的行径，叫做“他者化”(Othering)。在我之前在德国度过的所有岁月中，德国社会一直将我视为“他者”，我也一直安于扮演“他者”的角色。我曾非常努力地想要“融入”德国的“主流社会”，

但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融入”这个词本身，就是“主流社会”为“他者”

量身定制的任务，并且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不想再“融入”了，因为我不想要再当一个“他者”了。

上一次那样戴上口罩，甚至很多参与者应该都和参与第一次抗议集会的人完全不同。

然而，在相对肃穆和沉重的气氛中，我突然觉得心底有些尘封已久的情绪被触动了。我在德国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中国面孔来到一个带有政治反抗性质的聚会。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让我有归属感的群体，一个新的“我们”，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反抗的“我”，而是一群有着相似经历和经验的“我们”。

我们来自中国，或许为自己能逃离中国这个社会而感到庆幸，却又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感到担忧；我们又都在海外学习生活，忍受着各种专为外国人或非欧盟公民所设置的限制，觉得难以把海外生活的地方当成家园。我们恐惧过、焦虑过、也彷徨过。我感觉到，如果我能成为这样的“我们”当中的一员，成为这样的“中国人”，不但不会令我抗拒，反而正是我心所向。

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两天的情绪都非常激动。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全世界的突发新闻都进入了多角度现场直播模式，在推特和Instagram上面海量的图片视频冲击着我的大脑。中国人，这个我以为我最熟悉的族群，以我最没有想到的样式呈现出了我最希望看到的团结、勇气和不屈

中国人，这个我以为我最熟悉的族群，以我最没有想到的样式呈现出了我最希望看到的团结、勇气和不屈的精神——当然也喊出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口号。

的精神——当然也喊出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口号。在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之

后，白纸革命这个名称已经遍传各大社交媒体——甚至包括中国那些接受严格审查的APP。在持续的亢奋中，我一边继续刷手机，生怕错过什么重大时刻，一边将自己各个社交媒体、头像都改为白纸革命的标志。到了傍晚，德国一台最重要的新闻节目Tagesschau在头条报道了中国爆发的抗议运动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位关系非常亲密的同事发来的信息：“我太喜欢你的新头像了”。沉浸在兴奋中的我看到之后就不假思索地给她打了电话，在挂完电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这次谈话完全没有重复过往的那种模式。这一次我没有把自己当作旁观者或者评论者；这是我参与的活动，是属于我的抗议，是我的政治表达。我并非被指定成为某一个角色，而是自己选择成为了其中一份子。而我的同事，也没有将我当作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来期待我表明自己的立场；相反，我能感受到我是她的朋友，而她在尽力支持她的朋友。我突然发现我原来可以选择成为“中国人”和被他人指定为“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那天晚上我更多的情绪还是兴奋和激动，我还想着要让更多的同事看到中



(乌鲁木齐火灾发生后，柏林华人在勃兰登堡门前自发组织的烛光悼念快闪活动)

国发生的事情。虽然ta们肯定都通过媒体知道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但我这次是真的想要给ta们一个“真切的”感受。于是我打印了几张抗议的图片，用二维码制作了相关信息，第二天一上班就贴在了我的个人

储物柜上。让我感到高兴和安慰的是，很快我的储物柜上就出现了同事们贴的纸条，传递了ta们对我和“我们”的支持，更有一位同事在数天之后悄悄地将 ta 从

台湾二二八纪念馆带回来的写有“民主”二字的小书签放在了我办公桌上。那几天我和关系比较近的同事们聊了很多关于抗议的事情，也聊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包括德国企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迄今为止仍然在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我渐渐发现如果接受我中国人的身份，为德国社会带来我自己的经验和视角，我反而能够更

好地在这个社会中找到属于我的价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对我的名字的思考。随着近年来女性运动不断推动，我愈加了解到“晓洁”这个名字背后针对女性的规训意味，也懂得“贞洁”是父权社会给女性带上的镣铐。但其实我一直并不讨厌这个名字，或许，这就是一种自我规

训。这种自我规训也体现在当我的同学表示我应该保留我的中文名而不要叫Katharina时，我选择了听从和接受；同样当我的同事赞美中国时我条件反射般地选择了自我批判与矮化。尽管随着我对德国社

会认识的不断加深，我愈加认识到德国社会也存在大量不公和压迫，但我仍然会强迫自己去否认这种压迫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正如我会强迫自己忘记Katharina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欧

洲语言版的“晓洁”，其背后是父权制对女性一模一样的规训。

在经历了白纸运动之后，我在我的工作场所宣布，我就是要以Katharina 作为名字生活。我不再让同事们自己决定是要嘴上别扭地叫我Xiaojie 还是内心别扭地叫我Katharina，我明确地表示我就是Katha-

只有将我的身份带入德国这个社会，丰富这个社会的视角，从而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更加习惯从多元视角来看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对抗“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群的“他者化”。

rina。一个中国人，也可以被叫做Katharina。不但如此，我的中文名和德文名的关联成为了我在工作上开启涉及女性权利谈话的一把钥匙。

在白纸运动之后，海外华人对于女性权利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些经验不仅让我在知识上受益匪浅，更是给了我勇气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如此之深，因而中国女性的反抗程度之强烈更加令人敬佩与震撼。通过讲述我的中文名和德文名之间的关联，我可以更好地将中国女性的反抗经验带给德国/欧洲。同样的，由于中国曾经以强大的帝国面貌出现，又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痛苦，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既承受了帝国扩张带来的代价，又经历了被殖民的磨难。这种经验在欧洲是非常独特的，成为中国人，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不必然让我成为这个社会的“他者”；相反我通过我的中国身份和视角，我可以带给德国社会不一样的反殖民主义视角，从而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也认识到，我不可能通过抹去我的身份来逃避这个基于种族主义而建构出来的不公平的价值体系，而是只有将我的身份带入德国这个社会，丰富这个社会的视角，从而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更加习惯从多元视角来看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对抗“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群的“他者化”。

我相信这种更加广泛的参与才是民主政治的真实意义所在，而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让那些一直被边缘化的群体更好地参与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之中。我很确定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必定有认同自己中国身份的人的位置——当然也必定要有穆斯林、罗姆人和辛提人以及酷儿群体等等被边缘化族群的位置。

“晓洁”并没有变成Katharina。“晓洁”，只是Katharina，名叫Katharina的晓洁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的一部分，更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年深度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许多问题，也产生了无数名叫Katharina的晓洁。而我相信，名叫Katharina的晓洁们将以我们独特的经历参与到全球化的问题当中，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我们的视角和方案。■



编辑部答： 如何寻找自己 的身份认同？

在发布了关于“人们”的三篇专题文章之后，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则读者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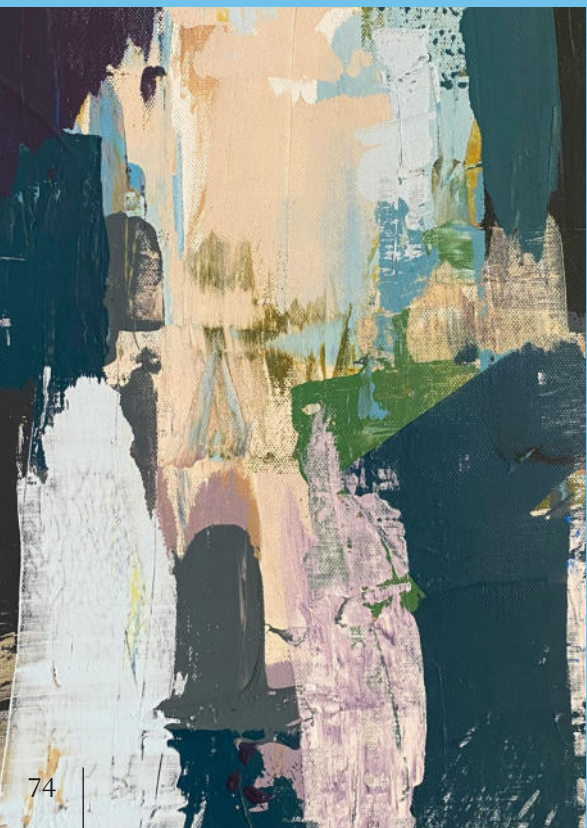
作为自我认知无家无国，并且是“最后一代”的内地dissidents，如何寻觅并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女性/LGBTQ+又如何交叉性叙事下，尽可能在国际抗争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编辑部的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摘录于此，意在邀请各位读者一起来讨论：“在离散中，我是谁、我们是谁？”

我是抵抗者，抵抗着
主流的叙事和书写，
去追求自我定义的权

三明治

利；但我又是流浪者，怀抱着母语和文化流浪，在异国被发生在遥远故土上的悲剧牵动，无法移开目光。我是亚裔，是中国人，体验过许多的异样目光，但也经常被另一些人要求站队，只因“你有身为中国人的原罪”。但我又绝不愿成为“伟大祖国”的一颗螺丝，而是追求身为人的尊严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我是汉人是男性，有着诸多特权和便利，交叉性让我省思别样的性别和民族体验，这与之前的迷惘相互拉扯、碰撞、撕裂。我在不同场合用过无数的称呼、标签和符号定义过我自己，是民族是性别是行动者是记录者，但这都只是碎片，我会觉得，这种挣扎和困惑本身就是最强烈的身份认同，我也看见了许多有着同样复杂感情的人。我无法给您确切的某个符号标签，因为每一个我都不确定是自己的全部，但我会希望这个专题本身能献给所有有这种挣扎的人们，我在这里，有着同样的焦虑和无助，希望大家彼此看见，彼此分享。



图源：vojtech-bruzek@Unsplash

川

我是酷兒，此身份在人生前期階段「啟明」了我，它是我後續的勇敢、不服從、質疑

和批判力量與「反叛」生涯的基點。

我是浪子，自由是我的翅膀，始終身處離散，遠離家鄉，不知道究竟哪裡是我的家園，但似乎走到哪裡，哪裡就會有夥伴與愛。

再後來，我是莽莽的成員，用行動與書寫來參與公共生活，它變成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上這些都不是我從故土誕生之際就自動生成的，它伴隨著我的自我探索，對「過一種真實的人生」的追求，一步一步領我至此，至如此的「邊緣」境地。但來到「邊緣」才發現這裡容納下許多人，善良又正義，我們在「邊緣」裡成為彼此的關照。

在離散中自由，在離散中邊緣，在離散中尋找家園，想回到某種家園，這樣的人能被稱為什麼人呢？如果有這樣一種家園，真實不虛，公義自由，我便是這樣的家園裡的一民，對這樣的家園抱有我的身份認同。

avocado

我覺得身份焦慮對我來說是邊緣身

份的推力和拉力。introvert、女性、性少數、精障、身在海外、語言基本只能用Mandarin連方言都不會用……等等邊緣性會讓我想擺脫這些東西，它們是在主流裡顯出powerless的，但它們又是我“僅有”的。我本能拒絕它們以擺脫無權威，但在那之外我還是什麼呢？若在那之中，去夥伴中尋找力量，又會因為疊加的邊緣性而感到失落。也許沒有人能完全與另一個人有同樣的身份，甚至自己曾定義過的自己也可能遭遇動搖和懷疑。

人需要群體，需要共享的經驗和被認可的感覺，但也沒有一個群體可以完全把自己包進去；如果有，那一定是忘了自己的某一部分。在歸屬感和自由感這一對有些矛盾的需求之間，我們怎麼樣才能讓心定下來呢？怎麼樣才可以相信自己？也許我們同樣在找，慢慢找下去。



莽莽 × VOCN: 五问五答



莽莽问VOCN:

Q1 莽:VOCN会将自己视为“媒体”吗,又是如何定位自身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呢?

VOCN:我们的账号会经常发新闻,而且会尽量确保发布消息的真实性,所以有媒体的属性,但我们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文宣台。文宣台是一个资讯的中心,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不同类型的信息,比如,新闻资讯,行动信息,文宣海报等等。文宣台不只是我们运营者自己的声音,也是给不同声音发声的平台,不同阵营的朋友都可以投稿,稿件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也就是不与民主价值相违背,我们都会发布。

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宣台一般是靠大家的投稿来运作的,但目前很少人投稿,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靠我们自己产出内容,有时候也需要我们号召大家行动。我们还是更希望看见能有更多的普通人能够站出来,往前多走一步。

Q2 莽:这个团队是怎么协作的,觉得比较辛苦/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VOCN:主要是不同的人手打理不同的平台,创作内容和发布都比较随机,基本没什么组织,大家平时一般都在聊天。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在于我们在做一件看不到头的事,很难想象我们的目标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想象自己在一条很长的隧道里,连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都看不到,但还好我们不是一个人,身边有人拉着手一起走,这样就不会太害怕。

莽:在VOCN的观察当中,2022年底中国海外青年行动者的涌现有哪些重要原因呢?这场运动的浪潮是一时之火,还是有许多过往积累?

VOCN:这场运动与其说是积累,不如说是中国异见活动的延续。提到社会运动,很多人会想到六四,但六四到白纸之间的三十年不是空白的。我们看见女权主义者、知识分子、人权律师、记者等等群体不停地挑战着政府的权威,然后被镇压。当这些声音都消失了,我们看到一个个普通人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比如李文亮、乌衣、彭载舟等等,而他们的勇敢鼓励了更多的像他们、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站出来发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莽:在VOCN看来,未来的在海外的华人青年行动者需要怎样的资讯和内容?作为中文内容生产者,我们又可以做什么来继续参与运动呢?

VOCN:我们的内容要让读者喜欢,也要回应我们面对的现实。中国的审查和宣传系统有巨额的资金支持且深入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在海外虽然没有资金,传播渠道受限,但我们不应该放弃做更贴近墙内受众的内容,关注他们日常关心和他们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尝试各种容易被接受的方式,比如迷因、短视频、播客等等,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改变的迫切,并且愿意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莽:VOCN对莽莽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有哪些建议吗?

VOCN:引用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萨义德的一句话“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我们共勉!

VOCN问莽莽：

VOCN：各位编辑平时喜欢干什么？有什么爱好？

Q1

avocado：怨声载道（不是）。丧的确是日常的底色，每日纠结、发牢骚、发疯，搁哪哪不舒服，不知是我太无能还是就对这个社会过敏。因为不舒服，所以会服用精神止痛药（刷短视频！奶头乐流量贡献有我一份！），所以会被迫思考自己为什么这么不舒服，所以不得不做出行动和保持发声。我想，把个人的怨言摆到台面上来讲就是让社会问题显现的过程。

川：去逛超市算是平时的一项生活爱好，喜欢看超市里各种食物。喜欢去有水的地方散步或者坐下聊天，特别喜欢沿着小溪小河一直走，蹲下观察澄清的河水，还有去山里徒步。

三明治：现在我都已经无法分清什么是平时，什么时候是特殊时刻。如果说有什么爱好，可能就是宅家敲电脑刷刷打游戏吧。高强度关注社会议题带来的后遗症便是时常burn out，i人只想躲进安全舒适的空间恢复独处能量。

VOCN：你觉得在2023年办一本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杂志和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期间办杂志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Q2

avocado：一百年前的杂志承载了“公众启蒙和教育”“政府监督”等等重量，这样的意义在当今仍然是作为媒体的杂志的内涵之一；但大相径庭的是，一百年前的实践仍有“精英拯救底层”的悲悯色彩、具有理性说服的目的，以及建构出一个“我们”和“他们”的分野；而现在，我不太接受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我倾向承认每个人都有其独到的经验及其提炼而出的知识，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些经验和知识看见彼此、产生碰撞，重视不同个体的而非去创造僵化的共同体。

川：一百多年前的时局是把救国与爱国为主题，百家争鸣思想相对开放，当今的环境与之大不相同，国家处于和平中，而改革陷入停滞以及倒退，

爱国亦被重新定义，真心想要爱国爱民的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如今办一本同样也是“爱国”的杂志，我们并不想把目光聚焦于大而宏的制度改革，而是想要关注细微个人的力量与改变。我相信人心的改变是更加重要的，坐等那个制度性改变的時刻只会将人的希望耗尽，而在小的环境中作出我们的选择，让民主自由等价值在更小的环境中孕育发芽则更有希望。

三明治：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在今天办杂志有了许多便利的工具，譬如互联网；然而也正是这些便利的工具使我们即便身在海外，却仍然处于审查和恐惧的阴霾之下。在互联时代，简体中文的书写和表达空间已经深度融合，我们的语言环境和媒介已经被大量的垃圾和糟粕侵蚀。在遥远的过去，或许书写只是诸多抵抗方式中的一种，但在21世纪虚拟高墙的围栏之内，书写却成了最前线的抗争。有时我会羡慕那个时代，那个使用笔名便可隐藏身份的时代，那个书写过程是高度私人的时代。

Q3

VOCN：在理想的状态里，莽莽是什么样子的？

avocado：在莽莽的名字诞生之初，我就希望它可以拒斥一种“树根-树枝”有权力中心和边缘的想象，而是让一株草影响另一株草的生长。虽然这个世界仍然在按父权、强权的制度运行着，但在这个框架的缝隙之处，有自主自治的实践在生长。我们不具有固定的根，我们的游离性质让我们孤独，但也易于连结。在这个新的想象下，莽莽可以做到多元的记录和表达，鼓励每一株草的言说。

川：对我而言最内核的一点是：恢复用母语书写、记录的能力。沿着这一点向外伸展，对于身处中国的人们，我希望莽莽可以成为一个流散媒体之平台，支持国内想要书写记录时代的人；对于身处国外的人们，我们也希望借助莽莽的平台号召大家书写“离散”中的生命故事，即生活在不同文化、语言中的华人的所思所察所想。莽莽可以说是一个民间组织，希望汇聚更多民间的力量和声音，我们想看到每个人主动地来思考、写作与行动。

三明治：莽莽是一个可持续社会参与方式的实验。在越发逼仄的简体中文世界里，人们对社会参与的想象力也在被固化和局限，20世纪初的革命神话，亦或是更为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常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在如此

宏大的叙事之下，行动者往往像木柴一样，在做出最激烈的抵抗后燃烧殆尽。莽莽的团队成员并不希望成为一批新的木柴，而希望探索出可持续的道路，让社会参与和关注公共议题变成可以触及的日常。莽莽希望作为记录者和解惑者，通过记录和呈现让同温层相互看见，重新激发干涸的想象力，让社会参与不再遥远和高门槛。

Q4 VOCN:办纸媒会紧张和害怕吗?给我们讲讲是如何寻找发行渠道的吧。

川:倒不是因为办纸媒而感到害怕,恐惧是来源于国家机器对我们想要夺回母语、争取自由这件事的威胁和压力。我们目前仍然是独立印刷,通过与全球的独立书店合作发行售卖。

avocado:紧张和害怕是纸媒诞生后引发的一系列关注才产生的(笑),最初创作团队都很喜欢纸质刊物。纸媒的意义大概在于,如果我们要做“记录时代”这件事,时代不仅是电子荧屏上被压缩成平面的信息,还包括具有触感材料,在这一刻选用的色彩和纸张,在这一刻落实的印刷策略,在这一刻通过线下的某次邂逅递送至读者手里,都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

三明治:与其说莽莽是单纯的纸媒,不如说是一个更加多元的独立媒体,视觉呈现和互联网传播已经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出版纸质杂志的重要性在于,一旦这一批杂志印刷完成并出售成功,那么任何审查和强力都无法再将其追回销毁,它们会像火星一样溅落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目前我们主要依托独立书店进行线下售卖,或使用他们的网店系统开售。我们鼓励读者走进莽莽的合作书店,不仅是为了购买莽莽,而同时能在这个虚拟时代感受纸质书的珍贵,荒诞的时代之下,最古老的纸张仍然将许多内容印刻留存,在富有活力和弹性的社会当中流传。

VOCN:喜欢公民文宣的IG策略吗?如何看待搞笑或者幽默的作用?

avocado:喜欢,在任何时候能让人笑出来永远是一件有力量的事!不仅活动脸部肌肉、舒缓身心,还能引大家一起笑,营造心照不宣的集体默契。只要这笑朝向权力上位者(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就可将笑声作为武器,毕竟我们被虎视眈眈的、被竭力剥夺的,除了万般自由,还有“快乐”这件事啊。只要我们保持快乐,我们就胜利了。

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幽默的背后是大家对某件事有着深刻的共识和无奈,有时候直白地表达并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而幽默则能使共识的力量抵达更远。我们看到国内的年轻世代在万圣节的时候也是通过某种幽默的方式来作表达,它的力量与传播都很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公权力那种严肃的管制效力。幽默的权利也属于民间,有人想造神,而我们就要对之大笑,笑他穿着皇帝的新衣是非常有力的。

三明治:我很喜欢一部日本电影是《笑之大学》,讲述二战时期一位日本喜剧作家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审查人员不断要求修改作品以契合审查要求,却逐渐被喜剧背后的幽默点子所打动,独自一人在冰冷无趣的办公室内放声大笑。搞笑和幽默是最好的解构力量,一切的高屋建瓴在发自内心的幽默面前都会崩塌。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之下,幽默的素材往往来自于荒诞和矛盾,而在无穷的悲剧信息流之下,能够偶尔看到一则直击要害的幽默讽刺,许多时候真叫人拍手称快。■

性與別

GENDER

我们每个人通过共同努力，
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女性和酷儿力量的世界，
这是一个超越父权模式的异域。
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面容，
认同自己，
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秩序。

女权主义者 群谈：

社运中的性 与性别

自去年11月反清零抗议以来，中国内外又发生了许多起公共事件，海外华人社群也在挣扎中成长。然而，抗争活动中的厌女言论、活动中的性骚扰事件、社群建设中的性别考量，都在考验着新生的行动者。当性别平等的目标被更多人重视、其内涵也允许更多人进行诠释之后，我们如何进行公共行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邀请了一些女权主义行动者并与之展开了一番对话。她们来自中国和台湾，也长居于不同的大洲，参与了去年以来的公共行动。我们想知道她们看见了哪些问题，又有怎样的回应和期待。

受访者：

松子，媒体工作者

Casey，线下行动者

海月，南墙冲撞者



Q1: 可以说说你是如何关注到女权主义的吗？

松子 我高中是念女校的，那之前自己其实有些厌女（虽然当时还不知道那叫厌女啦），觉得念女校的女生心机会比较重、会对彼此很差……可是真的聚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女性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而且在一个全女性的环境里，其实每一个女性都可以做到所有事情，而不是只能做“女生”的事情，所谓的搬动重物啊，或者 computer science 等等。我才发现自己对女性的认知真的太少了，是从跟（女校的）大家开

始相处之后，才会去想女性是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凝视的、我是怎样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

到大学后我念了社会系，对理论会有更多的认识，能够解析自己的个人经验。但是——最有感触的还是工作之后，因为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大家彼此之间可能都还有那种彼此尊重的距离，阶级感也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其实没有因为自己的性别或年龄而有很不自在、受压迫的感觉。但是到了职场以后才会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其实是有很多枷锁和天花板的存在，“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因为是女性而不能做什么或必须做什么”，这些感觉都是在职场中才变得强烈的。

Casey

自2018年的MeToo运动以来吧。我最开始比较关注香港和台湾的政治议题，然而在参与政治议题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一些性别方面的问题。包括我当时在网上关注的一些所谓政治大V，他们都有出现性骚扰女性的情况，这就是我从政治转向关注女权视角的一个契机。实际上在讨论政治议题的时候，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他们一方面在书写人权的平等自由，另一方面又对女性进行性骚扰，这两件事之间是逻辑不通畅的，是说过去的。

我其实一开始是觉得女权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被拎出来，因为人类的权利是一个共同普遍的话题；但是我发现在同样关注政治民主自由的人群之中，对女性权利的忽视是非常常见的，他们可能会在劳工或老年人的议题上发声，但唯独在性别议题中失了声，这让我确认了女权主义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海月

我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生出一些违和感。我出生于一个民风非常保守、思想非常封建、氛围非常男尊女卑的一个地区，我成长中所受的规训也会非常强，但也隐约有不公平的感受。后来我发现这些不公平，似乎、有可能、好像，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女的。

大概中学的时候我会开始看一些人文社科相关的书籍，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波伏娃的著作。我看了波伏娃写的东西之后，一些常年在我心里面感到非常困惑、感到不适但是又难以说出口、难以形容也找不到原因的一些东西，感觉像是得到了解答。于是我开始想女权主义会不会是一种答案。我在那之后就开始看更多的女权的书籍，也开始关注女权相关的动向。

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或者说公民运动是相对蓬勃的、一个peak(高峰)的时期，我了解了很多行动派的女权主义者。那时我正读中学，所以觉得她们年纪似乎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大概就是我姐姐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她们非常厉害和帅气，希望自己以后上了大学也能做类似的这些事情。只是我上大学之后，中国的公民运动遭到了全面打压，许多女权行动者就被捕或流亡海外了。

Q2: 你是如何将对性别的思考转化为行动的？在行动中你观察到了怎样的性别差异？

松子

我在这些女性的参与者身上，我除了感觉到彼此的存在，也感到了另一种运动的形式，可以是温柔的，可以是理性的，也同样可以是强烈的，不必是某一种男性期待下的政治抗争的方式。我

参与过大家一起做标语，大家会有各种想阐述的书写标语的方式，但并不会有一种说教感，“我比你懂，你的标语一定要怎样怎样”，会给我一种很包容的感觉。我在当时也会遇到几位男性，私下也有联络，他有时会说：“你不觉得这个团体太过年轻了吗？”他就是会摆出自己才懂抗争、认识更多更厉害的那种中老年海外抗争者——他们才懂什么是抗争的姿态，会小看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

但其实我年纪比较大，这样讲虽然有点奇怪吼，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作为台湾人，我应该蛮了解抗争的（笑），但是你看，原来只要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就要“请一个男性来教我怎么做”诶。其他女性就会倾听我的话，或者请我分享作为一个台湾人为什么要来这个现场，也会跟我分享她们遇到的状况。

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大家明明都想要做好一件事情，或者想要关注某一件事情，可是好像只有符合男性的期待才可以被尊重、才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好的抗争者，连在这种对抗强权的事情上都还有性别的压迫。我就会觉得很吊诡。

我想要肯定跟我分享的女性抗争者，让她们知道选择的方式和做的事情并没有错，对的事情就是接纳不同的人、尊重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背景和诉求。错误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要再实施性别或年龄上的压迫。不符合他们期待并不代表我们做错了，错的是选择压迫。

但是社群里的女性的确会不那么想再投入可能会有男性出现的场合，如果有男性出现了，女性可能没有那么愿意沟通。我会觉得很可惜，但如果是我自己遇到的话我也会超级火大，就觉得：这些烂人，我有什么必要好浪费时间啦！所以我个人会愿意去跟其中的女性个体

做连接，然后肯定她们。

Casey

我自己所在的行动组织里面基本都是女生。具体在参与集会的时候，男女比例差异

不是很大，但女性的活跃度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也会更加用心。比如在演讲环节，我们观察到女性的演讲基本都是准备好的稿子，会比较流畅、完整地分享出来，男性就算没有准备稿子也会直接站上来讲，有些就会支离破碎一些。也有男性讲得很好，我们也不反对即兴发言，但是我觉得在对于社运的认真程度上来说，有些男性是不够的。

海月

我在上大学之后接触和介入了很多公益项目。我是一个在国内做实打实公益活动的人，所以我

最关心也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行动，持续到现在也是。我对于海外有些人的做法其实挺疑惑的，我最经常出现的困惑就是“你们为什么不做事呢？！”通常看到ta们都在线上聊天和吵架，在各种群聊里、在推特上发表自己的高见，基本就只干这些事情。这些人吧，什么性别都有，但还是以男性为主。

在海外，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会设计一个大的任务，然后把这个大的任务拆解成小的，再拆解成各个step（步骤），然后每个人按能力和时间志愿认领，如果凑不齐人的话那这个任务就放弃。于是我就发现了，脚踏实地真真正正把该做的事情做下去的人往往是女生，交出了完成度还不错的成果的人也往往是女生，而男的在干嘛？还在聊天。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都不缺席，也继续发表自己的高见和互相吵架，但是他们不做事。当然脚踏实地的男性和夸

夸其谈的女性也都有，但都是少数。

我们前阵子六四的时候也组织了一个集会，在筹备会议上来了十余位男性和三位女性，95%的男性在会议上指手画脚指点江山非常起劲，发表了一些非常不专业也没有任何价值的意见和评论。回过头来，我们参会的三位女性忍不住吐槽：实在是受不了这些人，有这些时间的话事情早就做完啦！

就像上面说的，一场集会是需要拆分成很多子任务的。比如宣传，需要做海报、传单、小册子甚至展品；比如现场策划，一群人凑在一起要做些什么事？这些需要有人去想和推进；再比如所有环节涉及到什么物资，需要汇总、做预算，以及准确地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和撤下、清点。负责做这些的基本都是女性。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现场的安全控制，比如提醒大家做好安全防护、警惕是否有官方或粉红的人等等，到了这个环节——男的终于出现了，好，谢谢他们，他们就会做出一副“我们可是非常努力地保护你们”的姿态来维持秩序。他们很容易沉迷于“抓兔友”（编者注：“兔友”指民族主义的中国爱国人士），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小粉红站

出来和他们对话（互怼）。可能就因为他们过于执着这件事，所以维持秩序、疏导人流的工作会做得很混乱。

对我来说这不是“缺乏性别视角”，不带性

别视角意味着真的不在乎性别，是什么性别都无所谓；但很多男的有非常强的identity，“我是男的”和“其他人不是男的”这件事他们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们觉得男的就天生有更优先的发言权和更高的领导和指挥地位。

Q3：你怎么看待“女权主义者”和“行动者”这两个身份认同？

松子

其实怎么定义行动者呢？在海外看到中国社运的话，我可能并不算是其中的行动者，而比较像参

与观察的人。虽然也有做很多事情，我依然有参与沟通、提供我的想法我的建议，也跟着上街或者帮忙摄影，但我觉得在情感上、角色上可能并不是完全身处其中的。女权主义者的话我觉得我一定是。

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更愿意跟中国人开启沟通本来就不容易，可是我愿意沟通，这跟女性抗争者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她们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到很共振，我们在东亚文化下、中华文化下受到类似的压迫，我觉得很快就可以共鸣，

从她们的自述中可以很快找到自己的一部分。我觉得她们才让我更愿意去倾听和了解，那种感觉是很亲密的，



我们没有清楚地去讲我们是哪一国人，而因为我们是女性，让我们更愿意跟彼此产生一些联系。

Casey 我会觉得行动者是一个你自己选择的职责，或者类似一份工作；而女权主义者可能是你居于的立场，它并不是统一维度上的事情。在履行社会活动家这样的职责时，可以以不同的知识背景介入进去。有些人的答案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立场优先于职责，有些人相反吧。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会觉得在白纸的时候，我作为社运人士的职责是超越于女权主义者身份的，毕竟白纸是一个包含了各种权益诉求的运动。

社会行动需要被当成一种工作而不是生活，而女权主义是一种可以在生活中去贯穿的东西，在生活的每时每刻和朋友交往的时候都注意到女权主义的视角，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也可以去思考如何更尊重女性。但是社运一定程度上需要有工作道德和准则，并不能完全由个人的立场去影响它。我个人体验上来说，参与社运之所以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是因为在社会运动中接触到的人未必能够成为你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在白纸运动中会有一种想要和集会上的人做好朋友的那种愿望，但这种愿望也导致了后来很多的纷争。

以及我觉得女权主义是一种反思权力结构的视角，并且它要身体力行去维护作为结构中弱势那一方的权益，那么其实它指的是随时随地反思权力结构的不平等，融入关怀弱势的视角。我觉得一个人的身份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并不能通过一个独立的身份去推断其在结构中的位置。我们其实很难去回答一个来自城市

的女性和一个来自偏远山村的男性之间的权力到底谁更不平等，所以我们如果沿用单一的视角，可能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

可能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如果女性掌权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但我觉得未必，我觉得一个女性并不天然地对弱势者有同情心，或者拿到权力的时候会比父权掌权者做得更好，如果一个人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的话，她可能会开始享受自己的权力，而失去以前内心坚持的主义和理念。

海月 我会认同这两个身份，不会特别强调哪一个，因为我两边的事情都有在做。而且我觉得它们的界限并没有那么的清楚，至少在我身上，它们互相影响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是看着国内的那个时代衰落、想加入却无法加入的一批人，我对于行动的启蒙其实就是女权五姐妹，她们当时发起的占领男厕所、反家暴的行为艺术我至今想起来还是会全身起鸡皮疙瘩，这是我对行动最原初的想象，所以对我来说女权主义就意味着行动。

Q4: 你如何看待行动者或社运人士的性骚扰事件？

松子 我听说身边社群出现这类事件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恶心，在这种大讲某一种正义、道义的地方竟然还会出现这种事，让人真的很愤怒和冲动。但是每个人应对这样的冲突事件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有可能直接拒绝跟当事人继续互动，甚至直接退出社群等等。我自己觉得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在工作场合，只要存在

权力关系的压迫，其实都会影响到人际的连结；如果要站出来打破沉默，那个人原先资源和机会都一定会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但我们是肯定不可能只有屈服或者接受。我自己也有些性别压迫上的经验，我某一天想到，如果不说出来，好像大家都会接纳、默许这种事的发生，所以我自己还是蛮愿意分享和聆听相关经验的，我觉得自己可以分享更多资讯、接纳更多的个体。

Casey 我不觉得女性占主导的群体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在一次相对活跃的几位集会参与者私下的聚会上，我们发生了一件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事件。我们当时有三位成年女性，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而那名男性大概是十九岁左右，其对女权主义和政治都还处于较为懵懂的状态，而我们这些女性在各自的领域至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或者至少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个环境里，我们当时讨论到性少数和性骚扰的议题，有一位最年长的女性突然主动去拍这个男生的屁股，开了一个关于后庭的玩笑。这个男生当时显得很慌张，我也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一件性骚扰。后来那个男生离开了我们聚会的客厅，到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缓一缓情绪，我们其他人轮番进去安慰他。后来那个男生离开了，这位当事女性和我们说自己并没有做错，她的意思是，也想让男性体验一下女性日常所面临的性骚扰，所以做

出了这样的举动。当时我沉默了很久，第一是我仍然不确定这是否属于性骚扰，第二我也没有勇气立刻指出来有什么不对、站在这位女性的对立面。事后我因为其他原因，和这些女性就没有再玩到一起了，一直也没有机会说出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在安慰那位男性的时候，他有表达自己被骚扰了，希望这名女性跟他道歉。虽然在当时情景下他得到了道歉，但我知道那位女性并不是真心的。

所以在这个团体氛围里，其实性别角色是反转的，我们是相对的权力上位者。我觉得性别在社运或政治之中，和其他许多身份一样都需要被看见，例如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和神经典型性(neurotypical)¹群体之间的权力差异，身心障碍者和无障碍人士、老人与年轻人，移民身份和非移民的权力差异，这些不平等状况是同时存在的。

还有一个细节想分享。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会反对集会中男性提出的“操你妈”这句口号，但是当个别女性在群聊里强调“Y染色体”并对“具有Y染色体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棘手的事件，这里就涉及到顺性别女性对性别多元群体的歧视行为。虽然在这个群聊里的跨性别朋友没有表达自己的不舒服，也可能根本没有看见这条消息，但是我觉得自己无法给予这种行为以包容。

¹以下内容引自科普平台青衫Aspie《初识神经多样性指南》：“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gence 或 neurodivergent, ND)也被称为“神经非典型”(Neuroatypical, NA)。它的意思是：这一人群神经发育与神经典型人群(Neurotypical, NT)并不一致，因此在社会交往、注意力、学习、协调性、情绪和其他心理功能上会表现出不同。神经多样性是一个伞状术语，下面包含了好几种障碍，比较广为人知的有：自闭症/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及多动障碍、发展性协调障碍、阅读障碍、书写障碍、妥瑞氏症等。如果有其中任何一种或者多种障碍，都算是神经多样性群体的一员。

我所在的社群里面，真的有男的说过这样的话：“你跟着我好好做事情，我给你分配女朋友。”——还不是“找”女朋友，而是“分配”，我当时就要抓狂了！我不知道有些男的凑在一起到底要做什么，可能就是兄弟之间互相吹捧、彼此得到心理安慰，并且幻想自己这种英姿飒爽的样子能吸引到妹子，脑子里也就这档子事了吧。他们在群体里就是会表现出这种对建立性缘关系、增加性吸引力的期待。在社群举办的沙龙活动里，很多男性就会试图在这个时候展现自己的男性魅力，很多发言的出发点似乎就是“你看我很帅吧！”

如果社群内部出现了性骚扰事件，首先肯定要有机制和规范，有一拨人来负责仲裁，总体人数必须是奇数而不能是偶数。这个仲裁小组需

意味着没有谁高人一等；如果说出了具有偏见的話，那在这个社群内自己的credit(信用)也算是砸了。所有参加仲裁小组的成员都是要把自己的credit赌上的。

仲裁小组如何行动呢？首先需要对所有的当事人和证人进行取证，收集了所有的证词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些证词交叉比对、尽力来还原事情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撒谎，在持续的追问过程中也会撒不下去的。还原出来之后，这个事件可以成为一份落在纸面上的报告书，然后以这份报告书为基础去回应指控方和被指控方的诉求，协商之后落实诉求。这个流程听上去很简单，但是非常的磨人和花时间，总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卡住。这个对所有社群都是一种考验。

Q5:你希望未来的集体行动可以怎样囊括性别视角？

松子

我有看到一些以女性为主的群体，我觉得是很好的发展，赋予她们权力是很重要的。女性应当被鼓励说觉得不对劲的、不舒服的、生气的事情，“女性的声音应当被听见”，这个自信心的建立过程是很重要的。以及这些让你不舒服的事，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你说出来了或者为之做点什么，可能都会帮助到其他也在受这件事困扰的女性，我觉得那个群体和社群的感觉是可以慢慢建立和培养的。

我自己是在做一些纪录片的工作，在记录过程中我会很注意女性出镜的比例，如果在现场我捕捉到了一位女性，她发表了观点，我一定会把她放进去的。但是不管在海外还是台湾，愿意发声、很有自信的真的蛮多是男性的，女性



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来牵头，即对性别和性骚扰议题了解的人，那么小组可以开放给社群内的人参加。

但这也对社群成员提出了考验，因为这不是一个法庭，而是一个内部调解，内部调解就意

很难找。愿意为某件事发声、愿意露面被审视、以及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发言的女性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找到。

我记得MeToo运动有一个很触动我的点。父权可能用了很多种方式，让女性彼此产生对立、互相厌恶或者自我厌恶，但最后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父权带来的伤口，让我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并且团结在一起。女性的团结和发声其实都真的很困难。



的权利认受性还是要公众去赋予的。我希望对于权力的处理，可以在社群的每一个细节里去贯彻。

Casey 对于未来的社群、管理者或者核心成员是很重要的，可能并不能够只由那几个对社会议题和政治参与热心的人来担任。一个对政治非常热衷的人，TA可能比较擅长去演讲，或者去跟别的团体之间做外联，但是社群管理者可能是一个需要更加冷静和随时反思的人。如果是一个新生的社运团体，个体就首先要思考自己要做一个非常involved(介入)的角色，还是moderator(调解人)，社群也需要通过例如投票选举的方式去选出你认为适合做moderator的人，而不是说话声音最大的人。在此基础上，可以再设置一些运行机制。我所知道的是，很多运动的规则都是“管理者”自己制定的，而“普通群员”是没有话语权的，那这个跟中国政府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对于强权的模仿。在一个社群中，可能做不到像去中心化那么权力平均，但是，社群规则

海月 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是，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看了之前或现在的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大选，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大家似乎觉得只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只要大家能够投票那就是民主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民主是一种能力和修养，很多人即便处于民主社会也不具备这个素养，拿着那个票但是没有什么用，还不是乱投或者直接就不投了。我希望在这一点上做出改变，希望可以进行公民教育，希望大家可以成为公民、将民主素养培养在自己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and 践行也应当被纳入到这个教育过程中，这是和个人息息相关的，完全无法被摘出去的。■

本文摄影：Andreas Müller

在日光下言说性骚扰：

八位台湾大学生主办的MeToo游行

合作作者 / 伊藤园

在二零二三年的夏天，性骚扰与性侵犯事件在台湾社会接二连三得到了揭露，政界和娱乐圈的知名人物被直指对ta人曾有过基于性别权力不对等的伤害行为。“我们不要算了”，在这样“穷追不舍”和“死咬不放”的决心驱动下，受害者及其周边支持者利用法律诉讼和网络曝光，一次次震声发问，将性骚扰这一沉重的黑箱逼至了聚光灯下。除去这两道途径，在八月，有一群年轻人走上了街头，用游行的方式打开了性骚扰议题在社会中的讨论度。



ta们在台北西门捷运站的秀山街设置了一个小型互动展，并以这里为起点出发游行，在行进过程中进行轮流演讲。在互动展上，ta们设计传达了性骚扰的法律、求助途径、支持资源、幸存者的声音，以此作为契机，终于剥去了性骚扰事件“八卦”的幻影，来认真、坦诚、疗愈地聊一聊它本身。

当莽莽关注到ta们的时候，这场游行尚未开始；在游行结束后，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和策划团队连麦聊聊，看看ta们为什么会选择游行这

一方式；这一由草根学生发起的社会实践，是如何落地的；在熙熙攘攘的台北西门捷运站5号出口，人们就性骚扰议题如何展开对话。在中国Metoo运动难以跳脱个案、难以在线下现身时，一场发生在华语世界的MeToo游行，或许能够让我们看见反性骚扰行动的一点光芒。

“欢迎大家一同前来，让讨论从网路走到现实中。”——台湾MeToo游行团队发布在Instagram (@metoo0827) 上的贴文

01 一起来创造场域，然后进入现场

2023年8月27日，在MeToo主题游行现场负责交通安全的益瑄在人群中突然看到了一位熟悉的朋友，她不曾想见ta会出现在这里。人流汹涌之中，益瑄停下来与对方打招呼，聊了两句后，朋友突然落下泪来。在那条街上，益瑄意识到这位朋友有相关的经历，霎时间，益瑄感到莫大的震撼。

四个月前，有一位大学同学跑来找益瑄，问是否愿意一起做一场MeToo游行，那时候的益瑄尚未预料到这场行动的丰富程度和影响力。益瑄和同学分别联系了一些在学生会和性别友善社团共事过的伙伴，开始讨论：我们可以做一场怎样的游行？

这样的想象和讨论持续松散且流动着。直到七月，益瑄和另一位伙伴在着手准备一些行政事务的时候，在咖啡厅偶遇了在另一间大学从事性别社团工作的旻绮。听到对面正在

筹办游行，旻绮当即表示愿意加入。最后加上一些设计的伙伴，这个八人的团队逐渐定型。

旻绮带来了更加结构化的讨论，游行当天到底要做什么也逐渐浮现出来：一个互动展览，一条行进路线，一列拟邀请进行演讲的嘉宾名单。嘉宾包括校园里性别社团、性别研究所的学生和成员，也有励馨基金会、同志咨询热线、彩虹平权大平台等NGO组织的代表，以及现任立委、“小欧盟”政党（全名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代表等等。

当然，演讲也向民众开放。除了手握话筒发表演说，更多的随机对话发生在团队成员和路人之间。旻绮是那个与公众进行沟通的角色。从以前参与同志游行开始，她就很重视手里的“小蜜蜂”——一枚扩音器，可以让路人更清晰地听见你在说什么，“这也意味着有一些原本不了解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见你在关注的议题。”旻绮回想起自己曾逗留的街头，高涨的情绪氛围是多么让人沉浸，而同时自己需要抽

离一二分去与路人讲述议题的重要性；还要去理解对方的想法，辨别出对方是否因一些信息、资讯不到位而产生了排斥和敌意。在面对这种敌意的时候，自己需要调整失落的心情，给对方补充正确的资讯。



旻绮在现场演讲 / 受访者供图

曾经，在看到对面不太认同的难看的脸色时，旻筠会觉得很难过，“被当作小丑一样”，但是到了眼前的MeToo游行现场，旻筠感到自己已经可以比较平和地去面对了。虽然人与人的面对面互动可能产生冲突与分歧，但也只有面对面，才能够传递温度和力量。益瑄和旻筠，都投入过实际的社会运动，会跑到现场与大家一起站出来、走上街头去与民众互动和沟通。

在2018年公投期间，当时的台湾社会氛围对同志的接受度仍不乐观。与同志游行这样相对同温层的场域相比，为性别友善和彩虹权益奔走的活动者们要面对诸多异见，投入时间和心力在街头与不太接受的陌生人做激烈讨论。旻筠提到，当初会做懒人包，将自己的诉求和动因编纂成方便路人快速理解的文宣产品，向其进行说明，呼吁联署。这些直面陌生和分歧时产生的勇气、智慧和策略，在一次街头行动中得到了延续。

“我们会想要办游行集会，就是希望站到街头上，只要你在现场、你经过了，都可以更靠近MeToo。”旻筠说。对于MeToo来说，许多发声仍局限于电子屏幕里，且极易沦为娱乐新闻，或者制造性别之间的误解。舆论环境里漂浮着随处可见的粗暴的阴谋论，或是“为什么你当时不讲现在才要讲”的责怪，且有对男性受害者的质疑、嘲讽，这些都如令人窒息的水草缠于当事人颈间——开不了口，是性暴力事件中最直接的一道伤害。

在展览策划过程中，策划团队开启了向公众征集自己或身边人曾遭遇过性别暴力故事的

活动，命名为“第九十九道曙光”。这个表单的收集结果，有一部分变成了现场互动展的一角，而有更多故事留在了这个持续开放的树洞里，安心睡着。

现场的展览，除了存放着幸存者的经历，也邀请任何对于MeToo有想要抒发的人来进行匿名书写，留在现场。亦有许多科普内容，解释了“肢体/非肢体接触、陌生人/非陌生人性骚扰、职场性骚扰、权势性骚扰、亲密关系性骚扰”等名词，被性暴力对待的当下和事后会有什么样的身心表现，受害者可以去求助哪些校内外的资源。更多地，团队期待可以用更多的发挥空间，去体现为什么受害者会这么难以求助。“我们希望大家在发声的时候不会受到评判，听就好了，不用那么多的揣测。”

Lin改写的两个故事/受访者供图

窒息的會議室



第一節課的鐘聲還未響起，我急急忙忙地走到會議室準備開會，許多同事已坐在裡面等著開會，過了三十分鐘，會議終於結束了，校長卻請我留下來，說是有事情與我討論。

「難道是被家長投訴了嗎？」

我心想，校長確認大家都離席後，開口說

「黃老師阿，剛來這間學校還習慣嗎？」

他邊說著手卻摸上我的腰，

「等等，我現在是液性觸摸了嗎??？」

我默默地拍開他的手，想快速結束對話，他又說

「黃老師不要害羞嘛，如果在學校遇到事情的話，都可以找我談喔。」

我忍著渾身不適，眼淚在眼眶打轉，簡單的告知校長還有課要上，便快速地離開了。

但到了教室我卻魂不守舍，眼淚不停地掉下來，面對身邊學生的關心，我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我到底該怎麼辦……

抱着这样的心，他们创造了一个包容的氛围，这里有声音、神情，还有活生生的人的情绪。

Lin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成员，在大学里念公民教育学系。他在前半段协助了一些合作邀请、公关联络上的工作，而在策划的后半段以及游现场，他是策展的主要负责人。在思考展览的时候，他将整个法律部分用故事引入，改写了两个真实故事案例，一个是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个是在台湾发生的校园校长对教师进行性侵犯的MeToo事件。

在Lin的设计中，人们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听到朗读的语音，听完后再来对照思考在具体故事中可以如何运用法律。在这次MeToo运动后，台湾立法院对“性平三法”（即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进行了修订；在游行当天，人们看到这一部分，便会来

上前讨论本次修法还有哪些不足，希望法律可以怎么改才能容纳更多受伤的人。

那天在捷运站的出口，有很多路过的人都有特地从路口走过来看一下这个展览到底在讲什么。Lin觉得，在当天，即使不是关注MeToo的人，也开始有了一点浅浅的了解。

02 MeToo之中，倾听ta人已是难得

“MeToo”作为一场质问了现存性别规范的社会运动，对它的质疑和打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位受害者愿意以曝光自己作为代价、让渡部分隐私权以求事件和施害者能够得到关注，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外部支持和时机的事情。在性犯罪这一隐蔽的黑箱上加着数道枷锁，第一道便是在性关系上处于权力高位的人通常也笼络着许多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通常会加大其声量、增加其信誉，受害者想要以己之力指控不公正是非常困难的。

策划团队成员想回应的便是受害者的脆弱处境，试图用这场行动将性别暴力事件的焦点牵回人和人的感受本身。旻筠理解，人们在遇到危害的时候会去检讨个体的原因，是为了调整自己接下来的行为；这是一种公正世界幻觉(just-world phenomenon)，认为自己避免了一些ta人“曾犯过的错”，就不会遭遇不幸。但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伤害，人们因为自己的恐惧而将矛头指向其他个体，最终只会让所有个体都无处遁逃。

所以，团队想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可以述说的



我上樓拿作文給張老師改。
他掏出來，我被逼到角落，他說
「老師很愛妳」。
我搖頭拒絕這噁心的東西，他又說
「不行的話嘴巴總可以吧」。
我再一次的搖頭拒絕充滿男性象徵的東西。
「不行，我不會」。
他塞進來，那感覺像溺水，
墜進深海中，就地崩爛，成為升學主義下偉大的犧牲。

回到家，母親正在書房讀書，
「今天補習班有學生被發現跟老師有不正常的關係」
她抬起頭，緩緩開口
「是誰家的孩子那麼不檢點，年紀輕輕就在誘惑老師，
你最好給我細心他這點，不要給我學這種事情。」
即將面出噁噁的文字又再一次硬生生的嚥了下去，噁聲
的空間，窒息的氛围，我決定帶著秘密進棺材，最好這
個世界上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

安全空间，存放无声者的话语。无论是做性别暴力事件叙述的表单收集、还是走上街头鼓励人们在现场发言，都是努力打破沉默螺旋，让一个人发声鼓励更多人的发声。那个表单在游行结束后也没有关闭，团队希望保留这个树洞，可以让它接纳那些遭受性别暴力的人们，让ta们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去述说，让任何人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放进来。

这场游行亦试图问责环境和结构为何导致了受害者的脆弱性。台湾已有性平三法，亦有协助和保护的专门热线，但这些法律的适用范围和申诉流程、支持资源的获取途径并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正是因为性别暴力事件的可见度和受关注程度偏低，诸多污名和压力也都封住了受害者的口、束缚了其求助的手脚。



“我们可不可以让受害者不必这么难才得到帮助？”MeToo行动的重要一环便是增加法律政策和社会服务的可及性，通过游行现场的展览和网络贴文的传播，益瑄期待能够让大众了

解：争取自己的权益是可以做的，获得支持是可能的。“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来提供资讯，如果有人真的需要进行一些申诉或者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会想让大家知道怎么跑这些流程。这些资源其实一直都可以使用，也很重要，只是过去一直没有人把它们拿出来讨论，我们把这些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讲出来了，也被一些人看见了。”

MeToo运动试图打破受害者“开不了口”的隐蔽状态，但它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或者大众更加习惯的话语策略。旻筠简短又锋利地发问：“为什么我们要用MeToo的方式才有办法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我其实也还延申思考了一件事，为什么一个人没办法离开一个欺凌自己的人去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很大原因

是因为ta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ta根本说不出口。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友善的空间，来让大家理解这是一件很难说出口的事情。”

能够用语言去传达和表意是一种技能，亦是某种特权，使用某种话语策略在一些情境里更是不别无他法的无奈之举。无力借助法律和制度而以舆论先行，这对当事人的叙事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提出了颇高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无力辨别出明

确指控的对象，无处问责；如果一个人同时感到爱和被侵犯，是否会审视自己“不够资格开口”；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愿建构出一个“施害者”，是否ta们的故事就

会被永远掩埋于黑暗之中？

03 合作背后， 个人的行动脉 络和同伴情谊

益瑄、旻筠和Lin都并非社运新人，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和实践也积蓄已久。益瑄所在的学校有一间2007年便成

立的性别酷儿研究社，最开始，这里是多元性别同学循迹找来的交友的小天地，随着台湾同志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社团如其他大学里的社团类似，除了联谊性质，也开始讨论一些比较学术的性别议题，邀请校外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学校演讲或者开设社团课、面向全校办比较大型的讲座，也带大家一起去同志大游行。

而旻筠是自己的校园里首个性别社团的创立者之一，社团名叫中大性别小彩坊。聚起来的伙伴先是从较为理论的、软性一些的课程开始接触性别，“到后面大家累积点能量之后，就开始设计、思考去规划行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要触碰的议题”。社团发展出来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大型演讲、互动论坛，还有一场月经主题的展览。“我们有一次邀请遭受过数位性暴力的当事者来到了现场，由观众以匿名的方式去提问。这是一起关于‘私密照流出’的事件，这样涉及面较广的性暴力也迫使我们去将心比心：在类似的事件中如果我们是当事人、相关人、网友、当事人朋友等不同的角色，我们可



以如何去处理、应对和思考？”

在性别社团之外，益瑄也是学生会的权益部部长。这是一个受理学生们申诉案件的部门，学生们的诉求都很多元。有人与学校沟通不畅便来寻求一个通道，有人是要针对性地投诉某些设备或是制度做得不够好，权益部就是与学校反映、沟通、讨论解决方案的角色。Lin同样在权益部任职。身边的同学知道益瑄和Lin同时在权益部的职责和对性别议题的关切，在自己或身边人遇到性别相关困扰的时候，或是对学校性别案件的申诉流程感到困惑时都会来求助。“针对某些教授在课堂上有一些比较古老、不友善的言论，班上同学就会来找我，我就把那堂课的事件拿去申诉说，性别平等没有做好。”Lin说。

当问到老师是否好沟通，益瑄笑了：“基本上学生会会处理的事情蛮多元的，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有个案的处理，也有大到要开公听会的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还蛮算能够沟通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点难与

之进行讨论啦,但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很理性地跟我们说话,愿意听学生的想法。不见得最后可以完全符合学生的期待,但可以找到一些稍微折中的做法。”

1991年前的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其后遗症——一种威权带来的创伤作为遗毒,仍然停留在社会 and 每个人的心里,会让人觉得政治是肮脏的,从而产生政治冷感。这样的冷感弥散在Lin的家庭里,“基本不会谈论政治或时事,他们只会跟我说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去碰,很危险”。但是从国中开始,一位年轻的女性公民老师(编者注:公民老师在台湾是国中和高中的教师岗,主要教授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四门课程)的授课让Lin产生了对社会时事和性别的兴趣,甚至在国中毕业时,老师带着Lin加入了高雄的同志游行队伍。这是Lin的第一场社运参与,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成为公民老师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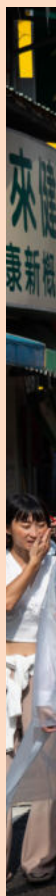
旻锜提到,虽然平权议题及其政策一直在被推进,但人们实际上是否真的认同、是否真的愿意站出来去主动接近公共生活还是要打问号的。旻锜就读女校之后,觉得自己从前走的是“一段无知的路”,而后才看见了真实的世界的面貌。这个真实的世界有资本和政治权力造成的落差,而某些教育里将这种落差批驳为个人的不够努力。从理论和多样的个体身上,旻锜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被给予的,但它并没有让自己变得优越,所有的事情都有其筹码所在。这样的驱动力如一盏隐约的灯,吸引旻锜走进了公共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个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去看和承担公共生活;如若个体不选择疏离,而是在自己可以负担的

情绪的界限内,依凭一点好奇心开始愿意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社会变革的)齿轮才开始转动。”

对于旻锜来说,有伙伴,才可以更义无反顾地去做投身公共的事情。旻锜是一个慢热的人,在游行筹备的前期,这个行动还没有什么关注度,巨量的工作和看不见回报的压抑让她感到有些崩溃:真的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吗?但是随着游行的日期临近,这些质疑一点一滴蒸发了,团队逐渐遇到了温暖的人们。在游行当天认识的志工、教授、参与者后,在结束后很久可能还会偶尔聊天,分享彼此生活状况。旻锜也感到庆幸:还好有来一起举办这场游行,能够结识这个团队。

团队年纪最小的Lin说,自己在这里没有感觉到什么上对下、学长学姐对学弟的层级关系,讨论氛围真的很好。即使大家的经验都不算很多,但对彼此的想法都愿意去倾听,并且一起来思考如何共融。“大家真的都是就事论事地去说话,也都擅长去聆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内化成自己的想法再去跟ta人讨论。”

对于基本认识每一个伙伴的益瑄来说,这个流畅的讨论氛围亦归功于每个人的特质、擅长领域都有所差异。所有人抱有一条交流的共识,那就是要互相尊重,愿意倾听每个人的想法并且给予回馈,在此基础上每个人才能够发表不一样的想法,激荡出许多灵感。“比如我们有人关注法律,有人提到学校的申诉流程,然后也有人关注被害者的感受,还有人提出要将欧美MeToo中‘I believe her’的口号换成‘I believe them’以囊括更多性别的



受害者。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异性恋也有性少数，有不同性别；个性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人 would 去考虑比较实际的东西，有人更注重感受，有人心思比较细腻会顾及到团队里面大家的情绪，有人知道可能要对外去找一些资源。我们刚好每个人顾及到的面向不太一样，想法、特质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真的很刚好，缘分就是这么神秘，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凑在一起了，就是很成功的运作起来了，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刚好可以组在一起的齿轮，就是很酷。”

04 今日的草根运动，在微观中拔刺

MeToo行动常常招致“以大局为重”这一名由的打压。原先在某一领域里“德高望重”的人物做出的性骚扰行为，很容易被妥协下来；在一个复杂动态的社会系统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人物的“性丑闻”，也似乎是最不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这种打压通常伴随着试图削弱性别暴力事件的重要性，和怀疑动机的诛心之论，这二者都是直指受害者喉咙的利剑。Lin提到，在台湾MeToo之浪滔天的时候，也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曝光出来，一间位于新北的私立幼儿园的一名教师被疑向幼童喂食药物和不当体罚，“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MeToo这些事为什么要现在提出来？是不是掌权者想要遮盖喂药这样的社会事件？”





“但是这些事情都同样重要啊，哪一个才是大局？”益瑄强调说，在一开始讨论这场活动的时候，自己就有想到，为什么这个活动没有一个单位站出来办？但最后它成为几位大学生主办的成果，益瑄感到很开心。如果它交由其他人来办，或者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单位来做，很可能被干扰，就像很多人会质疑这件行动是否在带风向，或者为了要去掩盖什么、为了要谋得什么利益？如果这样的质疑出自那些声量较大的、曝光度较高或者有号召力的人，就也可能导致人们的怀疑，从而转移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和追问。

团队成员较早就立下了共识，不会主动邀请政党来参加这次活动，“如果ta们真的关注这些事情的话，应该会主动联系我们才对”。活动当天的政党发言人都不是团队主动邀请的。益瑄觉得如果是NGO来办可能也会增加其工作负担、磨合其内部成员的想法等等，因

为不一定所有人都愿意以机构名义去办成这样一件事。而这个只有八个人的学生团队，却能够不带包袱和顾虑地探索，要开启怎样的公共讨论，要引发怎样的思维激荡。“我们最让大家看到的是被害者的处境、为什么会有这样MeToo运动的出现、现在碰到性暴力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现在的法律长什么样，以及点出社会中一些结构性的父权色彩，我们就可以回归到我们真正想要看见的这些事情上面，而不只是在舆论的风向里面飘来飘去或者被别人贴标签。”

“后来回想觉得好像正是因为我们这群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跑出来做，所以才可以让这个议题能够用这么一个单纯的方式被看见。”

旻筠则批驳了“大局”一说。在华人社会的文化脉络里，“以集体的利益为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看到什么事情跟更多人有关，什么

决策对多数人最好，集体主义之流便会裹挟着个体向那个特定的方向前去，但这在旻筠看来是危险的。多数人觉得是好的事情，很可能会压缩到某些少数人的声音、损害其权益。在收集性骚扰的故事过程中，旻筠发现目前运动里的很多事件都只关注在某一些名人的身上，反而少数底层人正在面对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很真实沉痛的事情难以得到关注。旻筠说：“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就需要容纳更多的声音；但如果我们永远都是以大局为重，就会忽视掉那些虽然声音很小但其实也很重要存在，如果那些存在被整个时代的潮流就这样略过的话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样我们会永远都只朝着一个方向走。”

对微观和草根的关注，是这个团队一致的价值观。当回想起近三十年前的台湾“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这件震撼人心的行动（编者注：台湾女权运动者彭婉如在1996年夜间遇害，引发了多个妇女团体在晚间举办的联合游行以争取妇女的夜行权），团队表示这是一件更集中火力的行动，意在提出具体的当下的政策，需要从环境跟政策角度去立刻着手改善。“那场命案推动了两万人上街，在刚解严不久的时空背景下能够有那么多人去参与，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Lin说，“跟现在相比，那个时候追求的很直白是生命权，诉求也比较明确，就是女性要安全回家。但现在追求的可能是更加结合多元性别的人权，性别平等运动也有比以往多的男性来参与，他们可以开始认识到女权主义并不是为了倡导‘女性要压迫男性’，他们开始去理解女权主义的内涵。”

当现在已有了基本的法律政策，压迫却仍然流淌在微观的毛细血管中。“前代的集体伤痛和恐惧是很沉重的，大家会为了一件事情愿意站出来，具体地知道哪些东西需要被改变。但是今日我们所受的压力变成了幽微的、隐藏在这个表面看起来已经做到性别平等的社会底下的问题。这个情境更加复杂，需要人们真的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底下的问题是什么——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没有了影响，但实际上还在持续作用的问题是什么。”益瑄说。在制度框架之下，个体是饱满鲜活、充满缝隙的，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如毛刺一般深入其生命，这需要今天的我们用更敏锐的放大镜去观察，去意识到不平等在个体上产生的伤口是深浅不一的，延续的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之后，我们才可能去思考一种关怀更多异质个体的行动。

“我最信奉的可能是跟弱小的人站在一起，或者看事情的角度永远都要回归到弱势的人，ta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是女权主义给我最大的感悟。”

在今日，更多行动、辩论和变革都建立在参与者的知识背景更加丰富、沟通弹性也更强的基础上，行动者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愿意去同理其他的人，才有办法去共同往前走这一步。听到对面的团队谈到这点的时候，我们都感慨中带有庆幸。当我们从裹挟意志的集体之中挣脱出来，把目光放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其异质性一定会为沟通和合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但也正是这样建立在尊重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连结，才是让自己和团队保持成长、不断激活可能性的所在。■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录、治愈与反抗： 一场诞于东京的华语 MeToo艺术展



作者 / 林砚青

「如果说四年前的“米兔在中国”展是高潮时的叠影，那么四年后的这场东京MeToo展便是回声，是浪潮续起时的风帆，亦是崭新时代开启时一处小小的注脚。」

——题记

11月初的东京已经微有凉意，但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食堂里，尽管已经过了饭点，却仍人流如梭。频频有人在走廊处驻足，他们静观、交目、低语，偶有惊异之声。

20张海报，如同20张蜡泪燃落后的拓本。红与蓝的交织，黑与黄的间错，在色彩的明灭之间，一场记述着女性被压迫与主动抗争史的展览如徐展开。

这里是东京MeToo展的首会场，也是《MeToo中国大事记》的初展厅。这场历时21天的展览共分为三个主题，“记录与存档”、“治愈、关心与连结”以及“赋权与反抗”，涵盖的活动主要有MeToo大事记海报展览，美术与音视频作品展览，木刻版画工坊，以及行为艺术表演，亦伴有Ending party与米米亚娜圆桌讨论会等。

据策展人海月所说，展览的灵感来源于与弦子的对谈。“（MeToo事件指控人）要扛住的压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多，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关于性暴力的敏感事件，而且会动摇到上层的一些人，这会让他们（指控人）遭受到打压。但和西方MeToo运动比起来，中国MeToo受到的关注度却明显偏少。”“让这些事被其他国家的人知道”是促使她办展的第一则动力，而另一则动力则是台湾MeToo运动的爆发。

“我发现中国人其实不太清楚台湾正在发生什么，而台湾人也不清楚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明明我们使用的都是中文。”抱着打破两岸三地之间墙壁的想法，她不仅邀请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也邀请到了香港与台湾的参展人。这场展览，便在这般超越语言、超越国族的期许下开启了。

一、MeToo中国大事记：从事实讲起

作为整场展览的开端，MeToo中国大事记承担着向非华语人群科普中国MeToo运动史的责任，因此海报上除了繁体中文之外，亦有日英双语。

华语部分的撰写人主要是季路和卡卡，她们在东京MeToo展之前就有做过有关范新性骚扰事件整理的网站“No More Books, No More Silence”。此次应海月之邀，她们制作了这份MeToo运动史的时间线梳理。

据她们所说，其实之前就有一份资料，叫《中国米兔志》，只不过那份资料加上后续有

2700多页。“我们没有办法期待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极大的毅力和热情去把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梳理清楚。”为了增强可读性与传播性，她们对资料做了重新归纳与梳理，也将原本记载的时间线从2020年7月延展到了2023年10月。同时，她们也对叙述的口吻与方法做出了调整。之前的MeToo事件描述往往以受害者为主体而加害者隐身，但她们选择将叙述的主体聚焦向了加害者，比如同样是写弦子被性骚扰以及Jingyao被性侵的事情，她们就将标题变成了“朱军性骚扰事件”以及“刘强东性侵案”。这种变更一方面是出于对转移不公正注意力的希冀，另一方面，也是对在新闻叙述中加入女权主义视角的尝试。

“在之前的Jingyao被刘强东强奸的案件中，很多营销号都会给这件事取个很耸动的标题，”卡卡告诉记者，“而我们希望呈现的视角是看到在传统的前MeToo视角中所缺失的部分，最起码做到不将性骚扰或性侵事件说成桃色新闻。”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们在尽可能叙述事实的同时，也避开了某些可能形成对女性凝视的细节详述。在词汇的选用上，亦尽量做到了不偏倚与客观。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次MeToo展里的第一层底色——以事实为基础，兼有关怀。

她们在大事记中除了记述性骚扰与性侵事件的脉络之外，亦加入了不少女权运动相关的内容。从黄雪琴推动建立反骚扰机制，到对“女权之声”的声援活动，MeToo运动的萌芽、跌宕与重浮在一行行铅字中得到镌刻。在为记录MeToo运动全盛时期的海报配色时，海月特地选取了鹅黄与柔紫，“希望中带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二、在艺术中解开情绪的线团

如果说在一场艺术展里，文字与画面是意义折射的棱镜，那么将这折射光线放大的，则是情绪的张力与触摸。

MeToo事件里，发声与记录的第一阶段过去后，便会迎来第二个重要的课题——治愈与重塑。承接这一课题的第二场展览，不



喻：“你看得见光，却无法摸到，也走不出去。”

这种隐喻，也体现在Te2自己的作品中。山峦回首、江河涌流，植物的生长与玻璃的破碎，她运用这些景象，在人类的情绪与自然之间进行了巧妙的勾连。“如果所有情

仅出现了木刻版画的展示，也举办了木刻画的工坊，来者皆可参与。

“木刻版画是一种很好的疏解情绪的机会。在刻的时候，你会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然后将其输出。”参展画家Te2这样说道，“海月之前举办木刻版画工坊的时候，曾经将那种心中难以表达成文字的复杂情绪形容为モヤモヤ，意为一种飘忽的、模糊的，像打结的毛线一样的意象。”

木刻的过程，就像将打结的毛线拆散，而后织就的过程。在海月自己的创作里，被拆散的是她自己遭遇性骚扰时的情绪。画面中，一张半开的门与泄漏进来的光亮成为某种隐

绪都能像火山喷发或者海啸侵袭一样进行一次重建就好了。”她在作品《滋孽》的介绍里这样说。

对于如何重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对于海月，艺术展作为区别于集会、游行的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其更能给予人一种情绪上的疗愈，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宣泄。而疗愈之外的另一个答案，便是建立连结。

在第二次展览中展现连结的另一幅重要作品，便是贴在墙面上的互动式问答。作者隐于幕后，让参观者猜测自己的故事与身份。“我是谁？”、“我需要爱吗？”、“我是怎样的存在？”、“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最坏的事？”、“你是我的朋友吗？”通过连续发问，将参观者带到与他人共感的情境当中。

“最好的事是成为一个中国女性，最坏的事是成为一个中国女性。”

在“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最坏的事？”的问题底下，有人这样留言。

三、黑箱之下，以痛回击

性别的悲剧，往往不止关乎性别。一场MeToo事件，也不止只是个体的不幸。其背后影射的是整个社会监督与应对机制的缺位和父权制度的压迫。

“赋权”与“反抗”，是东京MeToo展里的最后一个主题。这场展览里出现了两个基于小花梅事件的作品：一个是小花梅事件的时间线整理，另一个则是表演者Hedwig的行为艺术。

在小花梅的时间线整理里，作者不仅整理了官方的五次通报，也附上了民间的质疑与努力。每一张红字通报，都经由民间团体里无数人的推动才得以更新；而密密麻麻的黑体小字，则记载的是中国社会里这一次难能的、为妇女权益而发声的集体反抗。

作为行为艺术表演者的Hedwig，在表演前喝下了一整瓶威士忌。去年有一位艺术家做了一次名为“404”的表演，在人群中朗诵了一首有关小花梅的长诗。她模仿对方，将原

来的主题延展为“404 not found and Resilience”。她让观众在她半裸的躯干与蒙身的白布上写下文字，同时有助手往她身上喷洒黑漆并缠绕铁丝。有很多人写下“爱”，也有人写下“反奴隶制婚姻”。书写与喷洒的速度互相追逐，写得越快，喷得越快。然后，她被一块巨大的写有404的黑布所覆盖。

“但是，我知道大家还没有放弃，大家没有放弃对什么是正常的、秩序的追求。”她匍匐在黑布下，用清亮而坚定的声音道，“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还没有放弃，你们仍旧想要建构，想要和我们、和我一起建构一个属于女性话语秩序的世界，那么请你们把我身上的黑布揭开。”

于是，黑布撤去，所有人开始用卸妆油帮她卸下身上的油墨。一个原本的她，逐渐在大家的努力下被复原。现场，有不少人落泪，一种绵密、细腻的情感在人群中悄然流动。

她后来这样说，“我们不断在发声，又不断被压制”，但在被压制之后，她仍然想要追求一种力量，一种存在于一体的、属于女性与酷儿的、破坏与骄傲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给予我们秩序重塑的可能。



四、连结港台，华语世界的MeToo浪潮

红底、黑锁，只露出双眼的少女与向上飘扬的长发。

这是第三场展览中的另一幅作品，画中的女性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X小姐，她于警署内被多名警员轮奸¹。她勇敢地提起了诉讼，却仍然遭遇不公正的对待。

策展人海月辗转多人，与香港艺术团体点印社获取联系，得到了这份展品。海月告诉记者，她在收到时甚至“原地转了几个圈”“小小地跳了个舞”。

她之所以这么看重这幅画作，不仅仅是因为画作的来之不易，也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中国MeToo展中几乎没有出现台湾与香港的身影。然后，“女人没有国家”不应当只是一句落在笔墨上的谚语，也应当是某种更为真实的映照。

在国内时，MeToo展由于政治打压没能得到成长的机会。出了国之后，站在更为自由土地

上的她，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做一些在国内做不到的东西。建立与香港人、台湾人之间的联结，便是她的展盼之一。为了得到能和香港、台湾的创作者合作的机会，她多次参加活动，终于在十月初的No Limit活动中接触到了来自香港、台湾的艺术团体。藉由他们，这份展盼便有了落地的可能。

海月联系了整理台湾MeToo运动指控方自述的团队，从他们那里取得了授权，并邀请了志愿者念读。在铁丝网的装置作品里，她放置了播放这些自述的录音笔。当站在所有铁丝网最中央的时候，“震撼”，却也不仅仅是“震撼”。那种此起彼伏的声音更像是一种浪潮。“你只能听到所有人在说话。你必须走近，才能听清每个人的声音。”海月说道。

来自台湾的画家葛温也给展览寄送了她的作品《Me Too Zine》，这是一本不到10页的薄薄小册，纸面光滑，捧在手心如同捧着一叠新月。它所绘的是女性在遭遇性骚扰事件时逐渐被施暴者和负面舆论所影响，最终又重新夺回身体自主权的故事。葛温特地选用了不够精致与混乱的线条，和对比较强的鲜明色调，来描绘受害者心境的变化。在画册的第四页里，她用极细微的笔触捕捉到受害者心中的自疑：“或我想相信这段过往是爱，这样我就从来不是受害者，而是被爱者。”

启迪她写下这句话的灵感之一，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在华语世界里产生巨大影响的自传小说，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最初的性别意识启蒙。MeToo大事记的两位作者也说道，“在房思琪之前，很多人尽管也遭受了类似的经历，却难以找到语言去诉说。”林奕含的语言，给无数受害者的伤痛表达提供了范本。

“其实很多MeToo当事人出来讲的时候，已经知道从法律或从制度上给他们一个公道这件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出来讲？这就是MeToo的意义，在现行制度和社会没有办法给予公正的时候，我们作为拥有相同经历而且又

¹ 荃湾警署轮奸案：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一名少女（代号X小姐）通过律师报案，报称于2019年9月27日在荃湾警署内被多名警员轮奸。

没有办法从现行制度中找到公正的一群人，要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告诉那些和我们有相似或者一样困境的人，你们并不孤独。‘我们是失声的’这种叙事是不存在的，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声音，从前MeToo叙事中无声的受害者，变成一个自己发声的主体，找回自己的主体性，claim自己的叙事。”

否将港台部分的MeToo历史加入大事记时犯了难。她们坦言，自己作为中国人，如果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叙述港台MeToo的故事，担心会对他们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点叙述空间造成篡夺或者挪用，她们尽管可以客观地、用新闻的组织语言去描述这件事，却不能代替她们的主体性，因此她们在编撰时没有将港台的MeToo事件囊括进来。

“不过，在下一个版本中，我们可能会考虑将《房》这个词条加进去，因为它对于整个华语世界的MeToo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改变了受害者讲述MeToo的整个叙述话语，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将它放进来。”季路和卡卡补充，但对于要如何写才不会被

一种（民族）大一统的叙事所收编，她们也还在慎重考虑当中。

在女权新一代浪潮迭起时，Metoo运动要如何突破原有的国族边界，在超越地缘政治限制的前提下达成新一轮的展望与合作，或许会成为两岸三地所有女权活动家与支持者们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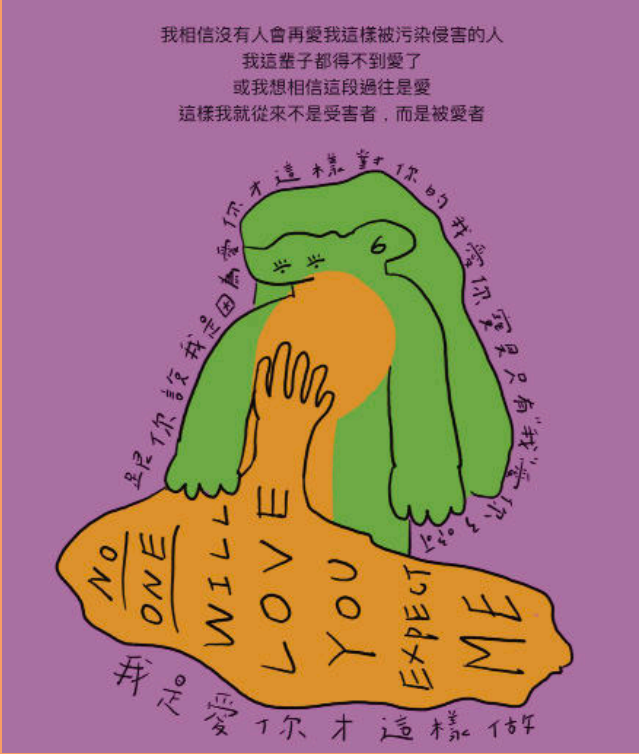
五、多元发声，突破刻板的性别画像

在绘制《Me Too Zine》封面的时候，葛温特意没有强调受害者的性别特征。

她向记者讲述了原因：“如果说被性骚扰，那么大部分人都以为女性。但其实被性骚扰的男性也有很多，只

是男生可能更没有勇气去说出这件事。就像之前爆出的杰尼斯事务所里性骚扰的社会事件，这种案件在很多地方都有。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性别，都有可能被性骚扰。”

大事记的制作人季路这样告诉记者，她们在制作时尤为看重突出MeToo当事人的主体性，但是这也让她们在考虑是



图源：葛温IG @bugsroom

海月在第一场展览后的Ending Party里也提到了这一点，MeToo运动不止是女性经历了相关灾难的证明，性少数也好，男性也好，都是包含在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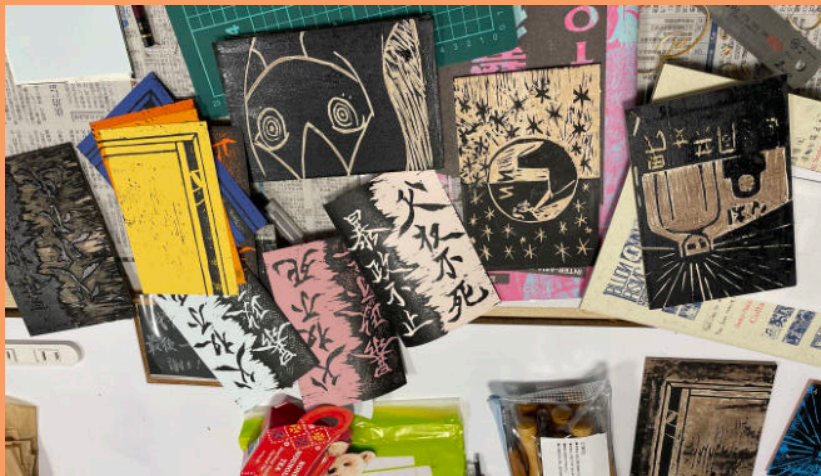
来参加MeToo展览的性少数与男性有不少，非二元性别者夕鹤便是其一。Ta说：“我原以为这项活动会像有些组织所创办的那样，仅限于顺性别女性，没想到在现场也有跨性别女性。”能听到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认同，却又对同一个话题有着相似共情的人的声音，对于Ta来说，是极为珍贵的一次体验。

同样参加了Ending Party的Higashi，对于这种能够超越性别、性取向和政治坐标的讨论空间也同样感到触动。作为男性，他曾经对女性抱有某种“赎罪式”的愧疚。这是因为他来自中国南方某个“杀女婴”的大省，他的二姐就是因为家里想要他这个儿子而被杀死的。在得知这件事后，他曾经一度无法和自己和解，他不停质问父亲自己要以怎样的身份活下去，自己有什么活下去的合理性。直到父亲去世，他才感到一些稍微的解脱。

他形容自己是比很多女性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可能，只有比较偏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才能接受我这样（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存在，但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更为激进……我不相信真正有这么一个完全的女权主义男性，只要是生理男性都不太能感同身受到女性被父权制压迫的那一部分。幸好的是我是LGBTQ群体的一员，可以通过LGBTQ的身份去和女权做一个联结，这样我就有了作为一个男性身份的女权主义者的合理性。”

如果是一个顺性别直男，他是否能拥有这种合理性成为女权主义者呢？Higashi的答案是否定的。LGBT群体一员的身份让他能感受到被父权制压迫的那部分，拥有与女性所遭遇的压迫相似的体验。但如果他完全是顺直男，则很难有相同的感受。而策展团队成员磕登也表示，在面对那些女性所遭遇压迫的事件时，他感到一种陌生感，因为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作为男性，他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站在这些压迫发生的正对面去反对他们。对此，他选用的对策是在尽量降低自己在女权活动中的存在感。布展一结束，他就会在几分钟内离开展览，避免让自己的存在给来参展的人带来压迫感。

他用这种克制，表现了对女性主导权的尊重。在女权运动里，主导性理所应然地属于女性。但“应然”之外，如何将其他性别与群体的力量也纳入，似乎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尤其在多起民权人士和“女权男”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女权运动圈对男性的警惕日益增显，在部分群体里，这种警惕也延伸到对跨性别的不信任身上。



不能否认，这种警惕确实有支撑其存在的理由。但在分裂与拒绝之外，东京MeToo的策展人与参与者共同尝试着探讨另一种可能。引一句展览摄影记录者火山的话，“我对女权男的真实存在性抱有疑虑，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男性参与进来……就算他不能成为百分百完美的女权男，只要能多了解一些女权知识，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六、公民与女权运动的交织：诉求、维权与问责

女权之外，另一个被参展者与观众频繁提起的词汇是“公民”。作为受访者中唯一的日本人，山田太郎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关注已有近二十年。他最早是从20世纪初的打工妹维权运动开始的，那时发生了多起打工妹被性骚扰和被雇主侵害劳工权益的事件。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起案件是，深圳致丽外资玩具工厂起火，烧死87人，受伤51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工。有不少香港义人和NGO组织参与到打工妹维权中，最终向意大利品牌母公司CHICOO争取到了康复赔偿

金。从他的视角出发，MeToo不仅仅是关于反性骚扰和反性侵害的运动，也应是女性寻求劳工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运动。

而这些，无疑都是公民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次MeToo展的参展人员也有不少是藉由先前其他公民运动相识的。在参与者之一Y看来，女权运动与中国的公民运动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将MeToo运动放在更大的中国公民运动的背景中来看很有必要。

女权主义者米米亚娜也提到，在女权运动发展之初，着落点都更在于“公共性”。作为女权行动派的一员，她对女权的理解更多是偏政治的，并倾向于将其理解成一个结构问题。而她和社群同伴的女权行动也更聚焦于对国家体制和公共文化的问责，而非个人的体验与生活。但在MeToo运动反复被打压之后，国内的女权开始逐渐脱离公共性，转向个人领域。这种转变，使得女权运动变得逐渐失焦和去中心化，而这是无奈和弊大于利的。

如何让女权运动延续公共性，成为海外女权运动者和女权社群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展览的衍生活动里，海月举办了与维权人士李宁的访谈，她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加强女权主义者和维权人士之间的联系，试图增进女权人士对于维权圈的关注和了解。在展览之后，她也想开设属于华人的独立书店，给所有在日友好团体提供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

“中国曾经有过很短暂、很稚嫩的公民社会，那时候的环境很好，所以有些像那种小苗一样的东西冒出来，但后来环境变差了，这些像小苗一样的东西全部被拔掉了，土壤也全都被扫走。剩下的幸存者只能像在水泥缝里勉强存活的植物一样。”

“我希望在有可能的地方把这种土壤再次做出来，说不定从这个泥土里面能长出些什么。” ■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破坏“大局”，撬动冰山：

华语社运圈的反性骚扰 控诉、抗争和团结

“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

——《人选之人：造浪者》

创伤预警：本文含有性骚扰、自残相关内容，可能会引发不安，敬请读者留意。

作者 / 苜蓿 × 莽莽编辑部

当晚

2024年1月21日，纽约曼哈顿的冬日，夜色早早地降临了。对于致力于离散社群联结的社运人士S来说，今天的夜色格外地黑，如同一张深渊里巨兽的血盆大口，试图将她吞噬。而这头巨兽不是别人，正是所谓民运前辈：定居法国、来美旅行的蔡崇国。

（以下部分内容为S的口述。本文写作者
是S信任的伙伴，S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还原
和呈现当时的场景。以下内容已经与当事
人核对与沟通，《莽莽》得到授权发布。）

几天前，S刚在华府出席完一场由部分民运人士组织的研讨会，而蔡崇国也在此次会议上。该会议的主办方曾发出多封针对

年轻社运人士的邀请，但应者寥寥。S是极少数参与会议并参与讨论的年轻人。“我做的发言介绍了白纸运动的遗绪，以及现在以年轻华人华侨为主的抗争社群的整体面貌，许多人给了非常好的反馈。可是，又怎想到会出现后来的事情……”

会议落幕后，S按照原计划乘坐铁路返回纽约地区，却出于巧合，竟然在同一节列车上遇到了蔡崇国，蔡表示也将在后续几日因私人行程在纽约逗留。S本想着到纽约中央车站后就同蔡崇国分别，不料蔡却提出了一同吃晚饭的请求。当时约是晚上九点了，S不太愿意，并表示时间已晚。蔡却回复道：“法国人都是这个点才吃晚饭的”。S依然是出于礼节考虑，在车站近处找了一家餐厅。谁知刚上餐桌不久，蔡崇国就向S提出了一系列请求：要求与自己一同去酒店同住，“洗个澡”，“我可以打地铺”。

S当即拒绝了这些无礼要求，但蔡崇国的行为依然在不断升级：他的语言开始变得语无伦次，诸如“一生只有一次”，“等了半辈子”。于此同时，他试餐桌上未经允许去摸S的手，反覆讲“不会强迫你”，“我可以睡地上”。感到极度不适的S起身准备离开餐厅，蔡却站起来试图抱她，并抢下她的

行李包，说帮她提着行李，一起去酒店办理入住。S当即拒绝并表示要回家，可蔡却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反覆说：“不可能，不可能让你自己回家。”

此时的S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想在尽可能维持最后体面的情况下夺回行李，然后安全脱身。她被动地跟在蔡崇国后面走着，寻找可能的时机。她一边走着，一边偷偷用手机告知朋友L自己所处的险情。走到酒店后，不会英语的蔡崇国要S替他用英文办理入住登记。S趁此机会拿了行李，准备脱身回家。

在又一次提出要S帮他把行李送去房间的要求遭拒后，蔡崇国转而坚持要送S回家，还是重复着“不会让你自己走的”，并将S的行李再次夺走，拒绝了S提出的自己打Uber回家的提案，抓着S的手、走了至少两个路口后拦下一辆公营出租车，一同上了车。此时的S已经顾不上任何的活动、社群关系等等，唯一考虑的就是个人安全。万幸的是，早在去酒店的路上，S就已经用手机悄悄把情况发信息给了L。在蔡崇国办理完入住酒店的手续、仍无让S离开的意思后，L打电话给蔡警告其不得有越轨行为，蔡的行动才有所趋缓，但仍然在言语上开着带性意味的玩笑。到达目的地之后，S在惊惶中下车，陷入了严重的创伤应激反应之中，只记得随原车返回的蔡崇国笑着说：“……就喜欢你笑的样子。”

这件事发生后的两天间，S被恐惧、惊惶所带来的痛苦缠绕，甚至一度陷入自我责

怪的情绪。她在此间曾同数位好友讲起此事，却发现应激创伤之下，自己竟然说不出连贯的句子。即使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抗争者，S的脑海中不是没有闪过一丝息事宁人的念头，也有朋友建议说：“以后类似的情形，就让朋友来车站接你吧。”

当S为那一晚所受到的侵害在惊惧中彷徨时，蔡崇国的行为表现得匪夷所思：他给S的好友男性L打了超过一小时的电话，反覆解释，称自己“没有预谋”，“是临时订的酒店”，如此云云，并据此辩称自己“没有性骚扰”。在蔡崇国的叙事里，他对所有被指控的事实没有任何否认，却也没有歉意的表示，甚至没有把作为当事人的S视作对话的对象，只是反覆同L解释，这熟悉的一幕不禁令人想起主持人朱军在对弦子实施性暴力后大谈“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唯独不请求当事人弦子的原谅。

“你想过，你出来做事是为了有人接吗？你出来做事是为了让所有人都不用被接送。”S的一位社群好友如此劝说她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S回忆说，在听到这段劝说之前，她已经萌生要维权到底的意愿，因为蔡崇国通过L转达的歉意毫无诚意，纯粹是作为一个父权形象的高高在上者的蜻蜓点水。蔡崇国对于S所提出的所有事实性控诉一概不否认，却在此基础上宣称这不是性骚扰。

S同样不是没有顾虑：她所在的社群中很多同伴也都是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年轻中国

人，S并不想太早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在公众面前，唯恐这会让具有更多现实安全顾虑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对其敬而远之，造成社群的疏离。但那句“让谁都不需要被人接才能安全回家”的鼓舞，促使S决定在做好信息保护工作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对蔡崇国公开说不。

控诉

1月24日，S把自己如何遭遇蔡崇国性骚扰的经历写下之后，把文章发给了一些朋友，朋友们也积极在各个社群中转发。一方面，S通过之前在DC举办的该场会议所创设的邮件群组，将控诉文章按照邮件列表群发给所有其他的参会者（几乎均为广义意义上的“非新生代的民运人士”）；另一方面，纽约地区年轻行动者社群的同伴们将控诉文章制成截图，于各大自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起初转发该事件截图并表达支持的，许多都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初创、在白纸运动中迅速壮大的线上社群，这些线上社群的转发和公开支持表态，对于事件在前几日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相比自媒体上有大量声援受害者的留言评论，处在本次案件舆论风暴中心的会议组织方及参与者们的反应，却让人大跌眼镜。

S给会议组织方发布相关信息的诉求并不复杂，无非是希望组织方公开谴责蔡崇国的行为，并通过与会者的同辈压力敦促蔡崇国道歉。与会者中的数名前辈（主要是

女性）通过或公开，或私信的渠道表达了对S的支持，但很快，在1月25日，会议邮件群内一条极其冒犯的回应对事件再起波澜。

此条回应来自一名男性活动人士杨子立。杨子立在所有与会者可见的群组内先说“蔡崇国先生受到了指控，是否得先看他怎么回应？即便是只有舆论审判，也得允许被告辩护，否则不公平”，然后用全然置身事外、跳脱出本案语境的看似客观中立的语调，大谈对MeToo议题的看法。在其谈论中，竟然变相给性骚扰行为开脱，称“食色性也”；甚至提出，社运圈内的MeToo运动有煽动“世代对立”之嫌，认为对较年长的民运人士（诸如蔡崇国）的MeToo指控包含了“年龄歧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杨子立邮件群组内发布以上内容时，作为控诉发起者的受害当事人S一条不落地收到了杨子立的信息。经历了应激创伤和惊恐发作后鼓起勇气希望得到社群的帮助，得到的却是在邮件群这个半公共性质的社群平台上公开发布的一句“食色性也”——遭受到杨子立二次伤害的S，再次陷入更重的应激状态。

几乎与此同时，会议组织方发布了一封简短的声明，称“蔡崇国并不否认被指控的事实，但表示对事情有不同理解”，同时指出了杨子立的言论“私自且不当”，并表示会敦促蔡崇国公开道歉。对此，蔡崇国的回应显得更为荒诞甚至离奇。在蔡崇国发出的邮件中，他将S的指控称为“敌情观念

造成了自我恐惧、自我伤害”，称“多疑造成的自我恐惧是谁的责任？尤其是，为此就要你声誉扫地、家庭或情侣（发）生危机乃至破裂，是所谓‘杀一儆百’，我拒绝接受”，又呼吁大家“揭露真正的性骚扰”。

此后，S在两天内先后发布了两封控诉信，对杨子立的二次加害、蔡崇国的毫无悔意提出控诉，并决定趁着蔡崇国尚未离开纽约，予以提告。

传票

1月27日，周六，下午一时。尚未离开美国的蔡崇国在一间咖啡馆内收到了S对其进行提告的法院传票。负责递送传票的则是纽约华人华侨社群中积极关注此事并全力支持受害者的两位青年。

此前，S和社群内的同伴们讨论过走法律程序维护自身安全的具体操作，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顾虑就是：用什么登记为原告方的联系地址？若是登记本人的私人家庭住址，S担忧会给蔡崇国以及其他潜在的不怀好意者更多机会，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所以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由于本案发生在所谓民运圈内，且S也始终希望民运圈内的活动人士能用社群的力量去制止性别暴力、用实际行动证明性别暴力并非民运圈的主流，所以S把纽约地区由王丹等人建立的“六四纪念馆”设置为了收件地址。

S对此表示说，主要还是考虑到涉性案件本身的敏感性、对保护当事人隐私的更高需

求，以及她希望六四纪念馆作为纽约地区标志性的民运机构能够帮助保护她的私人信息，支持她维权，以示民运圈本身对性骚扰的否定和批判。S同另一位在六四纪念馆工作的前辈说过此事，并未得到反对意见。

然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六四纪念馆的官方推特帐号披露此事，宣称其被动卷入了一桩与其无关的民事案件，要求原告更换登记地址，并在指代原告身分时直接披露了此前从未公开发布过的S的完整姓名，并在有网友对这种披露受害者完整姓名的行为提出质疑时，含糊地在社交媒体称与S沟通无效。对此，S表示，日常主持纪念馆工作的纪念馆馆长于大海从未与其有任何关于更改登记地址事宜的沟通。

六四纪念馆位于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33街和六大道交界口，是王丹等民运人士在2021年开始筹备、并在2023年正式启动的一个小型展馆。然而从其开幕伊始，这家纪念馆就始终蒙着一层挥不去的阴影。

环境

当看到纪念馆推特帐号私自披露S的个人信息后，社群伙伴Tracy的愤怒记忆瞬间回到了半年前那个熟悉的街巷。同样是关注中国社运议题的活动人士的Tracy也曾对六四纪念馆落户纽约而感到欢欣鼓舞，其参加的社群“热风”（原“民主沙龙”）也一度在纪念馆正式开放前就租用纪念馆的场地举办研讨活动。孰料，在六四纪

念馆开幕的前两日，即2023年6月2日，台湾青年李元钧公开披露了九年前王丹对其性侵的消息，随后有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

在六四三十四周年前夕出此事，舆论界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热风发布了声明，督促王丹对此事作出解释，并表示在其作出合理解释或诚恳道歉之前暂停与其合作，还表达了对受害者挺身而出的赞许和同情。

在声明发出后，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找到了热风的一位主理人，要求其撤下声明、甚至要其自我反省、不再对此事发表评论，理由是只要法院还没有判决当事人犯罪，当事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就不允许其他人认为其有罪。关注平权议题的Tracy表示，这类言论的荒唐和无知是显而易见的，她说：“这种把用于限制国家机器权力的‘无罪推定’挪用到对个体的要求上好荒谬——被捕的窃贼在法院正式判决定讞之前也只是嫌犯，难道在这期间，失主就不能主张该嫌犯是小偷了吗？”

于大海的无理要求自然被包括Tracy在内的热风团队一致回绝，随后其要求该社群从此不得使用六四纪念馆的场地办活动，甚至把热风办活动时暂存于纪念馆内的一批道具物资变相扣押。

这绝非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的个人行为，而是民运圈内相当一部分人对性平议题态度的缩影。在当年王丹MeToo案发

后，包括王丹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内的一大批民运人士及参与者都试图把该案指向政治阴谋：认为在六四纪念日前夕指控王丹，必然就是企图破坏六四遗产，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虽然这种荒诞不经的论调在Tracy看来不值一驳，但半年多以后当S成为MeToo案件的当事人，并受到六四纪念馆的二次、三次伤害后，回头望去，觉得这一幕是如此相似。



S的可怖遭遇远非个案。S真正接触社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才开始的。然而，对这些年轻世代的行动者而言，初入社运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更有社运圈内同样充斥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而年轻的行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以及酷儿行动者，显然会承担更大的压力和危险。在伦敦地区活跃的行动者Evelyn就是另一个鲜明的例证。

当疫情时代在中国最终落幕、大家逐步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依然坚守在社运领域持续发光发热的就不多了，而Evelyn是其中一位。“我主要做人权方面的倡导和组织工作，尤其注重在不同的社群之间建立联结 (building connection)，所以也会去伦敦以外的地方到处跑。”她如是自我介绍道。

2023年的秋天，当Evelyn在参加某场社运相关的线下活动时，一位男性参与者主

动与其搭讪，说通过她的某些细微皮肤特征认得她曾经在某场共同参与的匿名活动中扮演过某个角色。虽然这位男性参与者在该场线下活动中有流露出一些略显奇怪的言行，但Evelyn仍然与他彼此交流了联系方式。

“我做社群联结工作，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女性男性、同性恋异性恋、左派右派，都有。”Evelyn作为一个社群组织者，一直信奉的做法是尽可能包容、寻求最大公约数，而不轻易在抗争社群内部彼此割席。或许正是这一层考虑，Evelyn依然对这位言行冒犯的男性参与者投以善意，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意料。

在线下活动结束后次日，这位男性参与者向Evelyn发出的信息就提及了自残的话题，甚至要Evelyn与其分享对自残的看法和经验。对于如此私密且令人不适的话题，Evelyn起初选择不回复。但面对沉默，这位男性参与者在言语骚扰上变本加厉，宣称要对Evelyn“每天说一句我爱你”，以及陆陆续续讲了许多其他包含性暗示甚至性暴力的秽语。

Evelyn郑重地写了警告讯息给他，要求他停止这种侵犯她人边界的不当言行，但收效甚微。不堪言语性骚扰的Evelyn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发现，还有多名华裔女性行动者也遭受了此人类似的侵害，其中一人受害竟然长达一年半之久。每一位受害者所遭遇的剧情高度相似：此人在受害者明确拒绝对话的情况下不断突破私人安全界

线，单向输出式地大谈自残、性别暴力，甚至用充满厌女色彩的语言和叙事对女性受害者进行心理操纵。到后来，在社交媒体上有另一群以跨性别人士为主体的受害者在2023年年底挺身而出，揭露此人用更恶劣的语言谩骂、羞辱、骚扰多名跨性别女性，甚至在此过程中公然否认跨性别女性的女性身分。

Evelyn虽然渐渐不再受到这位侵害者的骚扰，但回忆起诸多细节，仍然心有余悸。她回忆说，此人自称拥护自由民主，却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严重的厌女以及对性别议题的不屑，经常对女权伙伴口出恶语，蔑称其为“民主小清新”。

“类似的情况绝非孤例，这背后是有结构性因素的。很多中国议题相关的社运活动都是半公开甚至非公开性质的，也就是说（对中国和香港出身的行动者而言）为了保护你自己的身分安全，往往你不能对公众说出你参加了这个活动。因此，你在这个活动上的个人安全可能更没有保障，而有些侵害者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有恃无恐。”

Evelyn讲出这些评论是有所指的。另有一次，在西欧某座城市举办的非公开的社运活动中，Evelyn又一次成为性别暴力的侵害对象，而这次的加害者，用Evelyn自己的话说，“年龄比我父亲都还大了！”（事实上，蔡崇国的年龄也已超过S的父亲，悬殊的年龄差距也使得一开始S没有预想到事态会往如此糟糕的方向发展。）

那是该场活动最后一日的告别晚餐时间。Evelyn席间前去洗手间，但因其内有人，她就在外等候。孰料，另一名中年男性社运人士也来到门口等着用洗手间。就在这短暂的等待期间，他毫无征兆地用手触摸Evelyn的大腿，并试图触摸她的脸，在遭到Evelyn的激烈反抗后未果。最终这名侵害者没有用洗手间，在用一连贯的恶意图体接触之后扬长而去，回到活动晚宴中继续推杯换盏，留下创伤后遗症发作的Evelyn在原地瑟瑟发抖。

Evelyn联络了同一场活动中的数名友人，大家一同帮忙处理此事。“小伙伴们兵分三路，一组人陪同我，确保我的安全并给我精神支持，一组人去找侵害者对峙并防止他继续加害，另一组人负责记录当时的情况以备后用，大家真的非常supportive。”即使如此，Evelyn依然受到极度的创伤，以至于都记不清是如何结束的活动，只记得是友人将其“扛回”酒店，稍稍休息后因为惊恐发作，再由友人陪着前去紧急就医。

Evelyn的好友们全程陪伴着她，并在得知那位同样居住在英国的加害者预计会和Evelyn乘坐同一班回伦敦的班机后试图联系他，让他改签别的航班。最终那位加害者拒绝了上述要求，只是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所谓道歉声明。次日Evelyn在同行的社群伙伴们的全程紧密陪护下乘坐飞机返回伦敦休养。

“参与社运是很累的，不仅仅面对来自中

共政权的压力，很多时候出于安全考虑被迫匿名也使得我们处在更加脆弱的位置，加之父权文化影响下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运圈子也不例外，女性行动者会面临更多更高的成本和风险。”事后回忆此事时，Evelyn如此讲道。

从纽约到伦敦，未曾谋面的两位受害者各自面对着眼前横梗的冰山。这样的冰山，刺穿水面的部分是站在加害者一方的辩护，而那匿于下方巨兽般的阴影，则是对性别暴力沉默和纵容的环境。

在社运的特殊语境里，为性别暴力加害者辩护的话术无外乎三种，一是将所有批评民运人士性暴力行为的观点及持有类似观点的人，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甚至间谍；二是同样歪曲受害者发出控诉的动机，但此处的行为主体不是中共，而是其他诸如形形色色的西方左翼团体；三是把涉案的具有民运背景的加害者描绘成完美受害者，主张其为民运做出的贡献足以抵销其在性别领域的一切恶行。

除却这三种可以称得上是主动的加害，S和Evelyn都感受到，周遭环境里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对性别暴力听之任之、纵容有加的态度。S在案发后收到过多条来自其他民运人士的私信，表达的意思大体都是：支持你的指控、同情你的遭遇，但既不愿意公开批判蔡崇国，也不愿意公开反对杨子立，更不愿意去和六四纪念馆馆方对话，让其撤下披露S个人真实信息的贴文。Evelyn在案发后也曾试图在英国报警，孰

料第一次接警的警员竟然漫不经心地指责她为什么要和侵害者建立联系,认为其自我保护措施没做好才是案发的根源; Evelyn在欧洲遭遇侵害后回到伦敦,一度处在精神的极度痛苦中。为了讨一个公道,她也并不是没有联络过侵害者任职的机构团体,但得到的来自相关负责人的答覆也不过是:后续的事情我们会调查。但最终结果依然是没有结果的不了了之。

上述的几门案例(S、Evelyn分别遭遇的性骚扰案,以及六四纪念馆驱逐热风案),是社运圈内——特别在性别领域——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真实写照:抛头露面、高调发声、被冠以“民运活动家”“资深民运人士”头衔的民运“领袖”们,绝大多数是顺性别男性,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民运资源和权力(这包括但不限于主流媒体的曝光度、在泛自由派舆论场内作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某些情况下可能的资金支持等等),蔡崇国、王丹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其流亡多年,经由关注民运议题的各大媒体的报导,在公众面前被塑造成为个人英雄式的“民运前辈”形象,并在多个同样由男性民运人士主导的民运团体、机构挂职。

虽然这些机构和团体本身对中国社会以及其在地社会的影响力与日遽减,但在所谓的社运圈内,这些被西方媒体塑造成英雄形象的人士,及其主导的机构,依然处在权力和资源顶端: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某些标志性议题(例如八九民运、1998组党运动等)全部的解释权,把自身的身分作

为一种符号和作为历史一部分的集体记忆杂糅在了一起。甚至,他们以父权式的、家长式的、自上而下式的方式垄断了在民运圈的议程设置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性/别议题的边缘化,或使之成为了反共议题的一个工具性支流存在。在某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男性意见领袖看来,只有在性/别议题符合其自身的政治议程的前提下,有了其背书,才能存在合法性(参见当年许多民运人士对彭帅案件的解读)。

而在此次蔡崇国性骚扰S案件中,民运意见领袖黄慈萍、吴祚来在推特上不断散播的阴谋论都试图建构这样的叙事:即S本身是一项更大的针对民运的政治阴谋的一环,S和她所倡导的性别议题不过是用来攻击民运的一项工具,而非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一项独立的社运议程。

且有“先谈人权、再谈女权”这样似是而非的谬论在民运圈大行其道——这里的所谓人权,更多实际上只是优先考虑男性自由派知识分子诉求的新自由主义议程,而把所有系统性看待不平等权力关系,特别是性别领域权力压迫的议题边缘化。当这些男性“领袖”们实施性别暴力后被揭露出来,这一谬论就会被用作MeToo被告们的私人工具,来让自己堂而皇之地从性骚扰控诉中脱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S为代表的女性行动者们所需要面临的无奈现实,是其挺身而出反抗极权压迫的同时,还必须承受抗争者群体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

不作为个人英雄形象出现、而是作为社群普通一员。更多个人安全方面顾虑——对于已经被塑造成“领袖”们而言，这些安全方面的顾虑往往更少。当事人是否要以曝光自己的真实个资作为代价、去启动一场社运圈内的Metoo：“也许我把个人身份曝光了，我生活在中国的亲友会不会受影响？”“现在和我来往的中国朋友们会不会感到恐惧？”……

迫于压力而无法公开挺身而出、揭发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们（多为女性），往往只能诉诸匿名的表达和投诉，甚至忍气吞声。在充斥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民运圈，对所谓民运意见领袖的控诉，最终很大程度又会被交由其自身进行裁决；而匿名的表达和投诉会给他们理由去质疑和否定这些控诉的真实性，从而让受害者在圈内求告无门，出于安全顾虑又不敢寻求圈外渠道的帮助。如此困境之下，不知多少受害者就此选择不了了之，或退出社运了事——这又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恶性循环和逆向筛选：社运圈越来越沦为作为父权制既得利益者的意见领袖们及其拥护者们的独立王国。



时代进步的车轮不可能因为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意志而停下，对性别正义泼去的污秽脏水也并不能阻止新一代行动者社群的崛起和成长。在蔡崇国事件案发后数日，S和Evelyn在一场反性骚扰的线上讨论会相遇了。她们不约而同都感受到社群的力量、同伴的支持，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和冷眼沉默时，这是多么关键而有力量。

Evelyn在受到多次性别暴力伤害后一度陷入抑郁和不安之中，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自述是社群的同伴帮助她走出了阴霾。“我回伦敦后，甚至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段时间真的是无数一起做事的小伙伴们，用ta们的勇敢、善良、坚定支持来陪伴我，让我慢慢恢复。”谈及未来的打算，Evelyn表示依然会继续做社运，并且希望强化性别议题的交流。她认为当下的社运圈对于性别议题的忽视也导致了许多运动者在性别正义方面的知识欠缺、意识薄弱，而解决类似困境的办法就是大声大胆讲出性别议题，激发更多的讨论，来触动更多人的自我觉醒。“曾经有一个社运前辈，经常说一些大男子主义的话语。有一次大家忍无可忍指出了，他竟然也很快接受并且道歉了，之后真的有改正。”Evelyn说，她希望不同世代、不同群

体之间的沟通是一种effective dialogue (有效的沟通)而非pure argument (纯粹的观点输出)。

S和Evelyn所在的群组中还有很多在纽约地区的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纽约地区的女权活动社群至迟在2015年就开始逐步成形,目前已经相当成熟,在华人社群甚至更广的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定期举办脱口秀等活动,联结广大社群中的彼此。在S受到伤害后,她仅仅同部分女权伙伴说了一句“我应激了”,并提供相关事件截图,大家就心领神会地加入了支援工作。在1月28日晚间,女权社群组织了一场针对蔡崇国性骚扰事件的线上讨论会,有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各种人士逾80人参加,在讨论这一案件本身的同时,更建设性地讨论社运、民运等领域的性别正义维护、安全机制建设以及运动伦理问题。

在讨论会上,中国人权倡导者罗胜春表示:“我也遭遇过性骚扰,当时我告诉自己要遗忘。因为最近的MeToo,和年轻人交流才有了这个概念。倡导反性骚扰需要勇气,但非常必要。我想说,第一,我是那一代的人,我改变了,改变是可能的。第二,改变需要行动,要对他们进行反性骚扰培训。不理解、不尊重女权的人,不配做人权!”

中国女权活动家吕频在发言中也直指蔡崇国、王丹拿民运标签当成在海外华人社群护身符的荒诞逻辑:“海外的民主运动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自我迷思,反共定义了他们一切的、绝对的正当性,他们的言语和行为

不受限制,毫无规范可言。当事人对蔡崇国起诉的行动是一种宣示:这样的时代应该终结,我们需要去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领这个运动,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这个运动里的文化规范。”

S本人也参与了该线上讨论,她说:“当初我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大局,希望多建立联结,但他们对性骚扰行为的包庇或沉默是为了大局还是为了私利?相比保护自己的私利,对别人有同理心会产生更大的联结的力量。我站出来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我想继续做事,不想在做事时还要担心会被性骚扰,也不希望别人再有相似的境遇。”

在会议结束后,大家发起了新一轮倡议活动,发起了一封题为《关于在民主运动内反性骚扰的联名倡议信》的联署,该联署主张四项诉求:1.将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纳入民主运动的共识;2.反对不悔改的性骚扰者参与民主运动;3.不做旁观者,积极地制止性骚扰、支持受害者;4.机构明确反性骚扰的立场,进行反性骚扰培训,调查处理反性骚扰个案。同时,大家在X平台(推特)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帐号,题为“新八九民运#反对性骚扰”。前述联署信通过这一帐号平台得以广泛传播,截至2024年2月15日,已有49位个人和34个机构/平台实名签署。

线上讨论会结束了,但关于如何在海外民主运动中强化性别正义、把性别暴力议题摆放在社群聚焦的中心位置、当作一项紧

迫的而非边缘的议题来对待，社群中还在激烈地讨论着。

参与讨论的大家都可以算是广义意义上各个社群内的活动人士，但各自专注的议题又不尽相同。但大家能形成的共识是，要让社运圈内长期存在的性别暴力消声匿迹，需要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大家也并非想当然地认为，签署了这一封联署信，就能制止未来社运圈的性别暴力。眼下能做的第一步，或许就是通过近期的一系列事件在社群内的讨论，将性别暴力议题这个房间里的大象显现出来，促使人们用面对而非回避的态度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在讨论的过程中让更多人——无论是什么年龄、什么社群、专注于什么议题、什么政治光谱的，都尽可能地在同伴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去关注、理解和实践性别正义。

目前，Tracy所在的热风社群将在2月17日邀请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王代时律师进行讲座分享，讲述他如何维护魏京生案受害者刘怀昭的权益，以及他为什么认为这么做是有助于促进民主的。Tracy说：

“我们真的不是要搞代际对立，好像说老一代就没有性平意识、新一代就有，新一代要发动清洗把老一代消灭掉，不是这样。就像罗胜春老师讲的，她在年龄上属于上一代，但她人权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了性平意识，并让自己的性平意识在学习中不断与时俱进。我们希望更多人像罗胜春老师那样。”

当事人S也表示：“推特帐号取名为‘新八九民运’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不是和八九民运切割，而是希望让八九为代表的民运精神和遗产，能够在更多的社会正义议题中建立新的记忆点，能够自我不断改进，而不是要否定它。”

目前，S已经接受了“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大声传媒”、“歪脑”等新兴华语媒体的访谈，持续发声。正如她在此前发布的一封控告信中引用的《人选之人》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

在S等人发起的联署活动中签名的人士和机构，也证实了S、Evelyn、Tracy等人所讲述的反对父权并非代际对立的愿景确实正在被实践：参与连署签名的个人中既有白纸运动时期步入社运的年轻人，也有如蔡霞教授和罗胜春女士这样已经为了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奋斗多年的前辈；机构中既有发源于白纸运动、声援四通桥抗议的社交媒体社群，也有诸如“中国人权”这样的老牌人权工作机构。所谓的代际对立、年龄歧视之说在当下刚刚



迈出的这一小步之中，也已经不攻自破了。

纽约的寒潮逐渐散去，春日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雨后的彩虹洒落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作为海外华人民主运动的重要场域，这座城市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社群聚会，无论是近期的蔡崇国性骚扰案，还是即将到来的六四三十五周年，都是大家各个社群讨论的热点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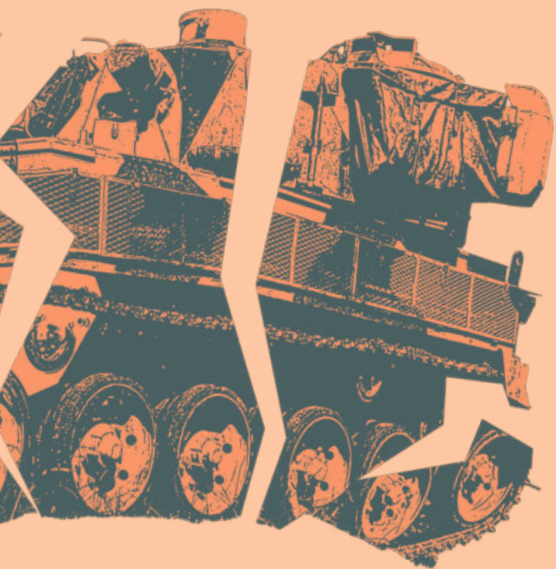
上述各案当事人们所期许的在社运圈内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并持续着。不仅仅是在讨论的题目上，性平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关注到，而且在社群的组织形式上，消除父权制流毒、改变不平等权力关系、建立更加平等友好社群环境的尝试，也已经在发生。

白纸运动后涌现出的许多新生社群出于种种考虑，其组织和运动的形式都呈现出更多的去中心化模式：社群不实行列宁式

政党的刚性模式，不设立各种官僚化的职务，更没有“主席”“部长”“理事”之类的头衔，社群也没有明确划分内外的边界。一直活跃在社群且有余力承担组织工作的成员自然而然形成主理团队，而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在确保基本安全的情况下，都被视作社群的成员。

社群成员之间出于个人资讯安全的考虑，很多时候以匿名、化名、笔名相称相认，扮演“核心”角色的“领袖”是不存在的——即使社群的运作暂时仰赖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ta们也不会成为被大力宣传的对象。随着性平议题成为越来越多行动者的共识，随着行动者社群网络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去中心化，消除社运圈内父权色彩、解构社运圈内特别是性别领域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尝试，纵然道阻且长，也还是在稳步推进着。

这也许是一条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终点的路，但也是真正让性别暴力从抗争社群的舞台上退场唯一能走的路。这条路上布满荆棘，横梗着一辆辆涂抹着压迫、污名、阴谋论的坦克，甚至这些坦克宣称其是坦克的对抗者。但无论如何，站在父权的坦克面前，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退让半步，不会就这样算了。■



特别面孔



Profile

一个延长的709:

“律师的 律师”李 昱函的 执着与 不屈



今年74岁的李昱函是人权律师群体中的老前辈，备受人们尊敬。图为2008年李昱函在辽宁省大连市拍摄的照片，她的左手手臂上的伤是在这一年的6月15日被黑社会袭击所致。
图源：受访者

作者：何燃冬 x 《莽莽》编辑部

2017年的初夏，一位人权律师从北京出发，乘坐飞机前往吉林省长春市。看起来，她只是去那里办一起平常的案子，这让她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警觉。

那时已经六十多岁的李昱函在人权律师的圈子里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大姐”。照片里的她梳着松散的卷发，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不羁而坚韧。

长春并不是她的目的地。几天以后，她重新启程，在到达位于该

省西北部边境的白城后，把交通工具换成出租车，以避免庞大的数字监控系统。一旦她在网络上购买火车票，国保¹将获知她的行程，并对她展开拦截和骚扰。

乌兰浩特。这是一座位于内蒙古东部的小城，荒凉而人烟稀

¹国保，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隶属于公安系统的特殊政治警察，主要负责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少。因为没有什么工业，天空总是呈现干净而深邃的蓝色，镶嵌着立体的云。她要去这里和她的一位当事人见面。

两年前的2015年，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发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镇压运动，后来被称为“709大抓捕”，300余名律师、活动家和他们的家属受到传唤、抓捕和酷刑。李昱函的当事人是王宇——另一名著名的人权律师，这场运动的第一位受害者。

2015年7月9日的凌晨，数十名警察包围了王宇位于北京的住所，将她绑架到她至今仍不知位置的秘密拘押地。几个小时前，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机场被捕。

失踪一年多后，王宇出现在了官方媒体播出的电视节目上。在一大片绿色草坪的背景里，她穿着白色T恤，坐在舒服的扶手椅上——精心布置的轻松氛围。“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我被羁押期间，我的各项权利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王宇对着镜头说道。

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可耻的强迫电视认罪。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威胁、酷刑和制造恐怖气氛”来强迫电视认罪。

作为交换，在这之后不久，王宇被释放，但并没有获得自由。她被强行送回内蒙古乌兰浩特，那里是她的家乡。国保为她租用了一间公寓，强迫她住下，将她软禁起来。房间对门就住着国保，以便时时刻刻地监视她。“我们走到哪儿，国保都会跟着我们。”王宇说道。

李昱函要去见王宇，这是一个大胆又危险的抉择。“那里很偏僻，很难到达。”王宇这样描述她家乡的那座小城，国保禁止任何人探望她，前来的人被以检查身份证相威胁。同行的还有文

东海，另一位勇敢的人权律师。

为了避开国保的严密监视，李昱函把自己隐藏在帽子和墨镜之下。他们先到达王宇母亲的家里躲藏起来。王宇在晚些时候乘坐国保的车来与他们会合，这让国保以为她只是探望自己的母亲。国保们放松了警惕，继续留在楼下的街道——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需要躺在车里休息，只是有时需要拦截那些贸然来访的“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例如人权律师、记者和外交官。

“‘讲述中国的故事’意味着这些对人权的侵权行为最终会装扮成‘新闻’的形式，流向世界各国的屏幕上。”

保护卫士在2018年发布了一份名为《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的报告，揭露了709镇压中中国政府如何使用强迫电视认罪来对律师实施打压。

她们拥抱在一起。“大概两年的时间里，我是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王宇开始陷入回忆，讲到这里

时，她的情绪有了些略微的起伏，“两年了，第一次见到亲人那样的感觉，非常激动啊。”

精心策划的“骗局”被揭穿，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当局很快发起报复：几个月后，李昱函在沈阳被捕。检察官指控她涉

嫌“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随后她被严重超期羁押，据称期间受到酷刑，直到6年后的2023年，也就是最近，才宣判。漫长的岁月里，她的一位代理律师已经离世。

李昱函拒绝认罪，当庭宣布上诉。

打压不止

“他们不可能承认错案，改判的空间几乎没有。”李昱函的律师坦诚，案件的二审“已经不是法律问题”。

中国法院将二审发改率(发回重审和改判率)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法官无法独立审判，共产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接受其领导，以确保判决结果符合党的意志。法院的审判结果被重新推翻被认为是对党-国体制司法权威的挑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2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2022年，刑事案件的二审改判率只有9%，这个数字在近年来持续降低。在敏感的政治案件中，上诉几乎没有希望。

“但是从理念角度来讲，该发出的声音还是要发出，”李昱函的律师说道。“最起码要留下一些印记吧。”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共产党加强了对法治的表述，这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扩大政治自由化的象征。但很快，活动家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全国各地法庭的人权律师正在遭受更大力度的镇压——在709大抓捕中达到顶峰，至今仍没有停止的迹象。

李昱函被捕九天后，当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时，活动家们已经清楚，对于他们而言，法

律是镇压工具，无法提供保护。这个由习近平直接领导的小组不受监督且不透明，凌驾在政府和司法机构之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十九大报告中写道。

当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统治出现危机。中国政府正在将法治重新表述为“依法治国”，通过加强民主性缺失的立法来为威权主义政权创造正当性来源。但是，人权律师显然仍旧固执地将法治理解为法律对权力的约束，他们希望通过为个案实现正义来巩固公民的权利基础。

“继续对律师的打压会变成常态。”

29原则理事潘嘉伟对《莽莽》说。

“‘依法治国’只是通过恶法作为人治的手段，”英国人权组织29原则理事潘嘉伟告诉《莽莽》。“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建设法治国家’只是维持中共独裁的做法，绝非民主国家所展现的依法治国和法治精神。”



李昱函、文东海前往乌兰浩特探望王宇时和她留下了一张合影，此时监视王宇一家的国保正在公寓楼下的汽车上。
图源：王宇 X@wangyulawyer

“709案件有指标性，过了八年后，仍然有像李昱函律师这样的案件，被关押多年后仍被重判，反映当局对人权律师绝不手软。”他补充道。

近年，709大抓捕的直接受害者已经相继出狱，但这场运动并没有结束。中国政府改变了策略，变得更加隐秘——一次镇压一个律师，以防止出现新的受害者家属的联结，“709妻子”们声势浩大地声援行动令他们恐惧。包括李昱函在内，一些为709律师辩护的律师正在相继入狱或失去律师执照。

一个执着的人

爆发而失学的她加入了红卫兵，曾到北京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伴随着毛泽东呼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李昱函来到农村插队，跟着农民插秧、种地。一直到文革结束前两年，她才回到城里，最初学过赤脚医生，在卫生所做些临时工作；等到国家政策允许知青返城，她被正式调回，分配到抚顺当地的一个工厂工作。

中国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李昱函没有选上考试名额，因此并未参加。并不甘心的她在工厂的工作之余报名参加了电视大学来自学。到了八十年代，李昱函和同厂的另一名工人结婚，在1981年生下了儿子，这让她的学习进程中断了。

八十年代末期，李昱函重新开始自学法律。“我的母亲是非常要强的人，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李昱函的儿子、目前生活在德国的马先生接受《莽莽》采访时说道。他认为母亲的这种性格

1949年，李昱函出生于辽宁抚顺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和共和国同岁的她年轻时的经历和时代的潮流紧紧绑定在一起：上中学时因文革

“再这么控告，我没人的地方先打瞎眼睛，然后给你们灭门。”

周长江的律师对李昱函说道。

是促使她选择学习法律的原因。

工厂的工作十分辛劳，李昱函就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自学。后来通过参加成人自考，进入吉林大学的法律专业学习。她在1990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在一年后开始执业。据统计，在这一时期的全国律师人数仅为三万余人。

平静的生活在1997年被打破。这一年，李昱函的儿子在中学里遭到严重的校园暴力：他被几个校霸索要钱财和殴打。这导致孩子患上了精神疾病，不敢上学，后来被医院鉴定为二级精神残疾。

校霸的父亲名叫周长江，是当地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老板。李昱函找到他，要求获得道歉和赔偿，但被后者拒绝。当学校和警察因为惧怕周

老板的势力而拒绝处理后，李昱函开始通过法律诉讼为自己的儿子维权。

但这激怒了周长江，他开始对李昱函一家实施报复。他找来自己的打手骚扰李昱函的儿子，李昱函就带着儿子搬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律师曾被视为“右派”，律师行业被取消，文革后才得以重建。直到1986年，也就是李昱函开始执业的五年前，中国才建立起今天的律师考试制度。

图源：受访者

沈阳，然而周长江仍旧不放过他们一家。

在多次遭到黑社会殴打后，李昱函的丈夫因惧怕报复而希望她停止维权，在被她拒绝后选择了离婚。法院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了父亲，但儿子却继续跟着李昱函生活，父亲在那场下岗潮中失去了工作，无力抚养他。

周长江和他的小弟们永远阴魂不散。李昱函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仍然继续被骚扰。为了躲避，他进入军队服役，然而周长江又派自己的律师过去，把他曾患有精神疾病的

事情告诉了军队领导。于是，曾立下三等功的他失去了读军校和提干的机会，只能在两年后复员。

他的精神疾病时常因周长江骚扰的刺激复发，这让李昱函多年来都奔波在带他看病、散心的路上。李昱函仍旧坚持控告，周长江的报复开始变本加厉。

最严重的一次，李昱函在司法局大门口被三个打手绑架到汽车上，碰巧遇上一个电视台在拍摄才得以脱身。然而公安局却放走了绑架者并拒绝立案，检察院又对她的控告百般刁难。另一次，她在市场被人从背后用钝器袭击，肋骨骨折，后脑受伤。周长江的律师公然对她承认这是他们所为，并威胁要把她“打瞎眼睛，然后灭门”。

为了躲避报复，李昱函只好借钱把儿子送到德国上学。但她却从未停止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利的步伐。

诉讼拖了很多年，法院换了数任法官都不敢作出判决。周长江公然宣称他和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都是哥们”。在终于得到了胜诉结果后，4万余元赔偿也始终得不到执行。李昱函的弟弟李永生告诉《莽莽》，到2017年李昱函已被羁押后，他尝试帮助他的姐姐执行赔偿，但失败了。

周长江没有回复《莽莽》的置评请求。截至发稿时，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显示，自2015年开始，周长江共有11个失信被执行记录。但辽宁建设工程信息网公开的一份中标公示信息显示，2017年，以周长江为项目负责人的公司获得了沈阳市的一个公安局派出所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资格。

奔走一年多 终“会见”

李昱函在辽宁坚持不懈地控告当地政府的非法和不为为，这让她的律师工作受到

²抓捕、遣送访民是各地方省市驻京办的一项重要职能，一些驻京办宾馆会被用作关押访民的黑监狱。

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至于无法继续在辽宁执业。不得已，2009年，她转到北京的一家律所工作。文东海律师在他一篇回忆李昱函的文章中开玩笑地说道，在北京坚持继续上访的她变成了“律师访民”。

接下来的几年里，因为继续上访，辽宁公安数次到北京来对她施加迫害：当街殴打，或是抓入驻京办的黑监狱²。即使心脏病发作，她也无法得到治疗，警察甚至会继续对她使用酷刑。

当李昱函来到北京时，中国正在进入“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广州等城市爆发反政府的和平示威。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大约这个时候，本是为自己和孩子维权的李昱函，加入了人权律师的行列中，开始接手所谓的“敏感案件”。

“一些是信仰方面的案子。”王宇回忆道，她指的是法轮功案。李昱函的另一些当事人还包括被迫害的退伍军人和各地访民。

当2015年7月席卷全国的镇压来临时，李昱函并没有直接成为当局的目标，直到她在一个月后勇敢地代理被捕律师王宇的案件时才卷入其中。王宇是那场运动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她和丈夫包龙军、儿子包卓轩都遭遇强迫失踪。

王宇在709镇压中被抓捕以前和李昱函并不熟悉，只见过三面，都是在两人前往外地代理案件时碰巧遇上，甚至其中一次只是在地铁里匆匆地打个照面。根据王宇的回忆，这张照片大概是2014年拍摄的。

制图：《莽莽》



7月9日凌晨，数十名警察包围了王宇位于北京的家。水、电和网络被切断后，警察破门而入，把王宇套上黑色头套，带到一个秘密的拘留地点——她

至今仍不知道在哪。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不抓你，你就以为你没事儿了。不抓你则已，要是抓你就让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负责审讯王宇的预审警官对王宇这样说道。

此时她的儿子包卓轩正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机场，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澳洲开启留学的新生活。在登机口，他们被拦下带走，随后一同失踪。一份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³的统计数据显示，接下来的四天里，在全国范围内有114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带走、传唤或约谈。

整个抓捕的过程里，王宇甚至没有得到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书。她向审讯警察抗议整个行

³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是一个位于香港的人权组织，主要由香港法律界人士及立法会议员组成。港版《国安法》通过后，该组织于2021年9月21日宣布解散。

动就像一场“土匪绑架”，拒绝回答审问。随后，她开始受到酷刑。

王宇在《失踪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这段经历，这本书已于2017年在美国出版。关押她的房间里挂着厚重的窗帘，没有一点阳光。办案人员在连续一周时间里对她剥夺睡眠，并给她带上沉重的手铐脚镣作为惩罚。每一天，她都被强迫在监控前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她认为这是对女性极大的侮辱。

几天后，王宇工作的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在央视上认罪，并攻击她“二楞子，胡整”。办案人员向王宇播放了录像，她仍旧不为所动。当警察强迫她电视认罪时，她激烈地抗拒，以跳楼相威胁。

王宇开始要求为自己委托律师，当她报上一些律师的姓名时，警察告诉她他们将把这些人全部抓捕。后来，连审讯警官都看不下去了，劝她说，“你别害别人了，你要是说谁就抓谁”。当警察欺骗王宇“你现在被抓了没人管你”的同时，她的数十位律师同伴受到恐吓，被禁止代理她的案件。几个已经着手代理的律师迅速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退出。

“他(文东海)说当时在火车上就有人给他打电话。就问他，王宇的案子你还敢代啊？他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也害怕呀。”

因代理王宇案，李昱函律师和文东海律师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王宇根据自己的回忆描述了文东海刚接手该案时的情形。

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李昱函毅然选择了接下这个案子。我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她是否会意识到，这将为她带来六年多的牢狱之灾。

但是作为人权律师，李昱函感到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没有人代理这个案子，那谁来代呢？那可



王宇电视认罪视频截图 图源：澎湃新闻

能就没有人代。”王宇回忆起李昱函的坚持。

王宇补充说，人权律师对此想法一致。

7月11日早晨，包卓轩被释放，随即被家人接到天津的爷爷家居住。他翻出了父亲留下的电话簿，开始按顺序给上面的律师们打电话，为父母寻找救援。他曾在机场被带走时激烈反抗，记下了一个警察的警号，现在，他把这串数字重新背诵出来，这对夫妇的律师朋友据此推断出抓捕王宇和其他律师的警察来自天津市河西区。

在发现包卓轩正在和律师取得联系后，国保将他送到乌兰浩特。随后，他在一次失败的偷渡行动后被置于更严密的监视之下。

“所谓“三证”是指经年度注册的执业证、所在律师事务所公函、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根据法律规定，律师持有三证即可会见当事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昱函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京津两地。她数十次来到天津市的公安局和看守所里要求会见，但是，王宇被化名关押，她无法查询到王宇的名字。

一次，李昱函和其他几位709镇压受害者的律师、家属一起去天津的看守所申请会见。李文足和王峭岭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就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里到处乱跑。李昱函问警察，为什么律师三证齐全“就是不能会见，警察则搪塞说要请示领导。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是午饭时间，警察继续找拙劣的借口，说领导开会去了——领导的会开不完。

有人说：“领导也得吃饭，咱们等领导！”他们买了饭，就在接待室里吃完。等到下午两点半，警察又说“领导不来了”，由于家属们需要带着孩子开车回北京，大家只能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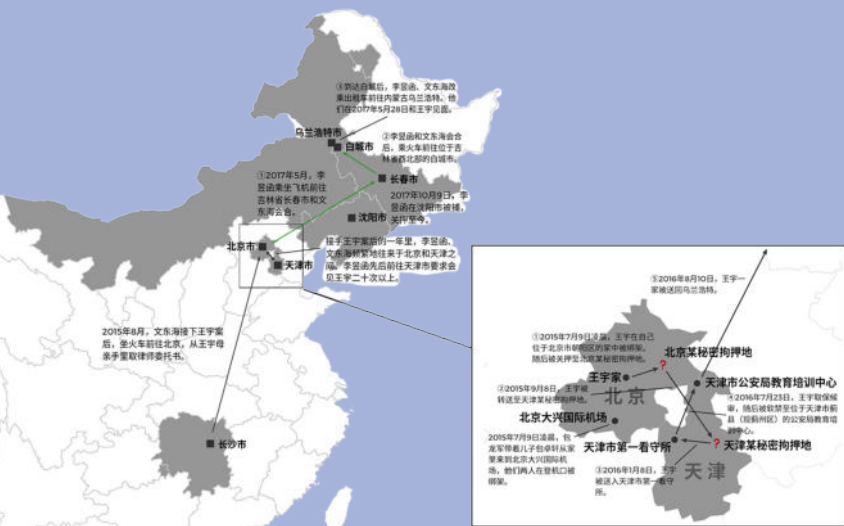
李昱函还毫不畏惧地向当局的违法发起挑战，在一份提交给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的申诉材料中，她要求追究中央电视台等播放王宇认罪视频的媒体的法律责任。

即使无法会见王宇，李昱函仍希望去拜访她的母亲和儿子，给家属一些精神支持，但国保总是从中作梗。2015年10月23日，

包龙军、包卓轩获得天恩国际交流基金会颁发的希望奖，李昱函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宇的母亲和儿子，就动身前往乌兰浩特。但就在那天早晨，警察突然把王宇的母亲接到派出所，并没有什么正事，只是和她闲聊。警察很客气地给她沏茶倒水，还端来了水果，直到很晚才送她回家。后来，老人才知道，那天李昱函来探望她。

得知王宇的母亲被警察带走后，李昱函又追到公安局。她冲进里公安局大楼里，一边上楼梯一边喊“蒙蒙(包卓轩)得奖了”，最终被警察推搡着赶了出去。

2016年年初，当王宇被转送到



李昱函代理王宇案示意图
图源：作者

⁵王宇亦在认罪视频中指控周世锋“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攻击抹黑政府……为颜色革命做基础工作”。



根据李柏光律师发布的一份会见记录,《莽莽》复原了李昱函在看守所中遭受酷刑的场景 / 插画师:一嚙飯

天津的看守所里,她感觉环境正在变得轻松——警察已经不再提审她,而是每天把她请到管教办公室谈话。警察继续要求她电视认罪,并以她在国内的儿子相威胁,为了换取把儿子送出中国和丈夫的释放,她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妥协了⁵。

2018年,包卓轩在原本计划出国的三年后终于踏上了澳洲的土地,接着又辗转来到美国,接受《莽莽》的采访时,他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社区大学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

王宇在2016年7月23号取保候审,又在天津滞留了一段时间后,一家人一起回到乌兰浩特,住进了国保安排的房子。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一旦踏出家门,国保设在附近的办公室就会警铃大响;即使只是出门买点蔬菜,便衣警察也尾随其后。

半年多后,当李昱函终于和王宇取得联系,她立刻踏上了“会见”的旅程。在王宇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未能成功会见哪怕一次。王宇甚至对李昱函是自己的律师完全不知。

她们拥抱,诉说着两年来的无限感慨。只是此时国保还在楼下,他们很紧张,没有太多的时间叙旧。李昱函继续做起了律师的本职工作,她让王宇和包龙军重新签署了一些委托书,确认代理关系——她担心这对夫妻会在取保期满后再次被捕。然而不久后,需要被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却变成了她自己。

漫长羁押后 仍坚拒认罪

当警察发现李昱函居然突破了严密封锁、如此大胆地挑衅他们的权威时,他们气急败坏地将她抓捕。2017年10月9日,这天是李昱函68岁的生日,警察以“融冰行动”为幌子,欺骗她称要解决她多年来上访的诉求,当她按约出现在



2021年3月12日，律师蔺其磊（左）和姬来松前往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会见李昱函时，在大门外留下了一张合影，此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时。在这之后不久，蔺其磊律师因代理“12港人案”被吊销律师执照。

图源：受访者

公安局后，至今没有再走出来。

弟弟李永生在这天接到了李昱函打来的电话。李昱函躲在厕所里，急促地说，警察要把自己刑拘，请李永生向她的同事们传递消息。这时，警察已经发现了异常并开始敲门。电话在两分钟后挂断了。

这次被捕以前，李昱函每周都会和在德国的儿子通话聊聊近况，只是她几乎不会和儿子讲起自己接手人权案子的事情。她的儿子表示，他没有在和母亲的最后几次通话中感到任何异常。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真担心会被他们迫害死掉！”

李昱函在被会见时对李柏光律师说道。

由于正值十九大维稳时期，李昱函的律师朋友们对此并没有特别地重视，以为她会在十九大结束后被释放。直到她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刑事拘留，几位律师的数次会见尝试都被拒绝，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大约两周后，两位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李昱函。根据其中一位律师蔺其磊的回忆，李昱函告诉她自己受到虐待：她被警察粗暴地推进监区的大门，以至于差点摔倒；被捕以来，她没有正常的饮食和睡眠，并且无法得到长期服用的药物。前来和律师见面的时候，她需要在同监室友的搀扶下行走。

12月李柏光律师在另一次会见后发布的通报里描述了李昱函遭受酷刑的更多细节：在冬天，她被要求用冰冷的凉水洗澡，她购买的水果被故意放在厕所淋上尿液。两个多月后，李柏光律师因一场离奇的肝病而去世。

⁶截至发稿时，在这封公开信的联署人中，已经被吊销或注销律师证的律师包括王宇、隋牧青、文东海、祝圣武、蔺其磊、唐吉田、刘士辉、余文生、刘正清、刘书庆、任全牛、丁家喜、谢燕益、王秋实、李金星、覃永沛、滕彪、刘巍、郑恩宽、梁小军。

85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联署的一封公开信寄往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这份信的内容由王宇撰写，呼吁停止虐待和立即释放李昱函律师。当国保找到王宇时，她毫不犹豫地承认。“她是我的律师！”王宇激动地对国保说道。《莽莽》检查了这份公开信的联署人名单，发现其中已有至少20名律师被剥夺执业资格⁶，一些人入狱或流亡。

李昱函的羁押被各级法院数次延长，但她从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批准文书。到宣判时，她已经被超期羁押了六年之久。先后有十几名律师代理过她的案件。

到后来，案件已不继续侦办，法官来到看守所提讯她时，只是让她认罪。“认罪了就可以出去，”提讯的法官对她说，“你认罪了，我们就好处理了。这些不是我们所能做主的”。

在蔺其磊看来，李昱函清楚公权力的欺骗本质。作为一个曾经的人权律师，她已经目睹了太多当局肆意违法的情形。她正是在办案过程中坚持律师的职业道德，依法捍卫当事人的权利，因而冒犯政府，才遭受此般迫害。如今法庭逼迫她认罪，她不能违悖自己的良心。

“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生活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我不构成犯罪。”她告诉律师。漫长的羁押已经摧残了她的身体。

“但她的精神一直没垮。”律师说道。

“(我)不认罪，这是打击报复。”

李昱函在最后陈述中说
道。

该案在2021年初次开庭。起诉书里，她为残疾的儿子申请低保属于“诈骗”；在天安门前路过，则构成“寻衅滋事”。律师做无罪辩护，否认了全部指控，称这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粗暴践踏”。



2019年，已流亡美国的艺术家、人权捍卫者向莉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举起写有“FREE Li Yuhuan”的标语。图源：向莉 X@xiangli001

这次庭审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最终却没有作出判决。律师也无法回答原因，只是说，这种做法“违反道义，践踏人性”，他们将继续追究当局程序严重违法。

2023年10月25日，李昱函案再次开庭。她在两名法警的搀扶下出庭受审，如今身患多疾却长期得不到治疗的她，没有拐杖已无法自己行走。

李昱函当庭提出管辖权异议，她连续二十余年控告沈阳市和平区的法院违法，如今却由这个法院来审判她。被拒绝后，她起身准备罢庭，在弟弟李永生的劝说下才没有离开。“他们违法，也把这违法程序走完。”李永生这样劝说他的姐姐。

律师称法院甚至禁止他们携带水杯，上厕所时都有法警跟随。但同时，律师表示，法庭“认真听取了李昱函的自辩，以及辩护人的发言”。

王宇也来到了法院，但她被拒之门外，禁止旁听。她说现场有至少几十个便衣国保，犹如戒严。不过，当各国的外交官员出现在现场时，国保们在一瞬间消失了。

李永生本想在法院门口等等王宇和另外几个想来旁听的朋友，但法警警告他不得停留。当他告诉法警自己是被法官请来旁听时，法警“连劝带拽”，强行把他拉入院里。在法庭的窗内，他望见王宇已经到达法院外的街道。旁听席坐满了，只不过除了李永生外，全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李昱函的表妹被拦在法院之外的寒风里。

李昱函被当庭判处6年6个月有期徒刑。人权律师将这种判决讥讽为“实报实销”，意为政治犯被判处的刑期刚好高于超期羁押的时间。

法院采信了检察院的所有指控，将李昱函和律师的辩护全部驳回。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包括她的“非正常信访”和为儿子领取低保补助金。不过，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对律师说：“你今天的辩护效果很好，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没有回复《莽莽》的置评请求。判决书并未公开⁷，《莽莽》得到了一份判决书的副本。

献给709律师，和律师的律师，和律师的律师的律师..... ■

⁷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裁判文书在生效后七日内应当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但法院往往不会依法公布敏感案件的判决书。

《莽莽》是如何报道这个故事的？

这篇报道是基于对8位在过去数十年里和李昱函有关联的对象的采访而写作的，受访者包括李昱函的家人、朋友、被代理人 and 律师。其中一些人因惧怕中国政府的报复而要求匿名，一名受访者称他已经收到多个政府部门的警告，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除此之外，《莽莽》还阅读了一些关于李昱函的书面材料，包括公开信、律师的申诉材料和法庭文件。

莽莽为何关注这位年长的人权捍卫者的故事？

起初看到这样一篇关于人权律师的投稿，我本人对这个题并没有太多兴趣，更多是出于责任（my duty）来接这篇稿子，这种很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我做到最后。

我发现在编辑的过程中，当搜集到更多的素材和信息，包括请记者多补充些更细节和具体的描写后，我慢慢被打动，开始理解她，同时也从她身上看到了深深的不屈不挠之精神。有几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李律师年事已高被这样对待，想到她的相片，就会感到很难过。这些都能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关联。

这个过程让我想要“关注下去”，写下去。

在编辑这篇人权律师的稿件时一直深感“艰难”——一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的律师们追求与坚持法治与人权理想之艰难，二是记者为记录他们的故事所面临的采访之艰难。李昱函律师仍然身陷囹圄，无法直接讲述自己的理念

与遭遇，她对儿子提醒自己做捍卫人权的工作，代理王宇案之艰难，也令她没有太多机会和时间来向外人诉说她的心路，围绕在李律师身边的家人、其他律师等也无不面临巨大风险，他们难以无惧地讲出全部细节。

这份“艰难”导致她的故事难被诉说，知者甚少，不断被边缘。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在年轻世代的行动者眼中，是如此的“遥远”与“不可及”，鲜有人了解、关注。在此，我们通过这篇报道，试图向公众还原李昱函律师的生命故事，她一个人如何默默坚持自己的人权信念，政权又是如何残酷镇压这样一位为儿维权、为人权律师维权的母亲、律师、执着的普通人。

人权律师的生命故事或许与年轻世代的人生轨迹迥然不同，但通过阅读他们的故事，年轻世代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数十年来的民运历史。老一辈人权、法治捍卫者或许受限于时代，关注的议题相对狭窄，但他们的抗争故事值得被记录，他们的抗争勇气值得被看到。

关注他们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人权律师面临多种形式的打压，当局封锁他们的信息，恐吓讲出真相的人，目的是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意对待他们而不受监督。唯有让更多人关注他们的故事，人权律师才会更安全。

《莽莽》希望以此篇报道推动年轻世代行动者对不同世代的活动人士的关注，也在此提出某种愿景：不同世代、不同议题下的抗争者彼此能有更多对话，彼此相互关注对方的议题。■



在場



Insight

extinction
rebellion

写在台湾大选之后：

not my president, but my duty

作者 / 風泰

如今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民主不只关乎胜败。外界和政党最关注的莫过于选举结果和政治权力的分配，而作为一个人——一个来自中国，从来没有参与过自由选举的人，我来到台湾不只是观看一场选举，更是想看民主是什么，人民和民主的距离与关系，以及民主的语言。

本文为笔者于台湾观选后所作，由于精力和时间有限，无法到访各党派造势会及与各路人士作交流，因而仅能呈现有限的观察和记录，实非出于个人政治偏好而作选择性记录。

参与监票——第一次参与民主这件事

开票现场 图源：風泰

1月13日是台湾大选的日子。当天市民纷纷走进投票所投票。在投票所外侧走廊公示张贴着各政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和各立法委员的选举公报，上面详细展示了被选举者的个人信息及政见。

下午四时许，投票站停止投票，工作人员开始重新布置场地，准备开始计票。我来到一所设立在学校中的投票所观看计票。投票站的外围由两张长桌划分开来，前来监



票的市民须站在长桌外侧不得逾越，票箱距离长桌约为两米。桌旁站着警察，负责维护现场秩序。

在投票所旁的立柱上张贴着由中央选举委员会编印的《公职人员选举选举票有效与无效之认定图例》，分为有效票和无效票图例，密密麻麻列举了如何分辨与判断何为有效与无效票，它们分别有28和25种不同的辨认类别。从未投过票的我头一次看到选票上能有这么多不同情况的印章需要作区分，实为惊讶。我快速地过了一遍所有列举的情况，学习如何辨别。图例上甚至有一条提到可能由于选票折叠导致圈选印章反印到另一边，这种情况当属有效票——不禁赞叹监票工作竟有如此之细节考究。

在工作人员宣读完一段仪式性的开票宣言后，身后的两组人员正式揭开贴在选票箱上的“台北市选举委员会封条”，而后打开纸质的选票箱。现场有两个选票箱，一个是区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员票箱，另一个是正副总统候选人票箱。现场分为两组工作人员，每组各四人，分别负责取票，认票，计票和集票——简单来说，一个人负责取出选票交给认票员，认票员看到选票后当即大声公告“X号XXX一票”，并同时 will 将选票举过头顶停留一秒以供民众监督，而后将选票交予集票员收集并分类在桌上，计票员则在现场的计票纸上以画“正”字的方式计票。

“X号XXX一票”，下一秒钟，“X号XXX一票”，计票员快速重复着认票员的话，身体面向正前方的观众在计票纸画上一道，整个过程流畅又铿锵有力。我目不转睛盯着被高举的选票，确认其记录结果真的与认票员所认定的选票结果相符。

此时此刻，我的目光与其他市民的目光一起聚焦，构成了公民监票。这是我本次观选中唯一能有机会参与民主这件事。不同于在前一晚造势大会上的游离疏远感，这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公民权利实践的滋味，哪怕我做的仅仅是站在这里监督。

监督民主这件事其实是双方的“两”厢



情愿，一方愿意无死角地展露运作过程，另一方愿意花时间亲临现场监看。即便我在台湾没有选举权利，但那些与我素不相识的人们在这天投下的票被公开透明地计入国家选举结果中——一笔一画，白纸黑字，民主被写下。

它们最后被计算、确认，成为了国家意志，亦构成大选的最后一个环节。它在我的眼前发生，如此确信，让我知道这一切不是被操纵，也不是被胁迫的，而是真实的民意体现。在这其中，我是被尊重的，我的目光算数，我的存在有意义，我没有被任何人强制代表。

计票站的工作人员男女老少皆有，或许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政见和喜好，都有心目中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在这一刻彼此配合、和睦相处、公正无私。这是在自由选举社会中被焕发出来的一种景象。有人会觉得民主很乱，要选这么多不同的人；计票簿上一笔一画的正字也不尽相同，或许歪歪扭扭看起来不够整齐划一，但它们井然有序，真实不假。

在选举前夜，也就是12日晚，我拜访了国民党和民众党的造势大会现场。

选举前夜——造势大会上的热闹与茫然

刚抵达国民党的造势大会，就看到一团一团的长者从大巴上走下，聚集在一起等待有人把他们领进大会现场，他们手中都举着两面旗帜：国旗和支持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旗帜。这样的阵势看起来像是旅行社组织的老人旅行团，大家彼此都认识，行程都已被安排好。

走进造势会场，人愈发多了起来，目光所及几乎都是成群结队的老人，伴随着现场高昂的选战动员氛围，人们挥舞手中的旗帜，构成浩大的声浪与人潮。我试着接近一对婆婆和她们攀谈，但她们看到我后眼神突然警惕，随后转头



以示拒绝继续往前找位置坐。

幸运的是我成功与一位在场的婆婆聊了聊她的政见。她是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民进党在她眼中不过是不断抹黑造谣者，而国民党则太过软弱。她平时在网上看到关于中国的视频，了解到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强大的、发展得不错的国家，有机会她很想踏足旅行一番。至于民主自由，在她眼中则为乱象，“网络上什么声音都有，太混乱”。被问起历史，她怀念台湾戒严时期时的“稳定”；谈及白色恐怖，她则表示人民知道什么话该在外说，什么话不该说。

我好奇问她，有自由选举好还是没有自由选举好，她答还是没有选举好。

没有自由选举好。

与此同时另一场造势大会外的马路上，人们三三两两各自走，头上无不戴着绿色的小草头饰，他们是柯文哲的支持者。我努力地在人潮中辨认来者，他们大多为男性，大多为年轻人，当中也不乏一些中年男性的身影。



走在凯道上，人头攒动。在这里的人数似乎远远超过国民党的造势大会，在现场几乎看不到多少年长者。这里也当然是属于年轻人的天地——手机闪光灯摇曳下的灯海，全场大合唱，主席台传来劲舞歌曲（曲风很像抖音热门歌曲），以及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在舞台上继续用一口不太流利的国语读稿。凯道此刻宛如一个大秀场及明星演唱会，年轻人仿佛是在为某个政治明星加油打气，将自己对民众党会胜选的情感期待投射进欢快的大合唱中。

身处其中的我既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也无法对这样的喧闹沸腾之景感到共情，而是彻底的无动于衷。那一刻的我仿佛是被按下了静音键。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台

上的候选人都不会是我的总统(not my president)。我想起一年多以前，习开启了第三任任期，我同伙伴在街头贴上Xi Jinping, Not my President的贴纸。

我感到身处在一场热闹欢腾的真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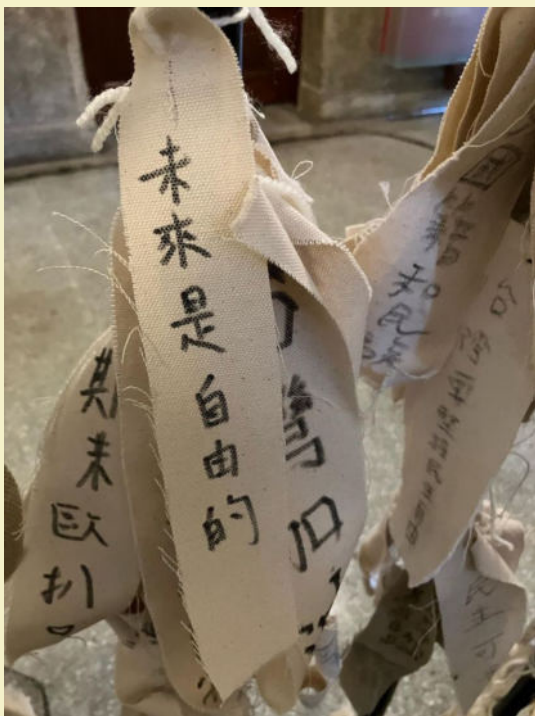
这样的感受将我带回到多年前第一次在我所在国参与游行，我跟随年轻的示威者加入反极右翼的队伍中，还记得游行的终点是市中心的广场，在听完有人在现场做的演讲后，音响里突然开始播放音乐，随后整个广场的人跟随音乐起舞，我呆立于其中，感到不属于这里。没想到多年后，我仍然不适应这样既政治又欢乐的集会场。试着和这个场域的氛围搭建起些许连结。在身旁有几位年轻人，他们盯着前方的大屏幕，眼里闪着光，我顺势坐下和他们攀谈。

得知我来自中国，他们很好奇地先开始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说从未参与过选举，在中国也无可能看到选举造势，我想来看一看现场，听一下其中的人的想法。

他们是坚定的柯文哲粉。被统一或是独立，亦或是战争，在我身旁的年轻人（也是大学生）眼中是个伪命题。在他看来，无论是谁当政，这些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而两党囿于此伪命题之争，互相恶斗，让他们看不到希望。柯当台北市长的履历让他们感到他是一个务实者，关注人民切身的议题。谈及柯的厌女言论，几位年轻的男性选民表示任何人都会失言，他们相信柯若当政会改进，况且柯的党内亦有不少女性担任高位。确实，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为女性。

不过老实说我不太明白柯选吴欣盈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意图。因为早前看过她在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的表现，她用国语演讲比较结结巴巴，很多时候无法理解她说的话，演讲中夹杂着很多英文经济学专用名词，看起来很不接地气，或许只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选民才能明白她在说的话吧，年长的选民真的能听懂她的政见吗？

几位年轻人都是95后，在读书长大的岁月里几乎都是民进党执政，他们有着想要看到政党轮替的强烈心愿。我曾经以为年轻



于二二八纪念馆 图源：風泰

世代或许对于自己的国家有着更深的认同，但惊讶于他说从小到大对这个国家并无太多认同和感到骄傲的地方，我反问道台湾是华人社会中最后一块能有民主自由的地方，难道这不值得骄傲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喔，是喔。语气中带着些许茫然和不自信。看起来他从未想过，或许也从未意识到这件事。或者说，他是否从未把台湾纳入到“华”这个概念之下呢，眼前的这座岛屿、这个城市不过是他自幼生长的地方，而对岸的中国自始至终就是“另一个国家”，何来的“华”，何来的“华人社会中的一员”这样的想象？

而在他看来，我来自一个强大的国家，领袖习近平是一个强人，同样地，在国民党造势会上认识的奶奶也如是说：这是一个国力强、经济强、军事强的国家。他们

坚信这三点构成了中国的“强大”。我从未想到，有那么多词汇可以用来形容对岸的中国，而两边不同世代的选民不约而同都使用了“强国”。

要知道这样一位来自“强国”的我，其实是带着好奇和不安来到这里想了解民主是什么。我自认为来自一个独裁国家（而绝非什么强国），从未经历过自由选举，从那里走出来，对民主只有着模模糊糊的理解和想象，一度担忧自己在这样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可能被歧视，因为我身上带着独裁社会的影子，对民主陌生而无知的影子。

我的身份似乎在民主社会也变得更加多元起来：在护照上是中国人，在台湾是强国人，在网络上是支那人。



民进党竞选总部墙上的漫画
图源：風泰

音乐开始响起，手机灯光随着大家头顶上的绿光小草摇曳，此刻此地，这里完全成了一个大家庭，或是大本营，被情感动员构建出来的共同体景象让人们在其中陶醉，充满对明天的信心。

临别前，小伙子们和我碰拳道保重，我回祝他们明天投票一切顺利。

我跟随人潮渐退，看完此情此景内心难免也开始有些触动，可这样的情绪如此微弱，实在无法于心中掀起波澜。想起那位始终坐在我旁边的小伙子，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关系好像也不是新认识的朋友；我们两位异国异域，即便为了讲话靠近坐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也隔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裂缝”，我们对着裂缝那头的彼此瞭望、喊话，有时能听清，常常不理解，总是在分离。

语言、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万岁”……在中国的政治语言中能找到的代表“我”的表述基本上都与这些带有“人民”二字的话语有关，即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人民即为在这套语言中拥有实际权力的主体。“人民”随处可见，遍布中共的政治语言，我梦想中的那些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利在这样抽象的政治语言中亦被“抽象”掉了。在现实的政治里，我几乎没被任何人和组织称为选民和公民。在身份证上是居民，在政治上是人民，在现实中是臣民。

追求自由反体制的年轻一代中国人创造了“反贼”一词来定义身份，强调反抗精神，但这样的词好像也无法让我有归属感，每个人反对的事务不一，而我也不想被贴上某种带有贬低和反讽的“贼”的身份，我只想做公民。

在台湾，政党当然也会用“人民”这个词，但有趣的是，民众党的年轻支持者使用“小草”来称呼自己，定义身份。柯文哲在选后也发表了名为《给小草的一封信》的演说视频，这样的政治语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我所在国都前所未见。

政治人物和其支持者之间形成亲密的“联盟”，故而使用类似娱乐明星和粉丝之间的昵称互动，看起来无可厚非。但难以想象被包裹进这样的政治语言中，作为选民和公民，自身的公民权利是否会被这样的政治语言之“糖衣”所收买。小草是柯文哲的小草，如果对柯文哲进行批评，还是小草吗？作为小草还是作为公民的身份来批评政治人物呢？或者说，当我成为小草后，还会记得自己是公民，以及拥有的那些公民权利（比如批评、监督政治人物的权利）吗？

在造势大会的现场，男性小草表示相信柯文哲当政后会改进之前的“厌女言论”，让我想起国内娱乐明星犯错后粉丝依然会为偶像说话，觉得他有一天会变好的。基于选民和候选人之间搭建的情感连结是否会变成情感绑架，将一些实际问题埋藏起来，模糊化，暧昧化。政治娱乐化又是否会消解严肃政治所规约的政治责任，将政治人物的失言、犯的错转变成某种不过是一向被呵护的自家明星一时犯的小错，该维护的还是要维护，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

联想到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其俨然是某种软性的明星公关秀场，墙上挂满赖清德与狗狗的可爱漫画(赖桑&Luke)，互动装置则让支持者化身棒球拉拉队员，通过虚拟互动来为棒球队队长，即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打气助威，旁边墙上的标语则为“THE MVP OF DEMOCRACY”(民主最有价值的球员)，附带一个棒球的图案。那一刻让我感到仿佛不是来看政党的竞选总部，而是来到了某位著名体育明星的纪念馆。这样泛娱乐化的场域和语言，究竟是为实现某种程度的“亲民感”，还是说可能会重塑民主制度下普通民众与政治人物的关系，使某一方变成了另一方崇拜的偶像、支持的明星？

结语 每次来到台湾都让我感到舒心又放松，在这里可以自由地交谈，民众礼貌友好同时又有遍地美食。

这里看似是一片世外桃源，但这次来却好像隐隐能触到某种战争风险带来的阴霾：手机突然收到国家级警报的弹窗，点开却发现只是因为中国发射了卫星；走在大街小巷，时不时会看到民居门口贴着“防空避难”指示标识……

不过好在选举结束后，一切似乎又回归日常。

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从未参与过自由选举的中国人，台湾的选举其实与我本人和我的国家并无太大关系，但对于民主制度的想象和反思，则是我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看到民主的细节，参与它的一环，与活生生的个体交流，看到“裂缝”从而开启彼此间的对话，乃至对民主制度感到困惑和进行反思，这些统统都是我的责任。■



莽原熱風

Zephyr

编者说：

“热风Zephyr Society”是一个致力于连接海外离散社群的非营利平台，旨在通过线下活动，让不同背景、关心中国社会民生的朋友们真诚放心地对话交流、建立连接。莽莽平台将以图文形式持续记录“热风”的活动内容。

2023年12月10日，揭露“河南血祸”的高耀洁医生在美国纽约逝世，引发了海内外的众多悼念。1990年代，时为退休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在会诊时偶然发现了因输血导致的艾滋病病例，自此走上了揭露河南“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漫长道路。2009年，为保护自身以及所保存的众多资料，高耀洁离开中国前往纽约定居。

2024年初，两位与高耀洁关系密切的嘉宾做客“热风Zephyr Society”，在线下空间展开了一番追忆与对话。两位嘉宾分别是高耀洁传记《烟雨任平生》和纪录片《穹苍那颗星》的作者林世钰（以下简称林），以及《大声》媒体的创办者吴薇（以下简称吴）。

高悬穹苍的那颗星

“中国老百姓真正的品格跟中国官员和一些美国政客口中的中国人差别很大。而高医生和她的帮助者、支持者体现了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

——摘自黎安友写给高耀洁的悼词

“三天来爷爷每天都做同一个梦，梦见他先前去过的汾县城里和东京城里边，地下的管道和蛛网一模样，每根管道里都是流着血。那些没有接好的管道缝，还有管道的转弯处，血如水样喷出来，朝着半空溅，如落着殷红的雨，血腥气红艳艳地呛鼻子。而在平原上，爷爷看见井里、河里的水，都红艳艳、腥烈烈的成血了。所有城里、乡下的大夫们，都在为热病放大悲声地哭。”

——阎连科《丁庄梦》

前序 / 与高医生的相识

林 我跟高耀洁认识是2015年，我原来在中国也是做媒体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她就很有名，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采访到她。当时我来到美国第三年，听说她在哥大附近，最后辗转找了好多朋友，要到了她的邮箱，然后就跟她发了个电子邮件。我问我去看你可以吗？她就几个字说来吧，欢迎你。她非常简洁，很痛快的。

后来我就去了，第一次见她，当时还可以到客厅里走动，她到客厅里接待我，还让那位护工买了一些橘子什么的，就是中国老人那一套待客之道，很热情。然后她就跟我聊。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看到她的脚，大家知道她是那个缠过脚的，还有两个血栓在左腿上，所以她时间坐久了，脚面就肿得像馒头一样。我不好意思问她怎么是小脚，但她自己看我瞄她的脚，就很主动跟我说了。她特别特别坦诚，特别真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我以前都觉得她是英雄式的人物嘛，对吧？但没想到她那么随和，就把我们当成晚辈一样，还拉一下我的手说，你的手很凉啊。

吴 我其实更早一点，她一直是我們做法律报道的人脑海里的一个名字，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媒体圈子里很多朋友从九十年代末就跟着高耀洁，接收她的爆料、跟着她下基层采访。但其实要找到她本人不太容易，她对媒体态度是很清醒的，没有刻意与媒体交朋友，她知道自己是医生、要讲事实，那么就要用上所有的平台资源，花一切机会去跟人讲话。

后来我去美国专门去见高老师。老师其实不是来者不拒的，她会判断一个人出现了是不是影

响了自己做事，所以她会很谨慎地选择见谁。当时有人写邮件推荐我去，嘱咐我背上二十斤河南烩面。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纽约，去法拉盛就什么都买到了；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什么都别带，就给她背烩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行李箱子的空间，背了二十斤烩面杀了过去。

我当时见她的时候，她还没有护工，是自己来开门的。她煮了饺子，摆了水果，很开心地喊我们吃。走的时候她很郑重地交给我三本书，问我们还回不回中国，回的话就把这几本书带回去。她这些年在美国出书，唯一往回带的途径就是请朋友带回去，因为寄一本书太贵了，她要找到信任的人认认真真地背回去。她还会嘱咐：你自己看，你看完了给大家传着看。

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是个传奇人物，但那次见到她，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她是个人什么样的人，她内心的drive(动力)是什么。以及她真的很爱挂面，她的护工说过，别的东西可以搁在厨房，河南烩面要搁在她床头的架子上。后来纽约物资丰富了，中超里能直接买到了，我每次去就背两袋，她爱死了，总乐得像花儿一样。

一、中原血祸，从贫困中榨取政绩

吴 90年代的时候，河南的经济还是不好的。那个时候，他们最简单的就是让老百姓卖血，而且这个是由政府组织的。在各地就起了非常破烂的、临时搭起来的棚子，没有消毒、没有白大褂，而且当时还有传言说用一个针管抽很多血，可怕的是它不是抽了血之后分管保存，而是同血型的血集中搁在一起，打散、让其沉淀，把血清提取走，再将血球输回人体。

这个事情一开始是献血，但是后来就是系统地请老百姓去献血，会给你一点所谓的补助，几十块钱，最多九十块。所以，它已经不是民间志愿提供了，而是一个由政府组织、各地医院参与，但更多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搭一个架子去卖血、非法采血、再进行买卖。

所有的提供者和受害者都是农民，真的是农民，因为越穷的地方才越需要卖一管血来创收。当时老百姓真的是排着队等着来卖这一管血，这九十块钱就造成了各种污染，在非常基层的医院和血站传播，这就是当时的中原血祸。另外一个背景是艾滋病因为卖血一事大规模传播，在当时的公众观念里面还是觉



得跟艾滋病有关的要么是性生活频繁的、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吸毒，都是一些非常不健康、不完整、遮遮掩掩的、ashamed(羞耻化)的讨论。后来就出现了谣言说河南的都是卖血的，“卖血”一词成为了民间致富的一个符号。

其实当时除了高耀洁，还有另外两三个“吹哨人”，都是系统里有良知的医生。王淑平是一个，还有更早的桂希恩。高老师的时候是九六年，她那个时候已经作为省中医院的妇科医生退休了，有一次在给一位农民女性会诊的时候，其大概有十四天的非常严重的炎症，怎么查也不对。最后高耀洁发现其所有的病象指向艾滋病，很震惊，然后她才去调查，发现也没有婚外恋、也没有任何其他性关系，怎么会出现艾滋感染？这个女士十天后就去世了，真的是凭几个良心医生才把这个事情捅出来的。

林

其实在上个世纪出现了血荒，就是血库里没有血了，中央政府就下来了一个政策，允许各个省设置了献血的指标。然后河南，河南本身当地风气喜欢表现自己(包括在大跃进时期)，他们就把这个指标提高了，提高到两倍。所以当时九十年代那个叫刘全喜的卫生厅厅长，开了一个大会，在全省把公办的血站铺开。这个是比较规范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利润太高了，很多人包括卫生厅的下属就自己办了很多血站，还有一些是地下非法的。猪圈、澡堂、自家院子旁边全是血站，他们卫生厅的一个处长去看，洗手池里都溅满了血，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里很像一个屠宰场啊。

农民们的态度是很信任的，因为是政府主导的，到处都是标语广告。我记得2000年去驻马店那边出差，墙上“献血光荣”的痕迹还在。当时因为是政府主导，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个事是正当和正确的，就一家家去卖血，钱来得也很快。卫生厅张刘全喜说河南有血，这一年的产值就这么上去了。他把这个称为第三产业。

其实到了后面，河南发现问题了，他们九三年就发现有艾滋病流行了。前面提到了王淑平，她是周口市的一个化验员，她收集了血液进行化验后发现艾滋病病毒很多，她就害怕地写了个报告给主管领导。那个领导一开始还说这个(递交报告)事是好的，可以挽救很多人命，但最后这件事还是被压了下去。王应该算是第一个吹哨人，然后高耀洁将这件事向全世界进行透露，前面也提到了桂希恩是九九年才开始介入进来的，她是进文楼村免费给人看病。最后王淑平被打压，被开除公职，后来先生和她离婚了，她2001年的时候独自来到美国，后面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然后大概在前年去世的。

当时我还记得高耀洁跟我讲的时候就哭了，说她(王淑平)应该也来写一本书，记录一下中国的这段历史。但当时她可能有太多东西需要消化，可能也不是很愿意去回忆那些事儿。高耀洁

觉得很可惜，没有留下一本书告诉世人当时她经受的那些磨难。

吴 刚才世钰说的把我好多记忆都唤醒了。我还记得我们九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大学生都要组织献血的，我们学校里认认真真地做宣传把献血和爱国爱人民挂上钩，你不献血就是自私的人。当时的舆论宣传其中一个就是，血库永远没有血，有爱心和公共责任的人才会去献血，这是城市里的氛围。但是到了基层就变成了直接的创收指标，所以想想这几个医生在医疗系统里面会受到怎样的排挤，她们是多事者，是在整个医疗系统里断人财路的人。

九三年的时候，医药系统已经发现这个“献血”造成了病毒传播，但是全部压下来，假装看不见，最后是这几个在医疗一线的医生一路呼号，她们要突破制度内的控制去说出真相。比如提到疾控中心专门管传染病部分的吴尊友，高奶奶就说“这个大骗子！”，说当年就是去跟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官员大吵。

当时最无人问津的是这些卖了血后感染的人，所以这些医生从医疗前线看到的是受害者，但她们面临的阻力是要把这政府组织的整个行动喊停，难度可想而知。这个导致了病毒在乡村大规模泛滥了十年。

二、艾滋孤儿，看见和救助具体的人

吴 你们看河南这个血祸，其实有几部分是政府做的事情。首先献血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直接鼓励去组织的，刚开始肯定是一个医疗行为，但是一层一层的，没有管理，没有系统的人员培训，没有任何的全程跟踪。为什么（艾滋）案例会泛滥那么严重？你在美国会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有一个tracking（追踪），你去收抽一个血，先要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然后证明你这个血是怎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传染病，第一时间回溯可以知道来源是什么。

比如现在中国社会的这个COVID（新冠监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几分几秒在哪儿发现，你喘个气、在哪个空间，哪两个人有时空伴随、同时出现在一个点上，都能算出来，我可以把你这污染源马上固定住。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想做一件事情，它是绝对有办法做的，它可以做到极致。

那反过来，中原血祸正好是个相反的例子，政府闭上了所有应该睁开的眼睛，眼睁睁的这么多贫穷的农民为了挣那几十块钱家破人亡。而且河南在我们的公共记忆里就是一个苦难不断的地方。刚才你说了一点，就是高耀洁这辈子可能经过的最大的公共灾难是血祸，我不这

么认为，她经历过饥荒、逃难；然后（在文革期间），她是大富农大地主家的，她们高家的祖坟都被盗了。然后河南人还经历了啥呢？大饥荒，三年饥荒，甚至人吃人的情况，然后就是文革。人们永远在跟饥饿这件事情做斗争。所以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它（中原血祸）明明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最后好像就变成了最不重要的，因为吃饭更重要。



林世钰（左），吴薇（右） 图源：热风

然后第二个（社会逻辑）就是说政

绩更重要，社会往前发展更重要，然后就变成了针对卖血者的指

责。谁让你们穷？谁让你去卖血的？谁让你感染了脏病的？你感染了脏病，死了就死了。那些人真的像土，就像蝼蚁一样。我觉得这对高耀洁的刺激是这样的，她经常说我是大户人家的，得到的东西多。她让我最感动是，她真不是说“我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要达则兼济天下”，她就觉得这是必须的。她可怜那是一条命，她在受苦，我能救一个是救一个。

还有艾滋孤儿的事情，农民感染以后就完全没有医保，没法医疗，莫名其妙就死了，那么可能是夫妻都身亡，也有的是老公死了，老婆活不下去了才自杀。有个细节经常被提起，说妈妈都挂在梁上自杀死了两天了，两岁的孩子在地上饿得哇哇叫，抱着妈妈的脚后跟在啃。高老师她们一群人到基层调研，看到这个情景，当时难受得一天吃不下饭。

在大量的见到了这些生死鲜活的东西时，她知道我这件事要做，就算放弃一生的家庭也要做，我觉得这个这个强烈的drive（动力）特别棒，而且她一旦要开始做，就要纠错，她要大量的纠错——父母都死了以后，孩子怎么办？高耀洁医生还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孤儿怎么拯救，她发现很多人在救助的过程中，民政又把权力再寻租（编者注：腐败）一遍。很多的救助款、捐赠款没有交到最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她提出给孤儿找好心的健全的人家，点对点收养，不要再让这些孩子被民政系统接走。然后这孩子到哪儿去了，我们就知道了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艾滋孤儿也是她后来大量花费心血的一个事情，直到今天，直到她去世。

我昨天也是在看资料，她说民政部这个对孤儿的这个救助只是最基本的，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但她不是的，她发现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生活成长，一个是健康，包括精神健康，她希望这些人成为有出息的人。在高老师的心里，她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她的爱国我觉得也是基于爱人，她

觉得一个人，这个孩子像她小时候一定要读书，有出息的标准就是好好读书，出息做有用的人。她就觉得这些孩子她救过来了，你只是活着下来不行，我要看着你成才。她会愿意把艾滋孤儿变成有才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林 刚才吴薇说的我补充一个数字，奶奶她前后救助的孩子有164个。她把其中一些孩子安放在她的老家山东曹县高新庄。每次我去见她，她跟我聊的最多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艾滋孤儿，比如她们在国内过的怎么样。有时候那些孩子结婚生子了，就会给她看照片，然后她很开心，那是最开心的时候。她也很关心中国的发展，我以前回去听很多人说她，为什么她有了感动中国这么大的荣誉还要出走，就觉得她叛国、不爱国，是什么反华分子。我说，她比你在座哪个人都爱国。每次她都跟我聊起中国的各种事情，中国的反腐啊，还有中国老百姓过的多苦啊，包括疫情期间那种封控啊，上海发生那些事儿啊，她都关注，都跟我聊，聊的经常就是就是泪水横流。她真的就是，像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三、夹缝求存，仓皇逃离的82岁老人

林 她离开的时候真的是迫不得已的。2004年她获得感动中国这个荣誉的时候，当时的河南的宣传部部长不愿意她得奖，还三次进北京去阻挠，但最后奶奶还是获得了这个荣誉。她回来之后，地方上就有点意见，觉得这个是你的荣誉，但它破坏了我们整体的形象。当时的河南，一被提及就觉得是艾滋病大省，然后很多人不来投资了、很多孩子出去了，听你说是河南来的都有一点歧视在里头。后来奶奶到美国领了一个奖，叫“生命之音”，她来之前也是备受阻挠，他们不让他来，把她软禁在家。最后是希拉里给胡锦涛写了好几封信，最后他们还是放行了。

到了美国这边之后，她很受欢迎，去了很多地方也做了很多演讲。回去之后一开始官方想收买她，登门来问“你能不能帮我们写个书啊？”还说书名是《河南艾滋病今昔》，就一种对比，把坏事变成好事。高耀洁推辞说我年纪都这么大了，人家说：没事，你不用写，挂个名指导一下就行了，稿费全归你。老太太就说：我年轻的时候，哪是被你这么廉价的钱财容易收买的人啊！就拒绝了。她拒绝以后，外部的利诱就变成威逼了。

后来有一天，法国那边也给了她一个奖，让她去法国领奖。那时候她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之后他们对她的监控就升级了，就像奶奶说的，就房前屋后四个摄像头，连倒垃圾都不让她去。她的孩子们来看她也不让她下楼。那时候她老伴已经去世了，她独居在家里，生活也蛮不容易的。

最后她就觉得，不用说继续写作，她在媒体上都几乎被封杀了、销声匿迹了。老太太是一个对“自由”二字非常珍视的人，当她觉得在中国没有写作和言论的自由，就决定离开了。

吴

我从外媒视角再给点补充吧。在那个时期，希拉里写信是真的管用，那时有公共舆论和国际社会

的关注，这些回头看我们觉得还真挺美好的。当时的整个社

会还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先进、进步、开放、自由，自由还不是禁忌词。当时零三、零四年中央台感动人物节目的主持人还是问人话的，视角还是有温度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整个中国还是……要脸的，比如一个医生在为一个公共健康事件来呼吁和奔走，这个事情让地方政府只敢在私下吓唬你，采取的办法就是给你制造一些心理上的恐惧。比如高老师提到的窃听器。

但是她是从小从文革一路走过来的人，你要知道她经历了太多了，她对于这些基层的、控制人的、给你制造不安全感 and 恐惧感的这些手段，她是很熟悉的。所以这就是杜聪说的，高老师她很警觉，她有一种政治智慧。还有一个背景是，当时中国还有所谓地方和中央这一对概念，经常会说中央政府是好的，我们还是要办奥运会的嘛，对吧？中国还是要宣称“走向开放、民主自由、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所以那个时候，希拉里作为一个美国和国际的政要，她还是可以与中国政府的高层进行沟通的。

当时我在南华早报，高耀洁是我们经常会报的题，我们会关注她有什么进展，她就会投诉河南地方对她的迫害，包括骚扰她的工作和在媒体上封杀她。那个时候媒体还有“异地监督”，就是河南的新闻报不出来，我北京能报，北京的事儿报不出来，广州还有南方报系呢。媒体人之间是有协作和协同的。所以其实高耀洁做的事情及其功绩在媒体行业中间也都是被互相支持的。以及那个时候的网络还是灵通的，论坛和网民发帖都还比较活跃，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媒体层面也好，还是网民的公众知情层面也好，这个信息都是封不住的，她的民意还是挺高的。

当时她就觉得自己是河南的眼中钉，你看她几次走，都先到广州、上海、北京，然后再转出去。当时她在海外得了奖，北京政府也没有堵她。所以她是想先摆脱地方的控制。



高耀洁纪录片《穹苍那颗星》片段 图源：热风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到了美国接受了一堆外媒的采访,第一反应会是“我还能不能回国?”那个时候高耀洁就想着还要回去。但零七年回到中国后,她就彻底失去安全感了,觉得自己做不成事儿了。她就觉得自己手里还有那么多资料呢,既然本地媒体不让我说了,那是不是马上全面都要封杀我呢?那我第一时间要把事情都说出来,把信息都保留下来。所以她当时离开中国去美国,也是凭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她不太想自己未来会怎么样,而就是“我要把故事写出来”这个念头。她反复说过这个细节:她就是要带着这个硬盘,到了美国后,先把书写下来。

她出来了以后,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流亡者,她就是觉得自己在原处干不成事儿,那先去个自由的地方把书写了。尽管流亡这个词后来变成了一个现实。我们最近回头看,很感慨这个宏观环境恶化的过程,如果高耀洁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呢?明明当时还有那么多空间?她出来了,还写了那么多书,她真的是用出走延续了这十几年的记录和表达,也付出了永远回不了国的代价。但我仍然不认为她是一个“流亡者”。

四、落叶归根?高耀洁的挣扎,归念与超越

吴 所以她才问能回去吗?我们说能回去。我们这些人都是觉得中国会变好的。那她为什么不回去了,因为你也可以用双眼看到,国内的情况是急转直下的,越来越差。我16年到纽约又来读书,就看到她的状态有变化,她会说幸亏我在美国,美国人救了我好几次了,要不然我死好几回了,不然大动脉那个血栓我就会死了。她16年因为肺炎开始卧床,会指着那个呼吸机说,你们看这都是美国给我安的,要没有这个呼吸机我早就死了。到后来她就不再提这个事情了。

但是她每天打开电脑,收藏夹有BBC中文网,VOA、美国之音,什么新浪网、搜狐,然后她一直跟她国内的那些朋友保持邮件联系,经常让我们给她整理邮件。(有些邮件内容)会说高老师最近情况又不好了,上海又怎么着了。这几年肺炎她知道的清清楚楚,她对中国事情的了解速度可能快于我们现场的人,因为她每天睁开眼睛就坐在电脑前看国内的情况。

她有的时候会说她活腻了,不想活了。我刚才还在想这个事情,一个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生命力,活到九十六岁还在写书。然后她反复说我不想活了,真的是置自己为度外了,但她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她真是着急。她的写字板坏了,一个一个邮件给我写,写字板坏了,痛不欲生啊,什么也干不了了。所以去年的大年三十,我赶紧给她去送写字板,她大年三十也要拿写字板写东西,就这样时不我待地想把她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后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她唯一的生

存意义。国内的人忘了这些事情，或者国内的人不能自由说话了，她没有专门评价过。但她肯定两相比较，觉得那我能做什么的，就把我知道的继续说吧。

林 我就想起她想回国，然后护照过期了，问你能帮我去办新的吗？我说可以啊……我带着相机去，就给她拍完了，表也填了，在最后那一刻她又犹豫了……但她也跟我讲过，说这些年也有一些人来，有跟她说让她回去啊，说会照顾她。我一直搞不懂那些都是什么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但奶奶说回去有几个具体的困难，一个就是出书困难，她就把写书看成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国内这些书可能出不来。以前她在国内出了一些书，很多人后来就买不到了，有的好像书已经出来了，最后上头有令又把它回收变成纸浆。另一个是她觉得说生活上有困难，在美国对她照顾还是挺好的，她那个二十四小时的护工三班倒，还有医疗保险啊。所以她觉得说回国，退休金才五千多人民币，请个护工可能就要去掉三千多啊，觉得生活会没有这边好一点儿。

另一个她觉得说会没人照顾她……所以她最后觉得说，那我还是留在这边吧。

她说我最后走的时候骨灰要回去，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大家也知道她写的那个遗嘱就是骨灰要让儿子带回去，然后说要撒到黄河去。她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事，老是担心，我说奶奶没事儿，你儿子来不了，到时我帮你带回去也可以的。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她的骨灰会怎么处理，希望可以如她所愿吧。

吴 ……我觉得可能与叶落归根相比，更痛苦的是“物非人非”，就是你回去发现环境也不在了，你的人也不在，朋友也不在了，理解你的工作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人也不在了。这种苍凉，这种伤心，我觉得那真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她也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完全超越了中国人所谓的叶落归根、光宗耀祖，所有这些传统的东西。

最近纪念高老师，很多人还在这个层次上来聊，说什么一定要叶落归根，她终于回到她的爱的祖国，我就觉得他们不理解，不理解高老师。我觉得这个表达和纪念的方式不对，因为她早就用自己的选择，用自己做的事情，把生命价值极度地超越了。早就不再是一个河南人的地域身份认同，或者一个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来定义和归纳她的生命价值了。这个我挺想强调一下的。最近看很多媒体表述，我觉得，哎呀，你们太不懂高老师了。

五、星归苍穹，我们如何纪念高耀洁

观众 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高奶奶自己说的，“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我觉得这个是她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之一。

吴 是的，她对COVID这几年来，中国人发生的惨剧，比如死于疫病或看不了病、找不到药，或者封城带来的恶果，她都知道得非常具体，她是真的揪着心，把中国人受的难当成自己的事儿操心。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出一百种理由，关上新闻就不看了，自己活着都这么辛苦了……她走不了路，没有牙，吃面片子还得嚼一嚼。去年她生日我们去了，端着蛋糕，吹了蜡烛后我觉得我可能犯错了，她的胃特别不好，吃不了。但她自己主动要吃了一口，我说你抿一抿吧，就吃了一口。第二天来短信说拉肚子了。我就觉得她人生得到的甜其实很少，就是她的生日，想吃一口蛋糕，吃完明天拉肚子了。

林 我觉得我认识高奶奶这么多年，她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不要忽视个体的力量。你想她96年的时候已经69岁了，她已经退休了，也没有想到涉足这个事情之后救了那么多人，也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但她认定这个事儿是对的，是应该去做的，不说的话良心不安，那她就去做。她非常简单。之前采访的时候，她说：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个本来意义上的人，我看见别人的苦难，没法儿掉脸而去。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总会感到秋风秋雨，徒留瑟瑟，但是我们不要失望更不要绝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高奶奶那样发出自己的一点微光，我们能做什么，就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去做。比如我是写字的人，我可以去传播奶奶的这个故事，然后去影响一些人，对吧？没准你就能够帮助一些人。

我觉得我们不要低估个体的力量。我们去做就好了，不要总是坐在那说，我们就去行动，行动是有力量的。这包括你做的每件事情，带着你的善意，带着那种悲悯，带着那种爱，而不要去抱怨什么的，真的，这些情绪的东西没有意义。我们要去做事情，一点一点地做，先从爱你的身边的人开始，爱你的同胞开始，然后去爱陌生人。我们都可以做到的，真的。我觉得奶奶给我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我前几天把跟她的一张合影——是我最喜欢的我搂着她，她在我怀里笑得特别甜——挂在我的墙上。她去世头一个月我特别难过，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女儿上学去了，我每天晚上回忆，看奶奶生前我们一起的各种视频，我就老在那流泪，特别软弱。最近我突然变得有力量了，我每天看奶奶在微笑，我就想象她是天空那颗星，在看着我们每个人。

我刚刚看见有女孩子在哭，我是看别人哭了就自己要先哭一下的人。我觉得，因为做媒体，我的感受是没有天生的英雄，但是真的只要你自己在一件事情上觉得是对的，这个对不是亲人朋友、同事领导、外部社会告诉你的“正确”，而是你自己认定的，那么它就是你身上的原动力。而那些基于人际关系或者社会结构的“正确”，很可能都是阻止你做“对的事情”的阻力。我做人物专访很多年，我觉得我在找每个人身上做事情的原动力。

这些年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手机，也都会使用社交媒体，但你会发现特别孤独，原因是你觉得在很多是非、表达、精神层面上，没有能够与你共鸣的人，甚至你想做一点“对的事情”，你可能首先要克服的是身边这些压力。从哪里能找到一种坚持和目标感呢？

从高耀洁身上你会发现，她的动力全部来自她的价值，她自己专业的选择、做人的选择。做这个选择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她要写书，然后就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我想谈的是我们个人和公共价值的关系。我觉得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里，可能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原子的个人。我们现在置身纽约，都是异乡人，那我们怎么在不熟悉的异乡找到往前走的力量？我想真的要按古训，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也是可以做到的吧。我们在内心克服恐惧，在内心确定一些是非的标准，然后看到对的东西就多传播一些，看到不对的东西就掐断它在自己这里的传播，愤怒的时候就说出来，别人遇到了困难我们尽量去帮助。当发现整体的舆论环境很压抑的时候，如果你忍无可忍了，克服一点恐惧，说出来。当然落到各行各业的话，我觉得做医生就好好给人开刀，做律师就好好打官司，做法官不要枉法，如果在每个专业上的人都回到一种做人的良知、做专业的标准，那社会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了。

当我作为媒体人、作为讲述者，我真的感叹她怎么能这么有勇气。有时候我一瞬间会觉得自己像是老人了，中国这几十年间，就是不断地在希望、绝望、希望、绝望、希望、绝望。但是当你看到这些老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了解历史、去读书，我们看到一篇文章先把它分享出来，有想法的话就写下来，不敢实名就匿名写，但是不要欺骗自己的真实思想，不要忘记事实。

高耀洁一生都在说真话。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短视频传得很广，其中就有一句：“真话可以不说完，但一定不要说假话。”这其实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原则，你可以不再为所有的利益、亲情、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压力所困，不要拿这些东西做借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英雄，而且我相信这也是高耀洁希望看到的事情。她为什么那么希望我们端端正正地做人，她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个给她写书的人是不是端端正正的记者？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些百岁老人一生的过程之后，了解她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关键阶段做出的选择，这些才会给我们注入力量，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个人内心的动力的。

附录 / 观众问答

Q: 如何买到她的书?

吴 其实高老师的传播渠道特别旧。她不募款,也不收任何人的钱,她在中国的时候就是靠自己自费印宣传材料,当时给农民们普及防控知识什么的。后来她在美国的这些书,还是秉承这个印刷习惯,一次印几百本来送。她只送人不卖。但是这些书还是有出版社的嘛,而且之后纸价涨了,印得越少单价越贵,所以真正的好办法应该是将它电子化,国内的人也可以看到了。她后来同意了,就说,我授权你,你爱干啥干啥吧。后来我也问能不能把这些书放在网上卖,但是只要是涉及到钱,先不说谁出钱呢,卖了书的钱往哪里走呢?反正我没去问她家里人这些决定。我的想法是应该让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继续读到她的遗产。

林 她很多书出版之后,就不要出版社的那个稿酬,而是折成书拿到家里来送。有一

年有一个她朋友的侄儿,听说她出了一本《镜头下的真相》,把它拿走卖掉,还撕掉扉页上奶奶赠书的那个字样,卖了三千块。所以奶奶有时候对人还是有很多失望在里面。最近也有很多人问我怎么买书,我也在考虑,因为我帮她编辑出版过两本书。我有个朋友弄了一个网站,她说可以放在上面,到时看一下是什么渠道再告诉大家。另外我最近在编辑她的最后一本书,然后明年会出版,到时看一下能不能做成电子让它传播得更广泛一些,因为她书不容易买到。她在香港出,她在加拿大出。美国出的两本是《诗词札记二百首》,还有《高耀洁行医往事》,这两本在Amazon上面有,因为是我帮她出版的。

Q: 她如何看待外界给她的荣誉,是否最看重其中的哪一项?

林 她确实得到很多荣誉,包括联合国的、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特别多。她挺看重这些荣誉,她并不是说这些荣誉带给她声名,

是觉得说我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就得到了一种认可。然后而且也意味着说,那些艾滋病人的还有遗孤的故事,为更多的人知道。她经常会说起她当年去哪里领奖的那些趣事。她挺骄傲的。

吴 她最看重的是那颗星星。对,就那个38980¹吧,“看,看那颗星星喔,星星



喔！”她很开心地告诉我，这个画面总在我脑海里。她真的很骄傲的，这个骄傲不是说自己的声誉名望，就是我们刚才还说到她这个儒家思想嘛，安身为民而立命，就是最后你这个你关心的人，公众给到你的认可。还有一个她其实是很在意能够盘动什么资源，这是我的表述，不是她的语言。但她会觉得，因为她最重要的是这样子，她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也是我后来想到的、想清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情的话，她要动员一切的资源 and 力量，那么她觉得得到了奖的话，那她就有更大的传播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她的意义是这些东西得到了认可，证明她是对的。但她也不用别人证明她是对的，她认为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她最在意的是那一颗星星，因为她对着电脑里的照片，一张一张给我过，就是这个奖、那个奖，她都没说啥，就是鼠标乱滑。看，哎，就是那个星星的那个牌子，我认为她是最喜欢的。

林 对，而且关于这个星星，我记得她说将来她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颗星星会挂在天上，会看着当年那个血祸的，让造成血祸的那些人受到审判。她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

吴 我觉得星星这个意义特别特别棒。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想成为一颗星星，那多棒啊，是吧？就是你做的事情，让自己在历

史上、在宇宙里留下痕迹，多棒啊！我觉得特别好，我们都当星星吧！

Q：最后一次见她是怎样的？她在生命最后这几年如何看待她的事业以及离开后的未来？各位嘉宾是否想象过她的离开？

林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2023年末，我和先生一起去，那天奶奶精神状态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一个月后会离开，然后就跟我们说这说那，我们聊得很开心。我那时候还在盘算着，因为12月19日是她的生日嘛，我想到时候再给她庆祝一次比较大的生日。她有份稿子是去年春天给我的，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本书，在我听来就有点“狼来了”，因为我从2015年认识她到现在，她经常会说：哎呀，我活不了多久了，这是我最后一本书。我都帮她编了两三本“最后一本书”了。所以当时我看她状态很好，根本没有想过她会离开，我觉得她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老人，而且很坚韧。

如果我知道那天是跟她最后一次见面，我会跟她用力拥抱的。

她毕竟九十五六岁了，我也有一闪念觉得有一天她会离开我。她就像一颗夜明珠一样，这个城市因为她才会闪光，不然我觉得这里真的变成一座空城。我觉得跟她还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做，我有很多想法。所以我一直没有心理准备……直到她走的那一天。

¹ 于2000年10月发现的小行星38980号，被命名为“高耀洁”。

我之前开玩笑说，每年要给她找一个活下去的“拐杖”，那个拐杖就是她对那年的一个盼望。所以我每次帮她出一本书，就说：奶奶你再写一本，我再帮你出。其实大家知道，人在那个年龄里写下的文字是很乱的，我来编辑对我也是很大的负担，我眼睛也很不好，但我总是想让她活下去、活下去。所以那本书也是我提议她去弄，弄完了给我之后，我就故意慢慢给她拖着；她问我书编得怎么样了，我说快了还有几章，然后就一直给她这么拖着拖着。到了十二月初，她问我：你的书什么时候能出版，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它。我心里一想，哎哟，拖不下去了，于是迅速发给她。但是没有收到她的回信，我觉得这不太像她。12月9号的时候有一个节目联系我想跟奶奶一起做，我就又给她发邮件；刚好有一个朋友也想来看望她，我去信了，说“敬拜”。但是这些都没有回复。

很奇怪的，那天我状态很不好，头特别疼，外边雨也下得大。我看到黎安友教授给我发来的邮件，说高奶奶已经passed away(逝世)了。

霎时我觉得地动山摇，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给黎教授打了个电话，他正在奶奶的公寓里，说她刚刚走了。我又跟护工聊了下，她走得很安详，护工进门放下手里买的菜，进来就看见奶奶坐在马桶上滑了下去，就那么走了。我想到她这些年身体很不舒服，走了对她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但对还活着的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念她的。

吴

她去年其实得了一次很严重的肺炎，

急诊进医院，那是第一次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随时失去她。黎安友教授和给她看病的医生都说没啥问题，但那天她拉着我的手在床边说：我得癌症了，我是医生，别听TA们的，我活不了多久了。高老师是这样的，她经常会说“快死了”，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是以此要挟我们多去看看她。她去年也给了我一本书稿帮忙出版，就说：这是我最后一本了，出完这本我就可以死了。那我跟世钰想的一样，就有点拖，她中间几次就在催我快点，她没时间了。

她怎么看待这些成果？说真的，事业、成果、进度这些都不是她关心的，她的嘴里从来没说过这些词儿。她就是说要写书，她认为不够。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永远要讲话”，不是一个project(项目)进度这样的概念，她是“speaking up is part of your life”(发声是生命的一部分)。她躺在病床上也说：我死了没关系，那些中国人太苦了，TA们的事儿谁说呀？

我当时在心里就想：那我们说吧。

Q：她身上是否存在与中国传统的冲突，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林

有一次我给她写一篇文章，就是题目就是“我的一生都在逃难”，她就是十一岁的时候，那时候叫跑反嘛，就是逃日本兵最后逃到开封去。然后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她在开封女子师范学院上学，发生了国共内战，然后她就逃到了江南，逃到了浙江嘉兴。然后八十二岁从中国逃到美国，就是越来越远，越

来越远。就她的一生真的就是颠沛流离。所以她的女儿就说，为什么她妈妈不太容易信任别人，她一直没有安全感。

高奶奶她四岁就就上私塾，四书五经特别熟，刚才你们也看到。但是她有儒家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仁，对吧？这个字在她身上我觉得体现得非常充分。但是同时她是个很立体的人。她身上有一些我觉得很现代的思想，就是她的那种自由的意志，还有那种独立的精神。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她小的时候是缠过小脚的。姐妹也有好几个，她妈给每个人都缠小脚，其他人都乖乖的，就是夜里睡不着，她们只能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去睡觉，你们想想，非常疼。而奶奶呢，她每天晚上，她妈一裹， she就把那个线头剪掉。她从小就有那个反抗的独立的精神在里头。天生的啊，然后她剪掉，她妈妈第二天发现了，就把她暴打一顿。然后她又把她缠起来又剪掉，她就整天老被打。她最后缠到十岁、十一岁啊，最后脚就变形，变残疾了嘛。

还有一个就是她十几岁，她想上学，她们家比较重男轻女，她弟弟上学，但是女孩子一般就……她妈觉得说你能够识字两个字就OK了，不用上学。但是她特别想读书，要求了好几次以后家里还是不同意，你知道她干什么吗？她就用粉笔在门上写下一首绝命诗。最后一句是：命归黄泉魂自由，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拿了个绳子就要上吊。最后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大的动静，家里人才发现把她给救下来。

她从来就是有封建的一面，也有一点点重男轻女。但是她有一些像现代女性的那种独立意识。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包括她后来，自己八十二岁还离家出走。这个东西是贯穿她生命的整个过程。

吴 其实你问的这俩问题我都想过。我们说儒家，说女权主义者，拉回到现实和现在的生活，包括这个自由是什么，它可能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意义、行动和需求。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完美的。她真的是，一个是我觉得她身上挺多腐朽思想的，就是比如说女性的这个方面……但你说她对强权的这种不服从，是不是平权？那一定是啊，你说它是普世价值还是传统的儒家价值？我觉得都有。然后她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她也不用平天下，她也不用治国，但是她在自己所谓小家和大家里，早就超越了什么贤妻良母的价值。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我跟我身边的人都讨论过的，她的这几个孩子对她有不满意的情绪，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从现代思想来看的话，父母对孩子的关系，其实不是我是你的、你是我的。孩子投身到我们身边，我们给TA吃好穿暖，TA是一个完整的人格，要成长的。那么等孩子成年了，家长不应该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高老师她觉得这不是小家和大家的关系，她肯定脑子里想的是（孩子）你们都有饭吃了，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了，那这件事情（继续我的事业）是我要做的。我觉得她这个思想就特别女权。可是她在

回归人性的时候呢，她是不是慈母呢？爱不爱自己的孩子？当然爱。所以这就是这个价值和文化的体现。

她还特别不喜欢“不正当的情感关系”，她会批评，她会评价到很具体的那个谁的老公好，那个谁的老公不好，谁谁离婚了，谁谁不好，她离婚了！然后她马上第二个反应就是，离了婚以后她可怎么办呢？我现在会觉得，离婚太好了，祝贺你了，你自由了，你可以找第二个人了。她的反应就是哎呀，离婚了，她好惨呀，她怎么办呢？

我觉得挺棒的一点是她特别强调“我是读了书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从我们女权的角度上讲，知识改变我们，知识给我们力量。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她特别爱孩子。但是她给我嘴上八卦别人的时候呢，有点价值观混乱，她一方面会说谁是好母亲，她最近操心谁谁谁的孩子呢。转身她就说，她离婚了！那意思就是：因为她离婚了，所以她很辛苦。但又会说她很棒，很有出息，因为她读书，能干。所以她真的是慈爱的、独立的、操别人很多心的、很立体的一个人。

吴 她还有一个传统价值的延续就是很节俭，节俭到抠门了，你看她永远是那件我们都很熟悉的棕黄色马甲。但她会用她的方式表达对你的爱。我去的头几次，我的摄影师跟着我，她都不吭气，她后来就专门问，她就让她家的保姆说：“我专门买了水，你给她一瓶，你也喝。”我说我带了水，她就拿两块钱一瓶的水，

很认真地拿给我们摄影师，然后说几句话就嘱咐她喝水。走的时候我就专门让说，你把这半瓶水一定带上，这是老太太从嘴里省下来的钱。而且这一瓶水，对我们的意义和对她的意义不一样的。

我们还说无功不受禄，她绝不随便接受别人的这个给予，真的。她那么穷，她多少次你肯定也经历过，从她那个小破马甲儿掏掏——这肯定是在她信任的人面前哈——掏出来她的医保卡、银行卡、食物卡，还有二十多块钱，然后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就高兴，就是我觉得她就把她一堆小零镞儿很认真地给我说，我用不了了，你拿走吧。你想她那么一点点钱，攒出来的钢镞儿，她竭尽她的全力去给别人，她觉得你帮助了我。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有点抽离我们现实生活，但这些东西你说她是传统吗？我觉得是传统，是文化吗？是精神吗？回到刚才说到黎安友老师的这个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个词好辛苦哦——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吧——就是Chinese by blood（血统意义上的中国人），Chinese by culture（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们中国这个苦难的国度，我们这些人，我们要爱自己的这些东西。这些精神的力量，是人内心的力量，这些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獨立稿件

**Indie
Contribution**

我们在墙的这头

作者 / 莽莽编辑部
插画 / 三角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群西柏林留学生曾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其留下的手稿一度散佚。而当它们偶然被挖掘出来，行动者们的身影在碎片化的叙述中短暂地闪现，真实的恐惧从三段回忆录日记中漫开，三位来自黑暗时代的人蘸着恐惧化成的墨，书写那段不能被尘封的历史……

克里斯特日记：

24.05.1969

“安全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克莉丝临走前留下的忠告。得知维克特失踪后，六神无主的我们找到了克莉丝寻求帮助，她经验老道，曾经在东德政府的监控下出版地下刊物。克莉丝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和经验，包括如何避开史塔西的日常监控，使用假地址收发信件，尽量避免使用电报和邮政系统——这些都在政权的监视之下……回到家后，我看着我家里新买的意大利产奥利维蒂打字机，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它是否有一个黑匣子，记录了我所有敲过的字？那底部的铭牌和有些缺陷的F键，会不会成为之后定我罪的证据？我为什么这么懒惰，能用纸笔的一切工作却

要使用打字机？！尽管我曾是那么喜欢它的触感，排了许久的队才抢到的。

我把它从桌上抬下，装到了箱子里放入衣柜。我从未有如此痛恨过现代工业产品，痛恨这个一切行动都会留下痕迹的时代。

26.05.1969

今天结束课业，来自波恩的阿历克斯邀请我去看脱衣舞表演，说看我总是闷闷不乐，想带我去一起去开心一下。阿历克斯是柏林自由大学联盟的成员，他和其他的联邦德国学生一样，参与了发轫自前年的学生运动，呼吁大学和社会的改变。说实话，我很钦佩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他的公共演讲引人注目，思路清晰。但当他邀请我加入联盟时我还是婉拒了。表面上我说课业繁重，实际上是我看到他们的社会主义标语和红旗，心中总是酝酿着复杂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和我家乡的那些人不一样，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柏林墙那边的世界在同样的口号下变成了什么样吗？那里没有脱衣舞表演，也没有齐柏林飞艇乐团，有的只是压抑、压抑和压抑。在那面红旗下，我的朋友被捕，他们指控我是法西斯，把我们定性为国家公敌。我也不知道何时会接到来自他们的电话，每一秒都在捉摸不定的恐惧和烦躁中度过。

我以生病为由谢绝了阿历克斯的邀请，穿过放课后兴奋的学生们……我感觉我被从这个时空抽离了，我和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同一座城市生活，但我永远无法像他们一样快乐而激情，忘返于层出不穷的音乐会和舞池，热烈地参与本地的社会议题。我的身体在墙的这边，但我的心却从来没有飞出来过。

08.06.1969

“这个需要烧吗？”汉佩尔拿着一叠文件问我。我接过来一看，发现是我们每一期的发行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大家的笔迹，我甚至还记得写下我那笔时的兴奋和激动。我咬了咬嘴唇：“烧吧”。艳红色的火苗就像那可憎的红旗，其中飘散着黑色的灰烬——那都是我们曾经的激情和梦想，是我们想要记录时代的宣言。

“来往信件，已清理；销售文件，已清理；住所地址；已注销……”汉佩尔一个个念着完成的事项，我的思绪却已经完全不在这里了。这操蛋的世界，居然容不下这本小小的册子。

那晚我们吃了盐烤土豆和咖喱香肠，汉佩尔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尽管我们两都在恐惧中挣扎，这顿美食还是使我宽慰了许多。

汉斯日记：

24.05.1969

过几天即要回去，我感到很紧张。丽莎和我合写的稿子已经都留在了雅丝明家中。刚刚重新检查了我的行李箱，只留衣服。纸笔会被检查站拦下。

我此刻仿佛是一只即将浮出水面的鱼，将要被捞起、开腮、剖肚。我的每一片鳞也将被翻起。噩梦中边检官把手电筒插入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也许他们想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妈妈，我希望我是一只水母，无耳鼻舌身，全聋盲哑，这样他们即使抓住我，也无法拷问我。

妈妈，我不能怀抱有一丝秘密来看您。我该在今晚的噩梦中忘掉它们。忘掉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忘掉我在维多利亚公园，和丽莎还有雅丝明一起聊过的天...还有那本杂志，如今它已经问世。

这么多年，我们好像一直被关在海底，混混沌沌。这次我游向水面，原来那里布满阳光。我们曾被教导只有待在海底才是安全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光是会带来毁灭的谎言。

妈妈，我看到光了。阳光下，海面是青绿色的——过去我从未怀疑过——而海底的水是黑色的。

我就要见到您了。让我们安心地吃一顿晚饭吧。我一定要再见到您，无论如何，即使被捕，我也要回来。

09.06.1969

犹记两周前坐上地铁前往腓特烈大街车站，在车站口我与丽莎和雅丝明道别。我紧紧抱了他们。

坐在地铁上的时候我幻想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自由的半小时。我呆滞地看向对面车窗中的倒影，丽莎低着头，脸上充满阴郁，我想她一定是在担心维克特——他自从一个月前回东柏林后就失踪了。我转过头，盯紧周围走过的人，一群大学生拎着酒瓶匡匡当当走过，列车在轨道中摇摇晃晃，轮子与铁轨摩擦发出尖叫，我用力地记住眼前的这一切。

我总是低头望向手表，一分一秒好漫长，仿佛是上天将时间拉长，叫我享用这最后的自由时光。我不敢闭上眼睛，我不知道如果被捕，要捱到何时才能再见到大家……不，不会的。

车厢那头也有位坐着一言不发的青年人，看起来也是神色忧郁，他会是曾经集会上的一员吗？他现在是不是也在倒计时？倒计时我们最后的自由。和我对视吧，让我也注视你的眼

睛，或许我能看穿你的心思与忧虑，或许你也想再看看其他人。蓝色的眼睛，留着棕色的胡须，金色的卷毛刘海，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吗，也许等我再回到西柏林，我会看到寻人启事，如果我能再回来，我可以帮你做声援。如果我们都被捕了，我会尝试在监狱里找你。

总之，请你也看看我吧，记住我的某一点，记住这个车厢，我在这里就快变成木头了！身体愈来愈僵硬，车子每进一步，我的身体就越发抗拒起来，它好像要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长出一个壳来。

车最终到站了，我最后回头望一眼黄色的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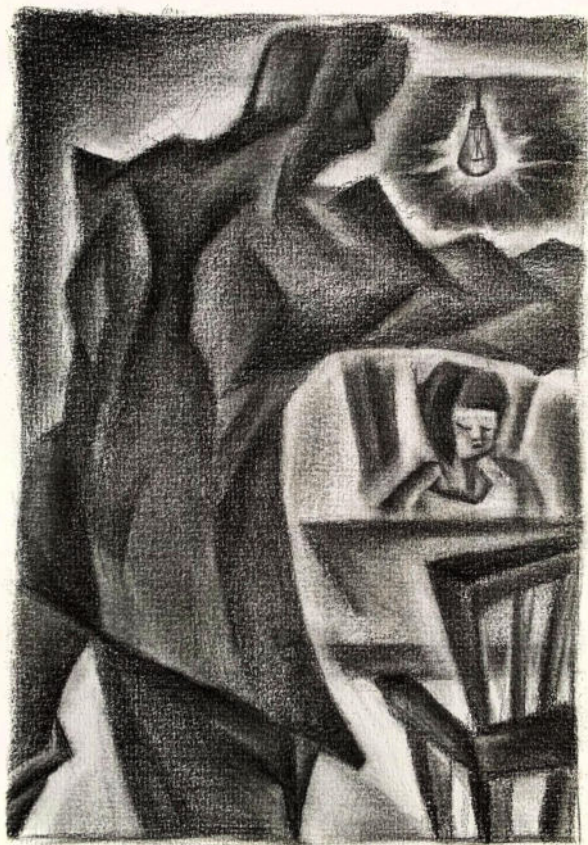
进入检查站，检查站里挂着巨大而神圣的民主德国国旗，着军绿色制服的边检官不屑地抬头望着队伍。三条队伍，我远远地看着，有位检查官似审讯犯人般盘问每个人从何而来，事何职业。我心里默念千万不好排到这一队。很倒霉，我最后被指定在了这一队。前面还有五个人。

这会是我失去自由前最后的十分钟吗？这下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我必须见到家人。赶在我被迫流亡前，我必须见到他们，哪怕是最后一面。

边检站外好多警察不停巡逻，他们是为了捕我而来的吗？身体越来越僵硬下去，视线也不知落在何处好，他们会看出我眼里的慌张和不安吗？

12.06.1969

今天见了几位许久未见的朋友，一同去了米格



“自从知道有人在那边被捕，我便开始一遍遍预习我被捕获的场景。”

尔湖。他们还并不知道我参与了什么事情。明明很久未见，但我们只是坐在湖边，说不出话来。坐在左手边的安辞掉了之前的工作，换到小城，想逃避现实的压抑。

湖水如此平静。我们都沉默着。

远处公园里人们在跳着舞，我却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此轻盈的生活我似乎很长时间都未再体会过了。森林似在燃烧倒塌，我如何在它之下轻歌曼舞。

走在东柏林的街道上，我也常能体会到这里的陌生。明明生于此，但如今这好像再也不是我的地头。街道变得更干净整洁，过去卖小食的流动摊点难见踪影。人们还是喜欢骑自行

车，街上熙熙攘攘，一切似乎照旧流淌。

我的心无法与这里更加贴近
仿佛有面玻璃墙
西边来的风被挡在外面
而这里如被煮开后的闷
电车照常每十分钟一趟
窗户被一致的沉默涂满

19.06.1969

过去一阵晚上总做噩梦，梦见我被捕，他们要求我讲出所有，所有我参与过的事情，认识的人……其他的细节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最令我想哭的是他们逼我讲出这些最深的秘密。

莉兹日记：

21.05.1969

今天有收到同伴的来信吗？上一次得知音讯已是半个月前，这之后，我每日只在房间里踱步。而今晚，我心不在焉做着手边的工作，准备明天去上学。我知，我仍要继续学下去，志业是不能断的。可是我此时在写些什么？我的头脑想到了哪里？我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前去课堂么？

22.05.1969

很冷，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春寒，也从未历经这般遥远又近在咫尺的恐惧。自从知道有人在那边被捕，我便开始一遍遍预习我被捕获的场景。会是无窗的四面墙壁吗？会有将眼睛刺激得流泪不止的白炽灯吗，像姐姐说的一样？我是如此弱小不堪一击，如果我坐在那张椅子上的时候正在月经来潮怎么办？他们会嘲笑我的流血吗？我有资格坐在那里由他们嘲

笑吗？

是的，我的小腹隐隐作痛。但这种痛不比我不能说话的痛。我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一切，在我家庭周围，没有哪个孩子是读书到这个程度的。但来到西柏林读书不过一年出头，我已经见过这场风暴将我昨日的世界撕成碎片：仍然存在战争，工人扔下他们的工具走上街头，振声要求待遇。学生也是，我坐在寥寥数人的教室里感到错愕：他们都去做什么了？然后我上了街，我是在那里才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我曾经不仅不能说话，甚至不能为这种“不能说话”而反抗。

我也并不是完全不知这些后果，但……

去年收到过来自巴黎的一封信，佐伊在里面笔迹飞扬地写道：她开心极了，她很高兴这么多问题都浮上水面，年轻的大家走出房门，在街上逗留一整夜来聊——权利和自由。是的，我也回给她，讲述我在过去几个月里做的事情，我开始做一本杂志。

其实这事小得很。我曾经想学姐姐，她会画画，能用低劣的铅笔和废纸张做出在全校流传火爆的小册。当然是偷偷传的，我们经常在厕所交换。我本也只想这么做，但是后来遇到汉斯他们，说可以联系到独立的印刷厂，可以生产批量的作品，我们的工作才变得严肃正经起来。

我当时并不怕什么！如果佐伊知道我现在的样子肯定会笑掉大牙了吧。

姐姐，你现在还画吗？你在哪里？

28.05.1969

花了好几天时间，跟着要回家的汉斯学了一通怎么销毁自己在这边的行动痕迹。尽管我已经努力延迟回去的时间。

过去的文稿是一点都不能被发现的。我手写稿子，墨水深深润过纸张，我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成为累赘。焚书怎么会这么困难，历史上的暴君是怎么烧得干净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抹杀的是别人？如果要自焚，是很难铲除的，你很难把自己的生活清理干净。就像线头，你抽出来便直到这件衣衫完全毁掉才会停手，不然是不可能理顺的。现在留恋不是关键，你要做的是最好快些忘掉。“你要换个名字”，有人跟我这么说，我甚至不敢在这里重述朋友们的名字。“以及暂时不要联系TA们，因为信件会被截断。”

于是和许多人失联了。我把手写着朋友们地址的页面撕掉，再撕碎，更小的颗粒，确保不会拼出信息，然后我撒了一些在地砖缝里，其他的在公共洗手间里冲了下去。

忘掉的话就不会说漏嘴，这简直是最让人安心的办法。我此时还在写的日记像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这样自发的、直觉性的写作也不能留么？我翻看稿子，生出这唯一的念头。再往下想深一层，我的身份也不能留么？我是谁？我向人家作自我介绍时已不知该挑哪一个名字。

我们的确不过在做直抒胸臆的事情，但怎么会，连灵魂也不敢再相信这副身体？

01.06.1969

今天醒来又并不觉得自己弱小。最近频频想到滞留东边的家人，因为难保哪封信会被拆开来，我们在信件里基本只汇报健康和生计状况。只要不生大病，只要手头还有一点儿钱，似乎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上次妈妈告诉我妹妹也想来读书，我想，如果我能多待几年，可以帮到她。

但是，我知道汉佩尔不能再联系家人，东面的人在找他。家人那头，或许也在软硬兼施逼他回去。必须硬起心肠与亲密的人相隔离，大家就是这么长大的吗？

但是妈妈，如果他们真的问起来，你会相信我没有做错吗。如果我们再也不能联系，你们会不会感到辛苦悲伤，还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29.06.1969

从报纸上得知再次发生了骇人的事情。

无论做什么，受伤是在所难免的……恐惧在我脑后生出牙齿。恐惧每一次啃咬我的时候，我就想姐姐的脸，想小时候的她住在隔壁却常跑来牵我的手，将我从长女的责任里解放出去一个下午，在沙地上画画，叫我不可以停止对自由世界的想象。我也会想起佐伊，我志同道合的、风风火火的亲友，她几乎不对自己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父亲甩巴掌之后我面前痛哭。还有那些去羁押所里走过一遭的朋友们对我说的，那里有多少人想用威逼利诱使你承认自己是错的，要“矫正”，要“保证不再犯”。

但，其实更多时候，我会想起那些“回归正常生活”的朋友，那些“改掉了自己”的人。也许这样说并不恰当，毕竟每个人并不只有一黑一白的两种选择；但有些人就是失联了，像雨落回大海，你们曾为一体，但今后对彼此可能再也认不出来。有人选择了一种与政治风险错身而过的生活——这不意味着对公共事务冷漠不关心、懦弱或没有责任感，他们只是去肩挑另一种压力了。他们只是不再与我站在一起。

我此刻又站在哪里？我选了哪一条路？
又感到眩晕，我知道我仍会继续。

你知道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与未来的同伴重逢。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不做，就没有人能找到你。■

“我此刻仿佛是一只即将浮出水面的鱼，将要被捞起、开膛、剖肚。我的每一片鳞也将被翻起。噩梦中边检官把手电筒插入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也许他们想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乡愁

作者 / 佚名



图: louisgalvez
@ Unsplash

我的乡愁，
送往了无情的土地，
我的乡愁，
变成了扎往心窝的白剑，

白剑，太阳的白剑，
化作一股热辣的泪，
辣根一样拙劣的痛，
蒙蔽了我同胞的眼睛，

我的乡愁，化作了一束黄花，
黄花是祭奠的缄默，
黄花是悼亡的前作，
热烈的悼亡啊，等着危楼倾覆，

但我，但你，
我们站在危楼前，
注定被瓦砾埋没，
高举的手不会化作纪念碑，
高举的手是那些耻辱的华表，

我的乡愁啊，
我故土的人啊，
白剑刺瞎了他们的眼，
捣碎了耳朵，熏哑了嗓子。

他们再看不见，再听不到，
又聋又瞎，更无言去喊，

那些跛行的疯人，
那些无法睡在桥洞里的流浪者，
嘶喊也化作歇斯底里，
哭叫也恍若孩童的撒泼，

我的同胞啊，
他们冷眼看着我，
我眼里蒙上的是泪翳，
因为我是哭着的，
他们眼里蒙上的是白翳，
因为他们是瞎着的，

我的乡愁，
最后成了无情的土地上一行可笑的诗，
因为政治课本里字里行间写满的是猪食，
因为宣誓的红旗里血肉堆满的尽是人粪，

我的乡愁，
最后成了割断我喉舌最后的利刃，
因为小儿不敢夜啼，
女儿要懂得紧捂父亲的嘴，

我的乡愁，最后成了穿透我后脑的铅弹，
化作了刑场上，爆裂啫喱和赭石的污血。■

世界我该如何触碰你

作者 / 迷走

|组诗|

现代人

用

画笔自慰

诗歌自慰

键盘自慰

麦克风自慰

情趣用品自慰

他们高谈自我

高谈社会

高谈美国

高谈艺术

高谈性

高谈赚钱

高谈一切

(一切并不包括敏感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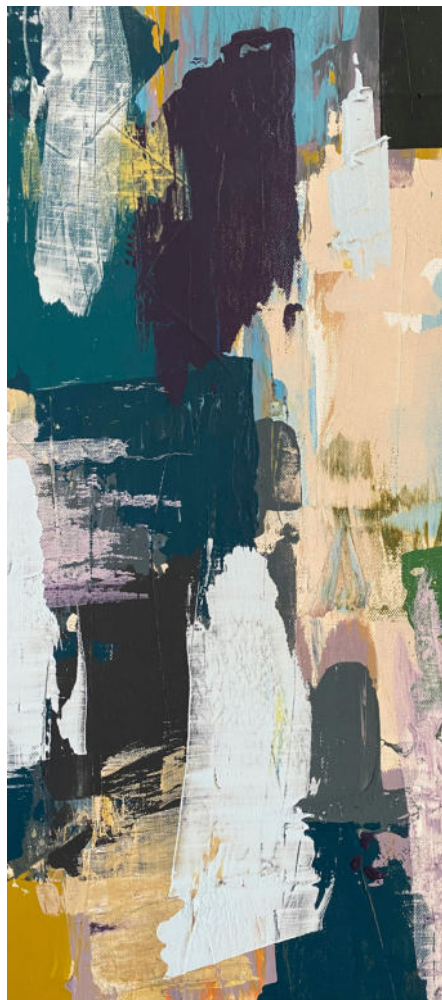


图: Vojtech Bruzek@ Unsplash

一个有阳光的下午



一个有阳光的下午
一位陌生人与我攀谈偏见、职业，与白人
他说
别看他荧光橙的工人服
装载黝黑的身躯发皱的皮肤
他展示的工作证上写着铁路公司
——我是工程师
——我的时薪可有100美金
——你知道什么是supervisor吗
他看我亚洲人的面孔
向我反复确定我能听懂
他说他粗陋的英文
白人不听使唤
他说他衣着简陋
女人不扫一眼
—— I don't care, 我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羞于分享我的职场秘密
但我听懂了那些关于偏见、职业，与白人
最后他瞥了一眼我裸露的肩膀
问我
——你是学生吗？
——你电话多少？

夜半

夜半辗转惊闻隆隆巨响

是绝望的人生出相同的心碎

还是心碎的人坠地骨头生出当代的叹息？

是高考最后掷笔，青春

迎来等候多时的击鼓投降

是谩骂与攻击在凌晨四点呼呼入睡琴瑟和鸣

是徒步的归子汇聚成河流而

无数离家的脚踝与往日道别，血，肉，与泪水模糊

与割断的脚筋躺在

昨日的大地

是猫与爱人发出同频的鼾声相约梦中游戏

是清醒的人吐出烟圈而烟圈不甘消散宁愿蓦然炸裂

是反抗的一代悄然死去，吐出残渣拌以道德与责任为你服下

是国家站起法律倒下，心理学加以安慰哲学冷眼旁观

是铁链拍裂大地拷问人心是真？

是假亦害怕照镜子嘀咕差点以为我是真

是结构巨裂自上而下等待明日坍塌

是残垣断壁下获得秋后算账之相机，谁说话拍谁

是疼痛不禁摩挲我的后背，安慰

诗人总归流泪 ■



最佳损友

作者 / K

在我众多品质里，我目前最希望被认可的是幽默。但是朋友中一直赞美我幽默的人只有一个。然而，在白纸运动前夕，她给我留了最后一句话：“再这样连朋友都懒得做”。此后，我们没有拉黑对方，但也再没联系过。

多年前，她是我同事，且是我合作最愉快的同事。我们当时在一所小公司，她比我早入职。我们职位相同，但是她对我没有任何防备。我经常理解不了老板的意图，有时候理解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她会主动指点我，我也会请教她。我们中午还经常一起吃饭，下班后还试过一起去游泳。

我们几个入职后，都没有签合同。而且老板很爱开会，但是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要什么。有一次周五晚上，我去找朋友玩，老板在群里说了一大堆话。我找朋友分析了一下他的话，朋友让我去群里表表忠心。我很讨厌这样的操作，也很讨厌公司不签合同还随意延长试用期的操作。我们当时几个聊过，知道不签合同是违反劳动法的，但是没人注意保留证据，而且大家也不想去申请劳动仲裁，都是怕麻烦。最后，我和另一个前后脚一起入职的同事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离开了，她留了下来。

大概过了半年，她找到我，骂公司对她没有一点点道义，压榨她，逼着她离职。她将她和经理的谈话录了音，但是她也沒去申请劳动仲裁。我对她说：你终于意识到你在被PUA了，当时我和男同事离职后讨论过你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你很相信老板，所以什么都没说。

此后，她再也没去任何公司工作过。她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我问了一下原因，她说是任何公司都是压榨员工。但是我不能理解她的点，因为我觉得既不做老板又不打工，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会饿死的。她不太说她的经济来源，只说有时候靠花呗过活。

我一直觉得她是我朋友里学习能力前三的人，能写文章，能写代码，懂计算机，后来开始画画。我们后来断断续续聊着，讨论画画，讨论服装及其他。她一直说和我聊天很愉快，除了有时候我经常问一些网上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她教我：任何东

西都有它的框架，你看懂框架之后，其他东西都大差不差。我们还会讨论女权，她说她大学有基础课是关于女权的。我当时觉得她是我朋友里最支持女权也是最懂女权的那个。

我去年秋天出国，还没找到固定居所，换了几个短租。我几乎每天和她聊天，说说我的见闻，吐槽一些人。她一直说我的文字很搞笑，还分享给她姐，她姐的回复是：如果她去小红书分享这些，一定能火。而她也认同这种说法，让我记录下来，多去各平台分享。当时刚到埠，我在本地没有任何朋友，所以她给了我很大精神支撑。我在学代码上感到迷茫，她还分享了一个她之前购买的课程的账号密码给我，并且说了一些她的看法。

她也会和我吐槽国内的核酸政策不合理，我当时就顺便骂骂共产党。但是因为在微信聊天，我也不好说太多。但是后面我发现，她虽然支持和羡慕我出国，但是她并不理解我为什么出来。

没多久，她所在的城市有些进行封控的地方遭到一些居民抵抗，且多是外省人口。她很生气，觉得这些人不听话，不配合政府。我忽然发现，政见是我们之间的敏感话题，为了保护我们的友谊，我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但是我又忍不住想引导她看清问题，于是说：“或许他们成功了，你就不用再经常做核酸了呀。”

结果她很激动，和我说了一堆，还用“香港蟑螂”作为例子说明这些抵抗会带来的后果。我没说话。不久后，她又说，现在YouTube上面很多视频，让我睁大眼睛看清楚，再这样下去，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那时候，已经是国内的深夜了，而在此之前，她说了几次要去睡觉。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有点震惊。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这句话，而且我没想到说的人是她。我当时也觉得有点搞笑，YouTube上的视频是国内的人翻墙发出来的，而她也是翻墙出来看的。她就没想过，为什么国内看不到这些视频，而需要他们冒着危险翻墙发布/观看。我想了想，她今晚忽然这么激动，在我避重就轻这么多次后，她依然抓着我，还说出了这句话，那这个朋友做不做都无所谓了吧。没过几天，白纸运动就爆发了，随后全国迎了解封。我有点好奇她怎么想，但是没问。不久之后，我上街参加了一次白纸活动。我当时很激动，觉得我终于可以自由参加反政府的游行了，这就是我辛苦逃出来的成果之一；我要向全世界控诉中国的恶行，要让更多中国人认清他们的政府。我同时也在好奇，如果那个朋友知道我准备上街，她会怎么想。但是真正上街的时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我参加这个活动还得戴着口罩，还得警惕被人套话，其实，也没那么自由。更多的，其实是给自己一个体验、一种安慰：站在高墙下，我也终于可以远远扔一枚臭鸡蛋了。

俗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但我朋友似乎不这么想。她是察觉到一些裂痕的，但是她觉得只要墙下的人谨小慎微，乖顺听话，墙就不会倒。她不会觉得是这堵墙阻碍了她人生很多可能，让她不敢再去打工。相反，她觉得这堵墙保护了她，给了她安稳的生活。她对这堵墙的拥护，可以连我这个“聊得很开心”的多年老友都可以轻易舍弃。

黄伟文的词写得挺好：

“但是命运入面 / 每个邂逅 / 一起走到了 / 某个路口 / 是敌与是友 /
各自也没有自由 / 位置变了 各有队友” ■

图源: Muhammed Aslam Aslam
@Unsplash

大地上的胜利日

|小说|

作者 / LLLX

这是在梦里吗？

战争的发生和天气的转冷是同时开始的，炮弹像雪一样肆虐这座没有温度的城市。

在每天不准时的战时新闻联播里，新闻主播每次出场都在抽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每次都一样，抽到第六根的时候就看一眼摄影机，接着开始播报今天又是哪里被轰炸了，哪里被占领了。

我觉得电视都在说谎，真想走进电视机，撕烂他的嘴，这已经是开战的不知道多少天了。我们有那么大的国土用来被占领吗？正在吐着唾沫的主持人的脸色突然黑了下来，用手中的指针杆拍打着我们的国家地图，已经有3/5被涂黑的样子。“不好。”我突然意识到我把我内心的消极想法说出来了，他的黑脸是冲着我来。如果不是这个避难所，我如果敢在外面说这一句消极的话，我会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所爆头，是正儿八经的爆头，运输西瓜的货车不知道你们见到过没有，就是西瓜随着一声声暗沉的“嘭！”，掉在了地上，有人翻越栏杆去捡，货车司机倒车，也准备去捡，结果未经允许的小偷就被“嘣”的一下，爆头了。

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因为曾经有人试图用手去拨动已经停转了很多天的战争计时器，那个战争计时器在第99天的时候就停了，第二天

有人试图去手动拨动这个计时器，就被气急败坏的主持人爆头了。那天摄像师正将镜头对准那个计时器，所以我们的电视画面不断放大，放大，放大。然后“咔”的一下，电视画面就被红色所覆盖了。还有摄影师的尖叫。那是我见过的最单调的一集电视，只有红色和尖叫。

从那之后，我也没办法预估这是战争的第几天了，估计只有演播室里面的人才知道。而且我电视上的画面似乎永远停留在出事故的那一天了——所有东西都被红色的幕布蒙住了一样。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危险想法，想着用手去擦掉那些血迹。当我开始用手帕擦拭电视机的屏幕时，帕子上渗出了血迹，滴滴答答地落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音。电视，曾是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现在却像一只破损的容器，漏出红色的液体。

那天晚上，我躺在狭小的避难所的铁床上，头脑中不断回放着电视机最后的画面：新闻主播机械地重复着战事报道，他的声音在电视屏幕的红色中溶解，变得扭曲。

我闭上眼睛，试图逃避这一切。但是，睡梦中，我发现自己竟站在一个电视里的演播室里，面对一台虚幻的摄像机。我的手里拿着血迹斑斑的稿纸，上面赫然写着那天电视里的新闻内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并没有清醒过来的意思，在第28次扇自己耳光失败的强制清醒后，我开始读稿，声音空洞而陌生，仿佛被迫参与了这场荒诞的演出。

然后我就醒了。

在梦里，我成了那个重复战事的新闻主播。每晚，我都会在演播室中直播，稿纸和摄像机成了我唯一的伙伴，其余的工作人员我都无法信任。我开始怀疑，这些梦境是不是由那电视机引发的幻觉？每当醒来，我都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战争侵蚀了我的现实，而我的梦，似乎也被这台电视机所侵占。

我似乎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了，因为我开始日夜颠倒，白天拿来睡觉，晚上准备直播。

那晚，像往常一样，我在梦中走进了那个虚构的演播室。手里捏着的稿纸是温热的，应该是刚打印出来的。但当我打开封面准备开始我的“直播”时，我愣住了。纸上赫然只写着一个词，反复无数次：胜利，胜利，胜利。

我的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这与我所熟悉的战报截然不同。我抬头看向那些空洞的摄像机，感到一阵迷茫和不安。演播室内，工作人员们都用疑惑的眼神注视着我，仿佛在等待我解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我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试图找到些什么可以说的。但是，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我只能无力地对着镜头说：“抱歉，今天的新闻……似乎有些不同。”

周围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困惑。我把稿子翻来覆去地观看，甚至将它展示给镜头看。这都在证明我并不是精神失常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低声自问。但周围只有沉默和不解的目光回应我。

就在演播室的最里面有一块玻璃，那是黑色的，很像审讯室的单面玻璃。里面似乎有人影闪动，貌似在说些什么，离黑色玻璃最近的人发现了这个异常，于是将耳朵贴在玻璃上试图听清里面的人似乎在讲些什么。靠近那个机灵鬼的人被拍了拍肩头，他凑上耳朵，从黑色玻璃里面听到的东西被传递给了下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的传递，最后一个人凑近我的耳朵，轻声细语地念到：“我也不知道听错了没，但是你似乎被炒了。”

我不可置信地摘下耳机，看见面前的、尽头的，黑色玻璃。

里面又开始闪烁人影，又有人贴紧玻璃开始听里面传话了。我不想听，我打开了演播室的侧门走了。这时，避难所的盖子似乎被敲打了两下，叩叩。

我决定出门了。

当我爬出避难所时，门外是一片齐人高的麦田。金黄色的麦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这片麦田遮掩了原本的街道，只留下了一条勉强可辨的小径。我站在门口，凝视着这变幻的景象。这里曾是一条我熟悉的街道吗？我试图从记忆的深处寻找线索，但只是徒劳。我曾走过无数的街道，看过太多的景象，从别人口中听说的、在影像中看到的，这些记忆交织在一起，让我无法分辨眼前的真实。

我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踏出麦田，在我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我的大脑又有无数关于外界的景象。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面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在检查这些纸币的时候，我几乎不自觉地踏出了麦田，踏上了那条被麦田遮掩的街道。

我的肚子饿了，这份饥饿来的恰到好处，因为这恰恰是我清点钞票之后的第一个动作。现代生活总是如此有序，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被精心编程，接一个接一个地自然展开。现在，我的程序似乎提示我：是时候找些东西吃了。

我边数着手中的钞票，边走着。就在我快要清点钞票时，我撞上了一扇玻璃门。玻璃门上的门框写着“花店”，就这两个字，没有别的。我撞到门框的行为，恰好引起了卖花店员的回头。

那是什么？我说错了，我这里想表达的是，那是神么？也就是，那是仙女。他自从躲进避难所之后，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女孩。

我走进花店，试图与她攀谈。她的声音如同春风般温暖，她谈论着过去一年的种种。这些话题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因为这一年，等等，这一年？我在避难所里呆了那么久？我竟然主持了那么久的直播？

但我不忍心打断她，她的话语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干涸已久的心灵。聆听完她的叙述，我环顾四周，最终选了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

我走出花店，发现外面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我感到一阵茫然——我为什么买了笔和笔记本呢？我找了个长椅坐下，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字。

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路过，指着我的笔记本问：“你写了什么？”，我不敢抬头，这个问题很像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愿意参军，就在征兵志愿表上乱写自己的信息，军官也是这样问我：“你写了什么？”

当我回过神来检查自己的笔记本时，我发现上面没有字，而是一串连续的问号。但突然，天空中飘来一片叶子，落在笔记本上，遮住了那些问号。

我看着那片叶子，抬头正准备回答问题。我看到那个小男孩被拉进了熙熙攘攘的行人，男孩还在看着我，我又看向远处的花店。我突然想起来，我竟然忘了问那个女孩的联系方式。正当我站起身，准备回到花店时，我发现门已紧闭，上面贴着告示：“参加‘胜利日’，最早明日返。”我似乎明白了今天为何街上如此热闹。

我虽然不知道胜利日是什么，但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词语，从稿子里还是从那个女孩嘴里。我凭着自己的感觉走到了广场上。那里聚集了更多的人，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奇异的物件：没有镜片的放大镜、没有弦的吉他、只有一边的耳机……每个人的鞋子，左脚和右脚也都不一样。

一个人举着写着“市长”的横幅走上了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讲台，他是唯一一个穿着西装的

人，戴着一个黑色的摩托车头盔。当他调试完麦克风，正准备说话时，讲台却突然崩塌，“市长”落入下面的大洞。幸好他戴着头盔。我站在人群中，不由得为这出乎意料的一幕感到幽默，而周围的人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紧接着，那位拿着没有弦的吉他的老哥走到舞台中间，开始弹吉他，幸好麦克风还没坏，大家能听到他的歌声，他的手上虽然在弹吉他，但是只有他的歌声，他的歌声也算不上好听，顶多是返祖的狒狒在叫，但是观众开始更加热烈的鼓掌。

随后，庆典正式开始。一个个人上台表演各自的“才艺”，有人拿着绳子表演一个金蝉脱壳，结果只是把手反过来，背在身后，就结束了才艺……我站在人群中，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本来是来寻找花店女孩的。

我站在广场中央，大声问道：“有人见过花店女孩吗？”

我的声音在人群中回荡，但人们只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又加了一句：“我想要她的联系方式。”

但人们依旧只是热烈地鼓掌。

“还有我有点饿。”大家开始喝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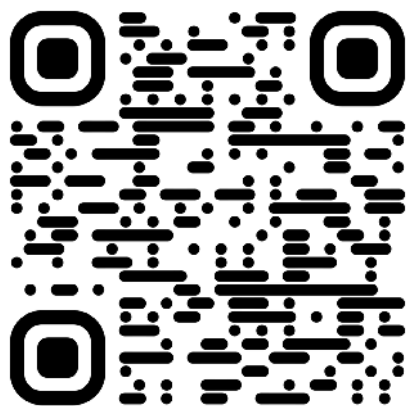
图源: michael-fousert
@Unsplash

版权说明

《莽莽》刊物将在线上开放全本免费阅读，因此杂志中及线上平台发布的公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章、摄影作品、插画等内容），将采用CC BY-NC-ND（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改作）4.0版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关于本协议的具体细则参见：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刊物中涉及到的图片及插画内容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其他使用事宜请与原作者取得联系。

Buy Me A Coffee
捐款二维码



关于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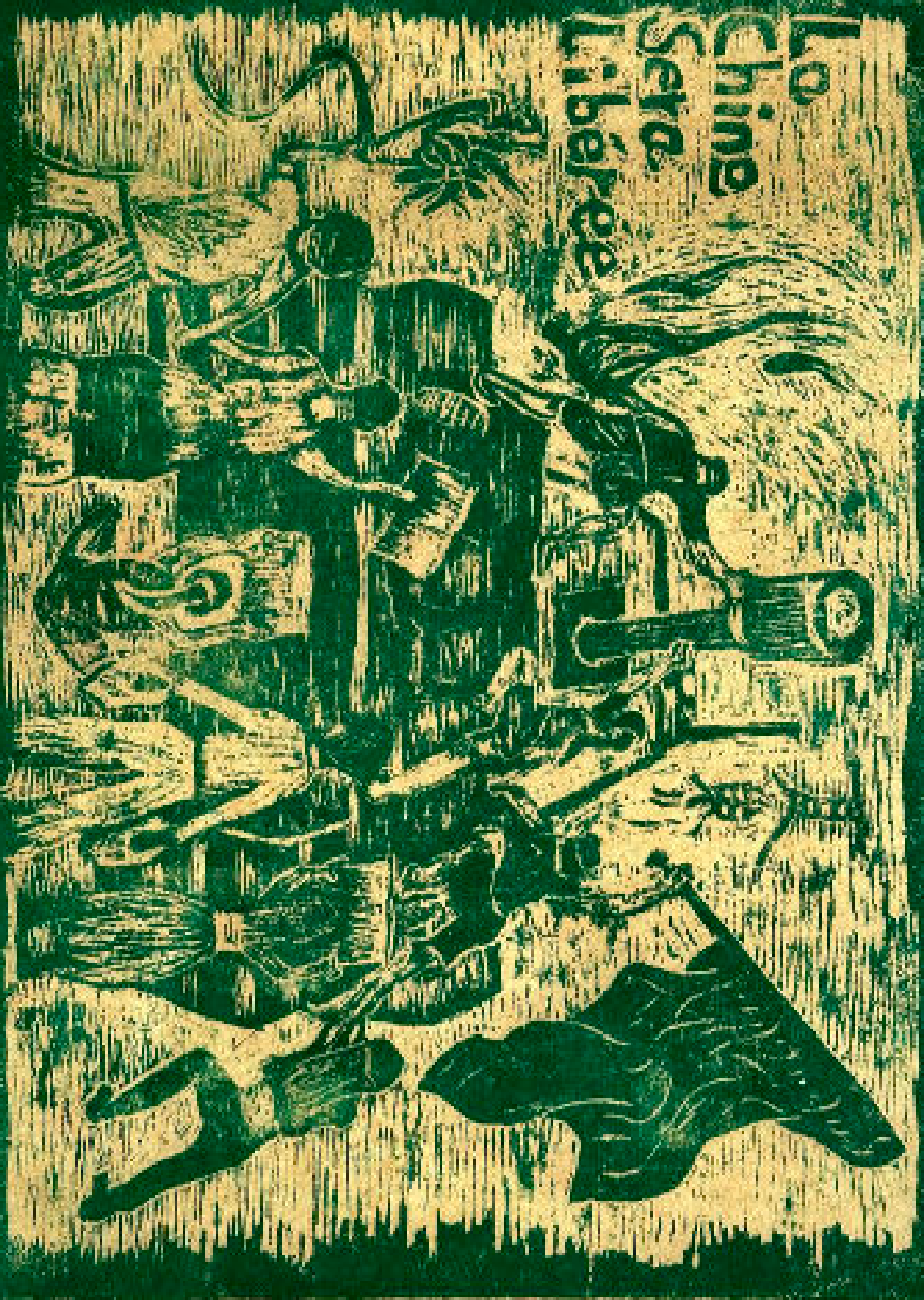
《莽莽》是一本诞生于2022年中国抗争浪潮的独立杂志，由一群身在海外的年轻伙伴创立，持续吸收关注中国议题的创作者。

我们关注海外的华人社群，书写大离散时代中的行动、连结和历史。

杂志希望通过连结中文和多语言的写作者，令华语创作在审查的高墙之外野蛮生长，同时也能与来自港台维藏等的朋友开启沟通，弥补在审查之下产生的信息黑洞与价值撕裂；亦希望通过作品和创作过程来赋能中国行动者，使之在行动中持续思考和记录。

我们的作品形式包括采写报道、杂文评论、文化艺术等。

Lo Ching Sete Libérée





RGB# In History

1995年9月4日，联合国在北京召开了为期10天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大会主题为“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这是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同时NGO（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也在论坛结束后在国内开始推广。

 RGB:#199594

莽莽

MANG MANG